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今日只要我們打開電視、翻開報紙看到相關女性內衣的廣告，皆可以發現內衣成爲女人們展示姣好身材的主要服裝，並且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資訊中，訴求女性內衣作爲一件內在衣服的同時，其最爲主要的功能在於凸顯女人的性特徵——也就是乳房，以及作爲雕塑女人胸部曲線的工具。然而，從這些廣告中形塑出豐胸塑腰的女性形象，我不禁質問的是：「以前的女人」面對這件內在衣服所帶來影響與意義又是何種面貌？是否與現在我們觀看女人穿著此內衣的意義存在著差異性與不同的感受呢？

回憶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從幫忙奶奶要出席正式的場合而穿戴胸罩，奶奶的閒談中，我可以明顯感受到她對於此物件的排斥與反感。基本上在家裡與住所附近散步之際，並不會刻意穿上這件衣服作爲遮蔽胸部或乳房的工具，當然也不在乎胸部被人觀看與否的目光。不僅如此，遠在南部的外婆，爲了要出國遊玩或是北上作客，要她將胸罩穿在身上就好比如臨大敵，總是喃喃自語的說著：「我們以前也沒這樣穿，穿起來真不舒服。」從這些年老婦女的回憶中得知，她們看待「內衣」¹的方式與現代媒體訴求女人們穿戴內衣的意義有著極大的出入，使我不得不感到好奇：在她們年輕之際，她們怎麼去看待內衣跟身體的關係？並且在過去的年代中，婦女們面對中式內衣樣式的轉變、以及穿戴衣服後的身體感覺，是在何種脈絡中與她們的生活產生意義？於是，我開始思考：如果從前人看待內衣與身體的角度，進行了解服裝與他們生活之間的關係，那麼或許可以透過原先不屬於台灣社會文化中的產物——西式內衣所展現的對照，重新認識關於女人們與此服裝之間的故事。

誠如法國服裝文化史學家 Daniel Roche 提到：

我相信一個新的服裝歷史的問題是一種洞察社會歷史核心的方式。什麼是應該生產的？循序這樣的問題下來，可以問什麼是被消費的？什麼被分配？服裝就一直是貧窮與富有、需要及過度、充分和

¹ 本文中指稱的「內衣」泛指各種關於婦女的內在衣服，不侷限於特定的樣式。陸續文中會特別說明不同款式的「內衣」代表的物件爲何種樣式，以便區分不同樣式的「內衣」對婦女們有何不同的意義。

浪費、知足與浪費等爭辯的核心。服裝的歷史可以告訴我們超乎文明所帶來的意義，它呈現了文明的符碼。(Daniel Roche, 1996: 5)

承接著己身的研究動機下來，在本論文中，我想要著手研究的問題是：女性內衣這一件被眾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現代女性必備衣物，它在過去的歷史脈絡中承載了什麼樣的文化意涵與符號轉變？內衣穿著樣式的改變過程如何被操作？我們如何透過內衣思考女性與身體的關係，以及女性身體美感的形成？

我將研究的時間設定在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六〇年間，藉由歷史縱軸中的文獻記載與各種探討內衣、胸罩相關的文本，尋找屬於那個年代討論有關女性內衣與美感的模式，審視並且回顧台灣「早期的女人」在文明進程中與貼身衣物之間的關係。我所以選擇這二十年間作為主要研究的時間點，且以一九四〇年作為研究的起始點，是因為我發現在台灣受到日治時期這段時間內，配合著皇民化運動於一九四〇年二月發起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在台北州支部發起了「本島婦女服的改善運動」²；也就是殖民政府透過法令的頒布，從各種角度管制台灣人，服裝成為管理中重要的一環。對此一時間點的選擇，我認為特別值得關切的是，殖民政府透過社會教化組織，積極鼓勵婦女穿著和式服裝或西式服裝。換言之，外在的服裝可以透過法令的介入而改變，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繼續追問：內在的衣服為何也經歷改變？是否也與政策頒佈相關？然而這樣的過程又是如何產生的？

一九六〇年之後，在政府經濟政策推動下，台灣的紡織工業逐漸興起，外加上國外盛行的女性胸罩樣式內衣，透過各種管道引進國內，此時國內也開始發展小規模的內衣量產工業。爾後，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國際性的內衣廠牌，如黛安芬與華歌爾先後在台設廠，揭開台灣胸罩的量產時代。女性內衣開始成為大眾媒體關注的焦點，廠商不時舉辦新款內衣的發表會，在報論中也時常可見探討穿著內衣之必要性與呈現女性的美感論述³。這個時期層出不窮的女性內衣論述，顯而易見的是一種透過商業機制操作而同質化的泛泛之論，因此我不擬處理一九六〇年以後的現象。再則，國內探討台灣女性內衣的相關研究，居多都著重在一九六〇年往後的發展，於

² 葉立誠（1996）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化運動對服飾西化之影響〉一文中提及，日本人認為可以藉由要求台灣人放棄傳統服飾，擺脫與中國文化之關係。在服飾上，首推「本島婦女服改善運動」再透過社會教化組織，鼓勵婦女穿著和式服裝或西式服裝。

³ 王榕生時裝（1980）刊載許多廠商舉辦女性內衣展示會的圖片與訊息，以及聯合報於1960年後刊登許多關於乳罩與奶罩的資訊。

是我也不在文中重複之後的討論。

在著手進行研究之時，我先選擇歷經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的女性耆老作試探性的訪談，也就是現在年齡為五十歲至八十歲的婦女；我注意到這些以前的婦女在談論自己對於內衣（胸罩）的感覺時，與當今胸罩廣告所製造的形象大相逕庭。我所訪談的這些婦女中，有些不穿著胸罩，有些雖穿著「內衣」（非現在的胸罩），但卻無法接受現代凸顯乳房的胸罩廣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受過日式教育的婦女，有的人從年輕到現在都不穿著西式胸罩，有的人則認為在過去的社會中，大家不會特別注意女人的乳房或是特別講究內在的穿著，各種看待內衣的說法紛紛出籠。然而，在比對這些耆老的回憶與史料文獻記載的過程中，我發現台灣婦女的穿著改變與日本治理機制有著密切的關連性，倘若忽略日據時期的文獻與流行雜誌所再現出來的台灣服裝風貌，就無法充分了解當時的婦女如何在短時間內拋棄傳統的服裝，以及如何影響往後世代的婦女看待穿著內衣這一個實踐行爲。

再則，受訪的女性置身在橫跨兩種政權管理的二十年中，也就是從日本殖民政府到戰後中央政府接管的不同治理政權，她們的回憶反映出不同年代所呈現女性身體與內衣之間的關係。在日本統治台灣之際，即一九四五年之前，書店中陳列服裝及美容的資訊琳瑯滿目，尤其是以雜誌與縫紉參考書為主，甚至關於女性內衣的討論也紛紛出爐，內容泛指縫製的過程、穿著打扮的禮儀象徵、甚至是乳房大小該怎麼透過內衣來修飾，這些資訊是相當公開的，也並未禁止在大眾間流傳。反之，中央政府遷台之時，遭逢戰亂時期以及民生物資缺乏的情形下，大眾刊物被政府禁止，也杜絕人們進口日本書籍⁴，所以關於服裝與流行時尚的資訊，人們只能從報紙上的廣告與文章輾轉接收到一些訊息，偶而從刊載在報紙中的情色連載小說裡，也可以窺見流行於當下的西方服裝樣式。即便在這個時期，資訊的取得沒有相當方便與多元化，但是服裝的流行資訊也沒有因此而停擺，隨之而來的是，盛行旗袍與上海風的穿著打扮，而這股風潮也影響了內衣的發展與觀看女性身體的方式。因此，我想透過報紙的論述、小說的敘述以及耆老們的記憶，重新拼湊當年的時尚流行與對女子身體的審美觀。

然而，另一個促使我挑選這二十年間作為研究時間點的原因，最主要是因為台灣文化脈絡的相對特殊性，也就是在跨越兩種政權管理的年代，日治時期與中央政府時期代表了兩種不同文化的轉變與交會，藉此可以凸

⁴ 牯嶺街舊書攤老闆認為國政府遷台之際使得雜誌書刊交流停止；同時，受訪的婦人也表示抗戰後並無太多服裝流行的資訊。

顯在這兩種文化下，迥異的生活條件、政治管理方式、知識教育等所帶來何種影響。

回顧服裝在中國歷史常因改朝換代而有所更迭，但內在的衣物如何「被」改變、「被」檢視卻是鮮少論及的。作為過去中國女性內衣的肚兜卻消失了，或許該這麼說，它被西方內衣所取代，以不同的樣貌被呈現。但是，西方胸罩的發明至今不到一百年⁵，東西方服裝的交流不僅使中國婦女外衣穿著改變，連帶著內在的衣服也西化了，屬於原本當地文化的服裝逐漸式微。這不禁讓人思索，在那個年代他們怎麼看待來自外地的貼身物件、如何認識異文化的內衣，同時又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捨棄原初屬於自身文化下的內衣？

我認為，透過女性內衣穿著改變的探問，不僅是了解整個轉變的過程與內衣產生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透過探討環繞內衣的各種論述，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的婦女怎麼認識自己的身體，與如何面對一個新物件的產生，而此物件所帶來的刺激又如何影響整個社會對新式女性內衣出現的反應。循此脈絡，我試圖想要了解的是：胸罩式的內衣從西方被引進到台灣，當時的民風以及社會經濟條件如何形塑人們或婦女看待這個新的物件？又帶來什麼樣的刺激？拋棄肚兜的穿著後，女性對於自己看待身體的看法出現何種變化？肚兜的消逝，新式的棉質、布質內衣取而代之，這之間隱藏著什麼樣的文化邏輯？對於女性身體開啓什麼樣的詮釋模式？

換一個角度思考，可以繼續追問的是：不同位階的女性對內衣變化的反應是否一致？文明中的衛生概念如何夾雜在女性內衣中？內衣習慣的改變，為何牽涉了「羞恥感」的成分？「羞恥感」在自我看待身體的定義中，有什麼樣的差異性？隨著內衣的進化、人看待內衣的意義如何轉變？在經歷不同政權統治的台灣，產生多種文化風貌之時，女性內衣樣式的改變，與女性看待自己身體的觀點也有所轉變。換言之，我真正要提出的問題是，有關女性身體美感的塑造：隨著時代潮流的轉變，女性內衣創造的女性身體美感想像如何發生？台灣女性的身體感覺如何產生？

1.2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國外從服裝洞察社會、心理、個人行為等層面的研究，已經有相當完整的規模，研究方法涉及媒體批判、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以及文化史

⁵ 二十世紀的頭十年緊身裙逐漸轉為胸罩，一九〇七真正的現代胸罩誕生（Marilyn Talom，2001：226-227）。

等，研究對象包括與身體相關的各種服裝、配件⁶。然而，國內的研究卻鮮少有類似的研究⁷，現有的服裝研究主要關注在消費行為與品牌調查的層面，缺乏從時間軸線切入社會、經濟、文化、政治以及身體觀感與美感經驗等面向的研究。

我所關心的台灣女性內衣演變，是希望找尋屬於在政治、經濟、社會、與物質文化的論述脈絡下，所產生出來的「物件」意義。探問女性內衣的改變不僅僅是歷史層次的回顧和挖掘，更希望從顯而易見的資料中，重構當時的女性對於內衣以及身體概念的認知，窺見更多被隱藏在當時社會中的價值與流行符碼。此外，我企圖釐清的是：「穿著內衣是美的表現」、「遮蔽是禮貌的行為」，這類的論述建構是如何從物與身體的關係、轉移到人賦予物的意義上？進而透過此物，人與自己的身體如何產生了對話、甚至是認識？

誠如 Daniel Roche 所云，「知識的真實性以及實踐的再現並非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使我們以不同的角度分析文本及影像、挖掘具意味深長的衝突，來緩和介於集體和獨立個人之間的關係。」(ibid, 1996: 519) 女性內衣其實只是服裝的一環，本文試圖透過檢視過去歷史，耙梳箇中現象的轉變以及意義，藉此作為一種啟發與省思服裝與人們生活之間的意義。當我們在研究物質文化時，除了「物件」本身被賦予的符號與解讀外，在不同社會文化下，它仍有不同的意義持續產生。這些意義扣連著的是論述權力、文化、與價值等更為複雜交錯的象徵體系。我們研究物質不再只是認識它，而是了解屬於我們的社會，經由它來檢視自己的價值觀，重新思考當「物件」立足在不同的時間時，它的意義如何隨之起伏與變化。

1.3 文獻回顧

1.3.1 國外研究

在相關文獻方面，可以發現的是，國外從事服裝研究的資料相當豐富，討論女性內衣的取向相當多元化，舉凡從時尚角度出發詮釋女性內衣的演

⁶ 上野千鶴子(1995)、瓦萊麗·斯蒂爾(2004)、安妮·霍蘭德(2000)、弗留葛爾(1972)、荻村昭典(2000)、齊奧爾格·西美爾(2001)、Alison Lurie(1994)、Arjun Appadurai Ed.(1988, 1996)、Thorstein Veblen(1912)。

⁷ 中研院從事比較多關於物質文化的研究，如探討椅子與佛教的關係、以及林麗月(2002)研究明朝到清朝，改朝換代中服裝的意義，異族文化如何統治與更改不同種族文化的服裝儀容。

變，直至今日品牌與內衣結合的風潮⁸；並且國外研究針對內衣研究的分類相當細緻，備受重視的研究層面是以商業角度即從消費概念，以及從政治性身體的觀點，進而分析衣物和人的關係。從國外的文獻中，我發現無論是服裝或是內衣的研究，訪談成爲常見的研究方法之一，許多問題的探討都在訪談中表露無疑、甚至經由訪談過程中發掘更耐人尋味的議題。例如身體透過內衣所呈現出來的樣態爲何？人們怎麼去接受、認識自己的身體與內衣之間的關連性？以及穿著內衣是否成爲習慣、身體感到舒適與否？甚至人們看待這件物品的需要程度等，都是研究裡主要的訪談內容與核心議題所在。

除了從服裝層面研究內衣與身體之間的關係外，直接以乳房爲研究對象的文獻也是國外研究的取徑之一，如 Marilyn Yalom (2001) 從醫學、宗教、商業與政治性多種面向出發，追溯在不同時間背景下乳房的意義爲何⁹。於書中作者特別另闢一章節，由物品—女性內衣—的發展做爲研究對象，進而探討女性乳房在衣服的包覆下所呈現的意義。另一種研究策略是希德尼·羅絲·辛格與舒瑪·葛瑞斯瑪姬 (1996) 以醫學人類學家的身分，從健康角度探討胸罩與女性身體發展的相關性¹⁰，書中旨意除了批判女性穿著胸罩的意義之外，在結論中作者還指出穿著胸罩與現代乳癌病症有密切的關係。更進一步地，拜物 (fetish) 概念也於內衣研究中有廣泛的討論，當然這牽扯到更多與性 (sex)、性慾 (sexuality)、情色或色情 (eroticism) 的元素¹¹。此外，Thorstein Veblen (1912) 則從消費觀點談論服裝，他認爲女人的服裝在其研究脈絡中不但是種必要性消費，也是種炫耀性消費，展現男人的工作能力與階級地位。而 Appadurai (1996) 則是歸納各大家的論點，在其關於消費議題的著作中，將習性 (habitation) 概念貫串在相關身體的事物上，他認爲「與身體密切相關的消費實踐，好比食物、衣服與髮型，皆是透過了習性概念逐漸趨從統一的狀態，同時習性的力量因模

⁸ 如 Jennifer Craik (1994)、Shari Benstock and Suzanne Ferriss Ed. (1994)、Valerie Steele (1989, 1996)、Entwistle Joanne (2000) 等研究，皆是著眼在服裝與時尚的關聯性，透過不同的物件尋找時尚的意義與呈現。

⁹ Marilyn Yalom (2001) 細分宗教性神聖的乳房—以宗教圖畫、聖母形象來看待乳房，乳房受眾人視之純潔及母愛的象徵、情色乳房—於文藝復興時期大眾文學以及圖畫反映當時社會享受感官生活的糜爛之景、健康出發的家庭乳房—論及哺乳功能性、心理的乳房—從佛洛伊德的心理學分析女性乳房的意義、商業化的乳房—大談西方女性內衣與乳房的關連、醫學上的乳房—著重於醫學知識、政治的乳房、解放的乳房—透過政治操弄與時代變遷發展出來女性主義意識萌芽，看待乳房的方式截然不同。

¹⁰ Love (2002)、Singer (1995)、張金堅 (1995)、雷素梅 (1993) 皆是從醫學角度切入論胸罩與胸部的關係。

¹¹ Valerie Steele (1996)、Entwistle Joanne (2000)、Claudia Brush Kidwell and Valerie Steele (1989)。

仿和對立的關係而模糊不清、不被發覺。」（ibid，1996：84）

此外，由於西方內衣的樣式：從束胸（corset）到胸罩（brassiere）的演變歷史悠久，歷史考究以及視覺資料也成為研究女性內衣最有利的分析依據。Jane Farrell-Beck and Colleen Gau（2002）大量採用圖片、史事作為論述資料，在其研究中主要探討美國市場下的女性內衣，歷經戰前與戰後、女性主義抬頭的過程，這些外在因素都使得女性內衣與人的關係產生相當大的變化。換言之，就是女性內衣與人之間的關係隨之被改寫。單純從歷史取向著手進行內衣史的研究多不勝數，Rosemary Hawthorne（2002）為其中之一，她列舉出大量的圖畫穿插在書中，呈現不同時代女性胸衣的演變以及對女人穿著打扮的影響。女人內衣的樣式不斷隨著歷史做修正，同時與體態的改變、流行裝扮日新月異的關聯也密不可分；裁縫師、電影工業、及品牌標榜都和女性內衣有密切的關係。根據她的研究指出，早期的裁縫師具有左右人們穿著服裝的主導權，從設計剪裁服裝到製作成品整個線性作業都可以經由他一人包辦完成，因此，女性內衣受到重視後，透過裁縫師的修正與變更樣式，內衣逐漸量產流於市面上銷售。而 Alison Carter（1992）在其研究西方女性內衣史中也大量採用圖像檔案，作為佐證與說明內容的工具之一。他的研究時間設定在一四九〇年到二十世紀，藉由許多畫作與圖片資料與歷史文獻考察，鋪成一個屬於西方的女性內衣史。不過在這些過於重視物質史的研究脈絡中，皆忽視了社會條件與經濟背景所造成的側面影響，於是，在這種研究取向內，我們難以發現物與人之間的多元關係，也就是少了解構可能性的闡述。

除了上述的研究取向外，Valerie Steele（1989，1996，2002）將社會變動、經濟因素、文化影響等多種思考問題的面向一併置入服裝與女性內衣的研究中，反省這些因素如何主導服裝、女性內衣的改變。同時，她認為研究服裝不能避開對於身體美、性感這些感官刺激等思維的探討，並且在其研究裡可以發現，她始終採取批判的角度，重新思考服裝與性慾之間的文化建構是如何產生的。拜物主義與時尚的關係在其研究中相互印證的脈絡，由作者談來不落入過於死板的馬克思主義討論，也不會高談時尚主宰物質走勢，該怎麼將兩者扣連與分析，就是物質文化這中介者扮演的角色。除了女性胸罩外，Steele 研究的主題頗為廣泛，除了女人的裝飾配件：如鞋子、襪子與帽子等皆在範疇之內，男人的內褲與泳裝也是其研究對象。從這些研究中可以得知，她希望透過這些物件來反思：當我們隨著文明時代的步伐前進之際，時尚的薄紗已經愈來愈沉重、且顯而易見，同時，拜物情形日愈趨進下，性的充斥論述又在無形中藏匿於這兩者之間，我們應該有能力去察覺與發現當下的這些物件在我們生活中呈現何種意義。

總括上述國外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女性內衣的研究既是時尚與消費社會中重要的一環，若置放在探討身體的脈絡裡，亦會顯現出更為多層次的意義：如保暖、遮蔽與衛生考量；此外，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社會中它作為修飾身體曲線、與表示禮貌的特別衣服之時，也與時下性感、流行等因素相互扣連。在回顧國外研究後，我將以 Appadurai 所云的一種習性怎麼被異動來設問：假如那個年代的消費主義尚未蔓延到足以主導服裝穿著樣式，那麼在當下的台灣社會文化脈絡裡，既定的習性如何異動、而轉換成另一個形式的統一呢？女性內衣本身就是一種不易被察覺、檢查的衣物，在這種難以被發現的轉換關係中如何開始產生變化。

另外，對我來說，探討台灣女性內衣穿著變化及女性體態審美改變的過程，Steele 思考時尚與拜物的共謀關係，是輔助我整理自己探討的脈絡，也就是置放在東方台灣的社會環境下，時間倒退至尚未與全球化接上軌道、處處充滿消費符碼的年代，與時尚以及拜物概念的關係何在。從日治時期的台灣已經有不少服裝雜誌流於市面，也有著許多女子表現體態、姿色的圖片，那麼當下的時尚與女性內衣樣式汰換之間產生何種羈絆，與一個流行的女性身體美感意義如何誕生，都可以循著 Steele 發問的方式，找尋一個詮釋的可能性。

1.3.2 國內研究

除了參照國外研究女性內衣的途徑，回顧國內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過去國內書寫關於男、女內衣的碩博士論文與期刊論文，多從內衣工業的管理面向、多種品牌的介紹與比較，以及消費者如何選擇內衣幾方面進行研究¹²；近年來因為設計研究所興起，從設計元素方面著手討論此議題的研究日益趨增，尤以從設計概念理解物的發明和創造，帶給人們的感官影響為何，作為主要的研究取向¹³，於是胸罩與內衣的歷史有了更進一步的撰述。但是，以上四種面向的研究都將歷史作為研究初步的背景交代，內衣的變化或是內衣帶給人們的影響並未見研究者多加撰述。這些研究主要討論的是，在當今消費時代中人們對物的認識與接觸。而這樣的研究取向並非我在論文中所關注的問題，故不詳加討論。

¹² 林嫩真等（1991）、黃威翰（2002）、陳煥明（1982）、陳錦玫（1996）、楊迎春（2000）、蘇文香（1988）、鄭如伶（1993）、許珍瑋（1998）等研究處理內衣的方向重在管理與生產層面、消費者如何選購以及對此物的感受，歷史的縱深在此不多見，他們研究的取向並非本文側重的目的，故簡略之。

¹³ 陳怡伶（2003）和葉亞欣（2004）從設計領域討論胸罩帶給個人感官的意義，從美學以及消費空間角度來探討消費者與此物的關係，雖說歷史層面的討論也略見，但側重消費者與它之間的互動是此種類型研究的重點，與本文的相關性也不大。

直到覃思齊（2003）的《從束乳到挺胸—內衣穿著的社會學研究》出爐，才開始有從歷史、社會及文化面向對女性內衣的進行探討。此論文廣為蒐集民初至今的女性內衣資料，資料來源廣泛，舉凡中央政府尚未遷台之際的報章雜誌、台灣一九六〇年代至今的報章媒體，泛與女性胸罩穿著相關的圖片、介紹與議題文中均有涉略。覃思齊（2003）主要在討論胸罩與女性身體自我意識的關係，也就是現代女性穿著胸罩與否的意義，以及在穿與不穿之間，女性又如何去認識自我的身體。她以社會學的發問角度切入，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設計以及個別訪談。可是在她的研究中，訪談對象的設定與問題的設計，並不足以回應作者所預設研究的關聯性，一來是她探問穿著胸罩的感受與行為，侷限於從日常生活的展演和文明歷程理論來分析，二來則為她直接把訪談內容與理論相互扣連，操作方式等於訪談內容回應了理論，使得她原本設問的問題模糊不清外，也無法深入的分析訪談結果的來由。在覃的研究中，歷史資料佔據了大部分，但僅作為史料，一種過去文化的再現，缺乏分析的層次，並無探討歷史資料中隱藏著或包括著社會的價值或意涵。覃的研究中，訪談的對象以及對話成為主要的研究內容，扣連對話與理論其實是可議的，也就是訪談是種研究方法，內容是否成為主要分析對象必須要注意，否則研究對象與方法混淆不清之時，理論的架構也只是扣住對話，無法來解釋或分析現象。

另外，國內碩博論文中，李玉婷（2005）的研究與自己探問內衣有較為直接的相關性。她以傅科（Foucault）討論身體管理的角度，分析台灣女性如何將內衣視為必要穿著的習慣，並將研究時間點著重於一九四〇年代之後延續至今，試圖了解台灣婦女在穿著內衣的過程中，如何將內衣看成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衣服。李玉婷以傅科（Foucault）提出柔順性身體的概念貫串全文，也就是她認為透過來自學校的教育、與流行廣告的媒體影響下，內衣成為女性不得不穿著的主要服裝。從李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女人的身體受之規訓後接受了內衣，人們因此將這物件視為穿著打扮中必要且重要的一環，這與我企圖從教育規訓層面，檢視女性看待與接受內衣的過程有雷同之處。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發現，從管理身體面向分析台灣婦女接受穿著內衣的過程，教育是主要的推手之一。只是在她的研究中並未指出女性身體受到規訓的目的，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婦女接受西式內衣的因素，一味只從身體受到教育層面的管理，以及接收大眾媒體給予的資訊兩種面向，切入探討女性身體與內衣之間的關係，稍顯立論有不足之處，於是，在本文中避免只從單一的理論論述詮釋整個史的發展過程。另外，在李的研究裡針對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的探討，僅僅採取耆老訪談作為論述分析，而在本研究中將倚重多元化的史料作為分析材料，避免流於只從訪談資料

中下研究定論。

除了博碩士論文之外，國內的文獻資料，鮮少與本研究旨趣有相關性，論及西方內衣進入到華人世界、在台灣社會脈絡發展的過程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零星可數的如張競瓊（2002）所著《西「服」東漸》，文中略提到西方內衣引進中國大陸的情形，明星成爲代言商品、帶領潮流的指標，不過並未詳述日後胸罩的發展，也無探討在台灣的情形。葉立誠（1996，2001，2002）研究台灣服裝史的問題意識是具有對話空間和指標性的，他由歷史縱深著手，展開社會、政治、經濟，以及常被忽視的文化四種面向，探討台灣服飾轉變的過程。在其結論中，作者認爲文化此面向在台灣對服裝的影響尤具深遠。這份研究對我研究服飾與認識社會之間的扣連有很大的啓蒙作用。可惜的是，在他的研究中，期刊文獻的史料略顯薄弱，無法多加深入去分析文化面向對服裝的改變，忽略服裝變遷過程中，並非由一個單一因素所建構。另外，葉尙有《服飾美學》以及《台灣服飾流行地圖》兩本著作，皆是拉長研究時間探討服飾的轉變，希望帶著文化研究批判角度的眼睛，爲已被我們視爲理所當然的現代服飾，開展不同於傳統服飾研究領域的新面貌。

回顧更貼近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也就是台灣婦女穿著西方內衣—胸罩並非朝夕之間立即改變，爲了要了解穿著改變的過程，必須檢視屬於早期台灣婦女穿著的內衣—肚兜。在蘇旭君（2000）研究早期台灣漢人的服飾中，略提及肚兜在過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過去的農業社會中，台灣的男女老幼都以此爲貼身衣物。另外，吳麗娟（1989，1992，1998）致力研究肚兜的藝術，她提供肚兜在中國歷史中不同面貌以及代名詞的史料，分析在台灣肚兜刺繡圖案、針法及色彩，區辨客家人與閩南人的喜愛與習慣，還有肚兜穿著的場合以及年齡；關鍵的是，在她肚兜研究中有提到在第二世界大戰前，台灣祖母輩以及小孩子身上都穿著肚兜，之後肚兜才日趨沒落¹⁴。

從以上國內外的文獻回顧中可以得知，覃思齊（2003）的碩士論文，率先從社會科學角度開啓思考胸罩與女人之間的關係，豐富的史料與嶄新的研究角度，切入女人與內衣的問題。不過，該研究中的侷限與不足，是本文亟欲進一步深化之處，期盼藉以開啓另一個研究女性內衣的新風貌。另外，藉由李玉婷（2005）探討權力規訓婦女穿著內衣的身體，進而了解

¹⁴ 吳麗娟於〈中國肚兜之研究〉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肚兜逐漸落沒，爲內衣與胸罩取代。早期肚兜上的刺繡日益簡陋，可能與日本統治五十年，再加上戰爭緣故久而成習所致。（吳麗娟，1992：17）

婦女們除了將內衣視為必要性服裝的過程中，還有哪些文明概念也一併在此規訓的過程裡得以強化。

而在葉至誠的多篇研究中，視覺資料佔據大部分，雖然視覺資料可以成為再現過去服裝的有利文獻，不過在其研究中，只是成為再現往昔生活面貌的工具之一，沒有就圖片的時空背景，以及產生此樣貌的條件多加撰述。相較於 Jane Farrell-Beck and Colleen Gau 與 Rosemary Hawthorne 這些國外研究者也將圖片作為探討女性內衣的主要研究資料，我認為對視覺資料的分析是必然的策略，並且在本文中得時時透過圖片回應原初的設問，使視覺資料不只是風華再現的工具，而是一個可具分析且有利說明物件存在與改變的證據之一，同時避免視覺資料流於僅是介紹現象的情形。

另外，吳麗娟研究的肚兜歷史並沒有含括到後來消逝的過程，所以一般討論女性內衣都是直接跳過這段乏人問津的歷史，而這部分正是本文試圖要勾勒的一環。我試著將肚兜跨至胸罩的改變進行歷史性的分析，以及重返當年的社會文化脈絡，探問改變的原因何在？改變的方法又為何？摒棄舊有的衣物接受新觀念與衣物反映出社會什麼樣的價值觀、社會的何種價值觀又如何影響這一切呢？在現代深受關注的女人身體、胸部大小、穿著內衣的禮儀，在過去又是以何種方式來詮釋與解讀。

綜合上述的國內外文獻探討，我認為國內相關服裝與女性內衣的討論多著重於當代的分析與介紹，從歷史層面去分析服裝的流變過程多是屬於介紹服裝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而在處理研究時間點上，雖以時間的縱深作為研究指標，不過卻也因為研究年限跨越了四、五十年¹⁵，而忽略探討與服裝相關的各種議題，相較於國外的研究，少了更為細微與深入的分析。參照國外研究服裝與內衣的文獻中可以發現，針對一件物質在其研究中可以探討出社會、經濟、文化以及在歷史過程中所寓含的多重意義，這是值得作為本文研究的重要依據，也就是在論及一件服裝在其社會發展的意義中，還必須去思索在其時間軌跡裡所包含的各種意義，才能更深化此物質對於人們之重要性。

1.4 理論面向

¹⁵ 例如覃思齊（2003）、李玉婷（2005）、葉立誠（2000）、蘇旭君（2000）、葉懿慧（2000）等人從事服裝與內衣的研究，在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他們著重的是橫跨半世紀之久的脈絡，雖能夠宏觀的比較古往今來的差異，但卻往往忽略更為細節的討論。

整體而言，在上述的文獻中以具有問題意識並且以文化史面向切入之研究，對我有較多的啟發。因此，本論文將採取 Daniel Roche 研究服裝文化史的角度切入討論內衣與女性及身體的關係，再加上 Foucault 與 Judith Butler 的觀點加以輔助解釋現象的發生，進而探討台灣婦女穿著內衣後的身體美感形成。

法國文化史學家 Daniel Roche 的研究取向以服裝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他並非著重在分析服裝樣式的轉變、也不是詮釋人透過服裝給予的象徵意義，而是從統整過去法國研究服裝的模式下，闡述服裝在不同時代、政權、場合中如何受到重視，接續分析服裝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為何、怎麼影響社會或是受社會影響¹⁶，進而從服裝觀看社會的經濟、文化以及進步。就他而言，人類與物質生活息息相關，而服裝足以在社會、經濟體下找到其代表的價值與反映的文明意義。而我的研究之出發角度正是如此：歷史不單純只是屬於背景資料，而是分析的主要元素；服裝不是隨著時代變遷而消失殆盡，型態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需要透過一段時間作為檢視。本論文將台灣女性內衣置放在時間的脈絡裡，了解此物件的轉變與人對它的感受之外，也要透過它還原當年社會對於女性身體的看法、美的定義，以及反思討論女性內衣陷入的窘境與遺漏之處。

此外，我將透過傅科（Foucault）對權力的詮釋，試圖分析哪些因素造就了台灣婦女們開始注意到穿著內衣的身體，以及怎樣改變了她們舊有的穿著習慣。在傅科（Foucault）的研究中，他指出政治力的身體技術勝於教條式的完整規範，故在本文中必須檢視法令、學校教育、補習機構、坊間平面媒介、以及裁縫師、明星等論述媒介如何遞嬗無形的權力與知識體系，以便分析台灣女性內衣的轉變過程。同時，解釋過去透過政治力以及利用媒體持續推行對婦女體態美的建構和規訓整套行為實踐生成的過程。經由傅科（Foucault）著眼於管理手段的建立，了解在當時的社會中，權力與知識體系的相互構作，找到一種解釋台灣婦女穿著不同樣式內衣的過程與塑造身體美感的可能性，這是在文中作為與其他相似研究中最為不同之處。我認為在服裝與權力之間的關連性中，尚可發掘除了權力控管人們穿著的身體之外，還夾帶著其他的身體文化於其中，如禮儀與羞恥概念都是作為治理身體的重要手段與議題。在本文中，除了處理造成改變台灣婦女穿著內衣樣式的論述機制外，更著重於穿著內衣後的身體所帶來的文明指標，進而從中分析與觀察台灣婦女們在這一個不被眾人討論的渾沌年代中，如何看待自己、內衣與身體的關係。

¹⁶ Daniel Roche（1996，2000）兩本著作主在研究法國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服裝與社會的關聯性。

不過，從權力作為分析的視角，值得注意的是，必須要避免關切焦點落入全為權力之影響的窠臼泥沼中，於是我認為藉由 Judith Butler 重新詮釋權力作為發問的位置，並且加入身體之物質性的討論，才能使本研究更為完整。在 Butler 關切身體可以作為設問的前提時，將身體視作物質來解構，透過這一個概念去分析性與性別之間，差異的身體如何被建立起來，這對於我認識台灣婦女看待自己身體如何被樹立起穿著內衣所呈現的美感問題，有相大的啟發；換言之，在 Butler 分析出身體具有其物質性的重要特質後，能為我們常認為身體該是所以然的呈現樣貌提出另一種新的展現，也使我们得以在反思社會與文化建構下的身體意義，是否本身這物質就是被建構出來的？

上述有關身體、權力、服飾文化史的理論對本文的啟迪意義甚廣，故另立章節，也就是第二章中再加以討論與分析這些理論中所提出的觀點與本研究相關議題所在，藉此更為深入了解國外研究服裝、身體與主體的論述，以便自己思考本文的研究脈落，能有更為清晰與完善的分析。

1.5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主要從歷史文獻、理論閱讀及深度訪談開始，描繪台灣女性內衣與身體美感經驗的關係：所謂歷史文獻，包含流行服裝、胸罩、美容、美髮、縫紉以及穿著敘述等；理論的相關閱讀為西方探討內衣的方式、歷史層面的比較、文化史研究、身體、與社會及相關服裝的概念。深度訪談的對象則是以現在年齡介於五十至八十歲的婦女耆老為主¹⁷，在篩選訪談對象首先考量在年齡上的限制，也就是以現年五十歲以上的婦女為主要受訪與分析對象。此考量主要是因為在其成長過程中，有些有接受教育制度的洗禮，以及有些婦女則經歷兩種不同政權管理的年代，再加上二次戰後至中央政府遷台，整個台灣社會仍處於待整治的階段，透過這些歷經台灣社會變動的耆老訪談，能為史料之不足與缺席作更為詳盡的補充，以助於了解當時的社會是何種風貌。

在此我先就訪談者的背景作初步的介紹¹⁸，爾後在文中也會詳述這些耆老們的職業與生活形態。這些受訪者與我本身的生活環境有些關連性，

¹⁷ 礙於研究限制，無法將原住民與客家族群的婦女一併納入訪談對象。並且客籍婦女與傳統台灣農村社會中的婦女意象有重疊之處，也就是當時他們的生活條件與習性居多與務農的台灣婦女雷同，於是，未將客籍婦女列為主要訪談對象。在文中僅有一位蔣張女士是客籍婦女，當然這樣的採樣不足以作為代表性，也是研究裡的侷限之處。

¹⁸ 見附錄表格一。

也就是在尋找受訪者的過程中，是透過親戚好友的介紹，再陸續拓展關係尋找人脈，其中許多台灣婦女與自己的血緣關係較為密切，大部分隸屬於中上階層的類別中，這也影響了往後研究的結果。另外，外省籍受訪者則是透過自己熟識的老師引見，而我也發現這群來自於上海與沿海地區的婦女，也多半生活在中上階層的環境裡，所以她們所展演的女性身體是較為時髦與流行的，她們較為優渥的生活條件與習癖也會左右研究的分析。

在受訪的過程中，我針對本省籍婦女與外省婦女作為口述史料的主要分析對象，本省籍婦女年長者，有的從日據時期即接受高等教育的栽培，好比兩位吳女士以及曹女士，有的則是農村婦女從未受過教育或者只有唸過幾年小學初等教育的訓練，隨即在家幫忙務農或嫁為人婦，如張女士甲以及羅李女士。而在中央政府遷台之後在台灣生長且有受學校教育的，如簡女士、張女士乙、李女士等，這些女性成長的環境，有的在鄉村、有的在大都市，這與她們後來的穿著打扮以及著重穿著內衣的程度有著些許差異，加上她們分別接受了不同高等教育的訓練，也影響她們對於裝扮此事的看法。另外，在她們學生時代以及開始接觸西式內衣之際，與自己母親所給予的建議，以及同儕互相交流流行資訊、結伴去訂製內衣與購買內衣的經驗，有某種程度的關連性。

在外省族群當中，訪談對象居多以從上海來台的耆老為主¹⁹，主要是因為從一九二〇年代起，上海就是引領時尚的主要大都市，風靡一時的上海風也跟著中央政府遷台飄洋過海影響著台灣婦女的穿著打扮，其中不乏旗袍的穿著以及梳頭化妝等的婦容打扮，都為台灣婦女帶來另一種視覺上與習性上的震撼。黃女士、劉女士以及梁女士分別在上海與來台時已經打扮的相當摩登，也早就接觸了西式內衣與穿著胸罩。對她們而言，反而是來台初期在服裝打扮上，因為時局與經濟所限，無法與年輕之時相提並論。

另外，我特別找了專門製作旗袍的老師傅郝女士，以及曾經學習製作手工內衣且至今尚在執業為人們修改衣服的王女士，希望透過她們特殊的職業身份，能夠反映裁縫師對於流行與時尚的影響力，又或者她們在當時手工製衣的年代裡，是如何看待內在衣服與外在衣服與女人身體之間的關係，藉由她們熟習的工作環境中，了解當時她們與客人之間，對穿著內衣的身體有何想法與認知。

¹⁹ 特別挑選從上海移民來台的耆老作為訪談對象，主要是那個年代的上海受到西化的影響最為深刻，大膽的穿著打扮在平面媒體上皆有留下紀錄。如《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場百景》、《北洋畫報》都是標榜著上海風格為主的女性穿著畫像與照片。

其中我也列舉男性的觀點，如劉先生、陳先生、與羅先生，透過他們提供的回憶中，一來可以找尋他們記憶中自己在兒時穿著內衣的用意，以及有些人提及幼時曾看到母親在日治時期間尚有穿著肚兜的習慣，與史料裡再現台灣婦女在二次大戰前後都還有穿著肚兜的現象作為呼應。二來則是在他們注視女人身體的目光裡，是否也存在著婦女看待自己胸部與穿上內衣後，可避免「羞恥」之意象²⁰。

在文中，將透過上述三個層面的交互思考，協助我釐清和認識以不同角度所看到人與物在生活文化層面的關係，並希望可以為「女性內衣」在台灣的文化意義脈絡中有所貢獻。

本論文擬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是釐清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說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目的性。第二章為理論分析，藉由 Daniel Roche 文化史的觀點勾勒女性內衣在台灣的另一種文化史；另外，參考傅科 (Foucault) 的權力與規訓論述，解釋過去的時代如何經由權力的施行改變人們的穿著；並加入女性理論家 Judith Butler 的觀點，透過另一種解構論述分析，當時的女人如何面對自己的身體，同時避免自己在分析之時身陷權力的框架內。

第三章我企圖處理不同歷史時期的台灣，女性拋棄傳統內衣，新式與西式的內衣取而代之的原因為何。在這轉變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當時社會透過管理身體的手段，將屬於傳統社會中的女紅技能納入體制中的技藝訓練，同時將文明概念灌輸於人們穿著之服裝，使得婦女們開始認知到有別於過去的身體美感概念。第四章將循著西式內衣成為女性主流服裝的脈絡，討論美感身體的論述日益趨多之時，這些論述對於婦女看待穿著內衣的身體造成何種影響，當時的婦女是否開始注重自己有無曲線美感的身體？而最初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意義被翻轉，並且進入西方社會的文化脈絡中，她們又是如何看待穿著西式內衣的身體？伴隨著當時流行的外衣如旗袍與西服，是否也與訴求穿著內衣有著共謀的意義呢？

第五章將返回理論的探討，尋求對理論的適切回應與澄清作為結論，以及說明在此研究中仍有的部分侷限與不足之處。

台灣的女性看待內衣此物件的感覺，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六〇年這二

²⁰ 居多婦女認為穿上內衣是為了避免胸脯過於明顯，又或者要遮蔽乳頭，加上現代灌輸女性穿著內衣主在遮蔽凸顯的乳頭，這些種種因素造成婦女認為要穿內衣以避免尷尬與不好意思的想法傾巢而出。

十年間，藉由規訓與眾多論述權力介入下，顛覆了傳統社會裡既有的一套價值觀，而此過程並沒有被記載下來，也沒有受到討論，這是本研究想要探問的核心所在。其次，在了解不同的時代背景、社會經濟條件、文化脈絡以及統治政權種種層面，對於一個物件所造成的影響力有多大時，台灣婦女在受到這些因素影響之下，如何去看待屬於她們最為貼身的一件服裝—內衣，與透過它所呈現的身體被賦予的意義又有哪些，是本研究更進一步要去耙梳的。經由史料與訪談相互交錯作為分析對象後，與國外理論所帶來的啟迪，回到一件物質—女性內衣、人、與身體物質三者之間的連結，作為本研究欲從服裝此物質討論人們與身體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所謂「女性身體美感」的問題。

而在下一章節中，將就國外理論與本研究相關的探討進行了解與釐清。



第二章 國外研究理論的啓迪

在這章節內，我針對與本研究旨趣密切相關的理論加以耙梳與彙整，主要釐清 Daniel Roche、Foucault、Judith Butler 他們探討服裝、權力與身體的脈絡。

2.1 禮儀、材質、時尚與階級——種服裝文化史取徑的可能性

國內外討論服裝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生活之間的關係並不多²¹，尤其是從服裝的演進過程中，探討人與服裝之間的相互影響性更是罕見。而法國文化史學家 Daniel Roche 則在此類別研究中獨樹一格，他以法國的服裝作為研究對象，循著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取向發展分析脈絡，討論法國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看待服裝與人們生活間互相影響的過程，以及人們看待服裝樣式變化的價值觀轉變。在他的研究中，首先統整了過去法國研究服裝的模式，闡述服裝為何受到重視的歷史脈絡後，接著剖析服裝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為何，怎麼影響人們的生活作息，或是如何受到社會、政治與經濟與文化不同面向的影響。

就 Daniel Roche 而言，將服裝作為放大觀看社會的一個視角，是因為他認為人類與物質生活緊密扣連且息息相關，而服裝足以在歷史、社會、經濟體下找到其代表的價值與反映整個人們的文明發展。他認為研究服裝文化史不在普遍性中找到一個不變的答案，而是試圖從這些已經被規範與既定刻劃的影像中，發掘其他的可能性存在，甚至是挑戰前人研究的結果與挖掘更多不為眾人察覺的奇異之處。我的研究即是循著他的發問脈絡，試著從內衣此一服裝類別，了解台灣一九四〇至一九六〇年的台灣婦女看待此服裝與生活之間的關係：此衣服經過時間的積累與政局交換帶來何種不同的流行差異，從婦女們看待內衣的意義與既有社會中賦予的文化意涵有何出入後，進而討論觀看身體的方式在穿著內衣的樣式與習性之改變中如何跟著有所不同。

2.1.1 研究服裝文化史的策略

在 Daniel Roche 著手進行一個世紀至橫跨兩個世紀的日常生活研究與

²¹ 除了林麗月（1999）長期觀察明代服裝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著作有〈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以及〈傳統中國的「禁奢」與「反禁奢」〉皆是探討社會中的服裝與人們之間的關係有何密切性。

服裝時尚文化的研究中，他先將服裝分為兩個層次來探討，一個是 *dressings*--屬於個人行為的範疇，也就是人們可以從個人中篩選出適合自己的服裝樣式；另一個則是 *costume/clothing*--以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研究立場出發，在社會規範、正統的規定、被允許的系統中，探討服裝帶給人們的意義。(Daniel Roche, 1996: 45) 他認為服裝的研究應該從這兩種不同的立場切入，才能觀察與檢視服裝在社會中所代表的意義與反映出更多的問題。於是在研究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演進史中，本文將循著 Daniel Roche 提出觀看服裝與人互動的兩種研究取向，分析婦女的內衣既是屬於個人式的穿著行為，同時亦涵蓋著社會賦予的文化意義，在兩種脈絡中，穿著內衣的意義與女性看待身體的方式發生了何種巧妙的變化。

在 Daniel Roche 的研究中，他選取下列幾種研究材料作為分析與檢視當時社會重視服裝的憑據，其中包括（一）歷史檔案夾：專門蒐集歸納服裝設計以及說明穿著方式等的歷史檔案；（二）圖解和肖像研究：有關書本中圖畫以及人物等圖片的肖像，藉由肖像說明哪些階層穿著何種服飾，以及在不同時代中，服飾有什麼樣的轉變。（三）繪畫和雕刻版畫：大幅展示品以及油畫等作品，紀錄當時人們穿著的「照片」；（四）服裝的收藏品：法國十六到十八世紀關於服裝的小本、目錄等，因應服裝設計完成後，作為推廣至民間的流行雜誌。（五）文學著作及資產清單作為輔助分析特定族群消費的依據²²。這些文本對他而言，是研究服裝文化史有利的分析依據，可以將服裝史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做更確實的掌握，同時也是他與之前其他研究服裝史學家最大區別之處。他認為「服裝不僅僅是物質文化中的要素，它同時將社會內在影像的價值與存在真實的標準加以具體化。」(Daniel Roche, 2000: 197) 若可以掌握到社會裡面各種關於服裝的論述與記載，那麼更能夠重新勾勒出當時人們與服裝之間的生活藍圖。

在觀察台灣女性內衣的發展過程中，雖不能完全依樣畫葫蘆的作一個台灣女性內衣文化史的研究，不過在重新描繪一九四〇至一九六〇年的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樣式與創造身體美感的過程中，卻可以參照 Daniel Roche 將服裝問題帶入觀看社會的方式，透過圖片、照片、與文章論述，呈現當時流行打扮的模樣，以及形塑出女性身體穿戴服裝後的時尚感，此外，從相關史料檔案進一步推論造成台灣婦女接受新式內衣的原因。最後，透過

²² 文學著作的重要性在於「物件被置放到一個脈絡中，藉此提供了生活方式的資訊，經由解碼的動作給予文本不同的真相。」「小說固然是有美學的效果，但也呈現了敘述的真實、一個時代的想像結構，文學仍可以讀出社會的價值實踐。」至於資產清單作為資料的意義，「有助於瞭解一些特定階層的消費，以及他們衣服的使用與照顧，尤以富裕人家為主。不過也必須注意的是這項資料顯少提供大眾的資訊，所以無益於概括功能性的解讀到象徵性的詮釋。」(Daniel Roche, 1996:18-19)

與耆老們的訪談，回顧當時某部分的台灣女性看待西式內衣所帶來的衝擊與穿著的意義，以便分析他們認為穿著內衣後首當其衝的身體感覺又有何種變化。

2.1.2 隱藏與服裝內的禮儀與文明概念

Daniel Roche 除了將服裝問題化，以作為文化史的研究之外，值得關注的是，他認為服裝可以是洞察與了解禮儀與文明過程發展的捷徑之一。這一個核心問題佔據其服裝研究中很大的篇幅；換言之，他認為當我們討論社會中服裝對於人所扮演的角色時，不能忽視社會中孕育出來的一套穿著服裝的禮儀與文明意義。這套不見得有明文頒佈的遊戲規則，卻足以影響著人們看待服裝與裝扮文化。Daniel Roche 提到：「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良好禮儀的論述都是從衣服的樣式、顏色與裝飾選擇上產生的。」(ibid, 2000: 202) 我們可以藉由儀容打扮演進的過程，發現社會中賦予人們在什麼樣的身份地位，以及應該穿著什麼樣的服裝，才是合乎禮節的規範。在文明化的演進史中，關於禮儀的定義，已經廣泛延伸至私人、社會及公共多重層面：「十七世紀開始，經由宗教力量介入下，服裝就一直是貧窮與富有、需要及過度、充足和奢侈、知足與浪費等爭辯的核心。服裝的歷史可以告訴我們超乎文明所帶來的意義，它呈現了文明的符碼。」(ibid, 1996: 5)

什麼是 Daniel Roche 認為服裝可以呈現的文明符碼呢？除了人們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中，倚賴約定俗成的禮儀規範，遵循不成文規定穿著符合禮節與禮貌的裝扮，Daniel Roche 特別指出，其實最能夠呈現社會中文明符碼的代表，則是服裝經濟面向在轉型之際，也就是服裝上的材質技術進入革新與改變的時刻。在他分析法國服裝轉變的過程中，材質的發明被視為解讀禮儀規範與文明社會演進的重要指標，因為他認為材質的創新為服裝市場帶來重大影響，服裝樣式的變化、顏色的流行、人們選擇款式的改變與此有相當大程度的關係。此外，人們接受新材質衣服的同時，穿著打扮的意義與尚未接觸新材質之際有所出入，因為新的文明概念伴隨著新的服裝灌輸在人們的身體上。對於乾淨與骯髒的解讀，因襲服裝上的材質革新，顯然將這兩種對立關係的定義重新洗牌，而另有新的意義在社會中發生作用。Daniel Roche 就材質與時俱進革新後所造成的影響表示：

亞麻布尚未發明之前，眾人對於乾淨的定義只在於比較顯而易見的地方，好比手與臉，直到亞麻布播散四處，尤其是襯衫內衣的使用，對於整套身體上的清潔改變有了更進一步的介紹。此時人們也得從小開始學習乾淨與正確規範的規矩。(Daniel Roche, 1996: 157)

無論是禮儀文化或是文明概念的建構，Daniel Roche 指出，從服裝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可以發現社會透過服裝不斷的創造，規範人們身體的符碼，並且規訓與教化人們的行為舉止。然而，服裝的禮儀文化不是只限於光鮮搶眼的外在衣服，同時也包括了不被外人所知的內在衣服。「外在的衣服與不宜點破的內在衣服都和得宜有禮的概念環環相扣。」（Daniel Roche，1996：5） Daniel Roche 從法國服裝史中整理出禮儀文明與服裝的關連性，並依循這樣的發問處理服裝在文明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從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近代演變歷史脈絡裡發現，無論是傳統禮俗中所賦予內衣的禮儀文化，或是婦女不再選擇中式款式內衣，台灣社會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這二十年，婦女看待這件衣服皆是受到合宜禮貌的規範。既然婦女的穿著打扮受到禮俗所限，那麼伴隨觀看身體的方式也在禮儀文化的框架裡。雖然內在衣服不像外衣如此顯而易見，能夠直接被我們觀察與檢視，但是我們仍可以從台灣婦女在選擇內衣的款式與穿著服裝所呈現身體樣貌的過程，得知整個運作其實都內含在禮儀文化與文明社會進展當中。這就是為何 Daniel Roche 會提到：「服裝更能夠被視為禮儀文明和宮廷文明的最前線代表，這是將人們與世界緊密扣連而不容被分離的一環。」（Daniel Roche，2000：3）

Daniel Roche 認為從服裝中興起一套文明與禮儀的看法，主要攸關條件是布料的創新與流行，這些元素為人們注入有別於以往對服裝的看法，尤其是乾淨與衛生概念的建立。而且，人們將這樣的觀念延伸到裡裡外外的衣服，同時這股風潮促使社會內的階級界線逐漸模糊。這意味著科技進步中所創造出來的新布料，透過大量製造以及流行時尚的影響，取代舊有的服裝材質。新的布料開始被人們廣為接受與使用，此時打亂了既有社會中以服裝作為區辨人們階層的規範。在不同位階的人們因為新的布料改變了他們觀看身體的方式，無論是僭越禮俗規範或是仿造上層階級使用的服裝材質，皆囊括在服裝底下文明進步的衛生與乾淨觀念，也就是人們因應穿著布料的選擇而開始注重穿著服裝後的身體。換言之，Daniel Roche 認為服裝材質的革新，混淆了過去採取穿著打扮區別人們階層分類的規定，我們也不能再用固定、單一的詮釋去解讀人們在社會階層中明確的分類。

雖然在 Daniel Roche 的研究中，只有提及到布料的演進與大眾流行文化足以帶動人們注重乾淨與衛生的穿著意義，並沒有論及這些概念影響到穿著後的身體。不過在我的研究中，將藉著 Daniel Roche 的論點，提出人們開始採用新的布料製作服裝，而衍生出重新定義乾淨與骯髒的觀念之論述，來分析在台灣女性內衣文化演進的過程中，台灣婦女接受新式內衣，除了因應材質發明與廣泛使用的趨勢所導致的結果外，更受到日本人灌輸台灣人民衛生與健康的現代觀念。現代性的觀念導致舊式的傳統中式內衣肚兜

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棉麻布織成的內衣。換句話說，從內衣這件服裝的選擇，就已經含括乾淨與衛生的觀念，那麼，穿著後的身體是否更在此論述中深受影響。而我們看待內衣與身體之間的關係，所呈現出來的身體感，必然難以跳脫禮貌的身體與乾淨的身體框架之中。

2.1.3 革新的技術影響時尚與階級的定義

在禮儀與規範宣告登場後，禮儀文明流行於絕大多數民眾之間。除了從經濟面向了解整個法國服裝風潮的轉變之外，我們還得回歸去探討哪些人讓此生產線綿延不絕，進而發展出時尚這玩意。「時尚生存於擬態與保護貿易制度的機制下。」（Daniel Roche，1996：7）Daniel Roche 認為裁縫師、服裝設計師以及貿易制度在生產面向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延續著亞麻布的大量產出，服裝成為個人資產的一部分，進而藉由服飾認識身體外貌，作為區辨乾淨與否的象徵意義。這樣的運作過程中，裁縫師與設計師功不可沒，他們因應時局發展出來的材質文化，它也締造了時尚。在這裡他特別點出這些製作服裝與創造服裝的人，為時尚開創了市場與建立起時尚的意義，人們透過這些族群，更加認識服裝在社會上所代表的生活意義。

時尚成為 Daniel Roche 研究中討論服裝如何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章節。他不時將時尚／流行（fashion）置放在個人與社會的討論中，最終是要突顯時尚為社會與服裝的集合體，「時尚是集體與個人的平衡點，是一種社會位階的標誌，它是固定的，也是具有彈性的。」（Daniel Roche，1996：48）他認為當我們重新檢視時尚的意義之時，可以更了解每個社會在不同時間對物質有全新的見解；換言之，當我們不斷創新與詮釋時尚的標準之時，也就開啓了另一種消費的概念，對物質重新改觀，標記上新的定義。（Daniel Roche，2000：194）因為時尚不是以既定的名詞存在著，也不是不能轉變的意義：「時尚不需要像金塊或貨幣那樣以實體存在著，它就是差異的交換系統，伴隨著人們的互動關係，超前經濟或是宣告經濟的發展。」（Daniel Roche，1996：45）Daniel Roche 拿十七世紀看待服裝（costume）的方式作為檢視時尚具有流動性意義的例子，他認為當時服裝在宗教規範之下，流行的意義就是意指它的風俗民情，不過在時間的進程中，服裝歷經不同時代與政局的洗禮，所包含的社會意涵也不再僅限於傳統的民俗風情內。他認為我們在看當代流行時尚這產物的時候，背後的社會價值與歷史進程都不容忽視，因為時尚是來自服裝與個人和社會互動之下的產物，並且隨著時代的腳步一直在變動。

Daniel Roche 從生產面向、經濟與社會條件中，重新描繪法國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服裝與人們生活之間的發展，對照閱讀之下，也回應了我看到

台灣社會女性內衣樣式的改變。時尚同步流行之時，內衣樣式與穿著意義的改變，為婦女所帶來的震撼，則是重組內衣與身體的關係；內衣不再只是展示女紅文化價值，或者是遮蔽包覆身體的實用意義，而多了禮貌與美感的象徵意義。台灣社會將女性內衣拱上時尚軌道的過程裡，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歷史脈絡中發現，當權者與生產者同時介入人們的服裝穿著，影響著人們看待穿著內衣的身體，出現了有別於以往的看法與認知。Daniel Roche 在其服裝文化史研究中，他發現了服裝具有的特性之一，就是當權者與權高位重者可以向眾人頒布禁奢令及規範服裝穿著，加以控管以便區辨身分的手段，這是種掌握權力的慾望，也是彰顯身分地位的慾望。當然要從內衣這種不易外顯的服裝洞察到彰顯身份地位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但我們也間接看出權力是可以在服裝之間遊走，改變人們穿著打扮的習慣。「在自由與拘束之間徘徊留連的時尚，事實上有助於影響整個區辨與權力系統。」（Daniel Roche，2000：3）

其實在 Daniel Roche 的研究中已經為不同位階的人呈現相異的服裝風貌，甚至想要突顯的是，研究物質生活中的文化與歷史，都要試圖去了解更為平民化與被視之理所當然的瑣碎物質。他除了提到服裝具有掌權者的控制慾望特性之外，更針對不同位階的人提出，服裝具有固定性與惰性的二元對立關係，以及服裝與社會階層之間的連結性。這兩種特性主要在說明位階較低與生活在鄉村者的人對服裝所呈現的樣子，以及在意的程度與隸屬社會階層較高的人相對來說，顯得難以控制與左右。（Daniel Roche，1996：56）他尤其關注富豪與窮人之間的差異，這也回歸到他後來談論的時尚不應該只是貴族權富中所擁有的，窮人反而是真實社會中佔據的多數，他們流於繁瑣的東西更能夠凸顯時尚，只是他們在乎的事物經常因為不起眼而被社會埋沒，於是，我們時常忽略這一塊所呈現的時尚意義。因此，經由研究平民的生活以及他們所在乎的事物，我們才能看到一個更加完整的社會風貌。

Daniel Roche 的服裝文化史研究裡，隱約點出支配的力量隱藏在社會各處，權力滲透其中的過程使得服裝與時尚不僅與身體、慾望相關，社會階層的分類也讓服裝所呈現的符號具有起承轉合的改變。在歷經時間的縱軸表中，Daniel Roche 從人們生活之必須的「衣」這部分出發，窺探在社會、經濟、政治的轉變裡，人們所穿戴的符號起了何種變化。時尚的流動意義與從位階分析服裝所具的指標性意義，都是本論文分析台灣婦女看待內衣與身體關係的主要依據；換言之，內衣雖為服裝中的一環，卻可以從中了解處於不同位階的人們對於此衣服的認知有何種差異性，以及透過此衣物所呈現的時尚身體感又是什麼樣的面貌。Daniel Roche 在服裝與時尚的研究中，點出了位階不同與社會發展影響了整個文化進程，也依稀透露服裝與

身體和論述之間的巧妙關係。如果我們回到傅科（Foucault）的脈絡，可以清楚看到服裝在社會關係中產生的意義，進而檢視身體受到論述權力的箝制而影響主體看待服裝與身體的關係。

2.2 論述權力如何介入對身體的監控？

循著 Daniel Roche 研究服裝文化史的脈絡下來，可以發現當人們選擇衣物作為掩飾與遮蔽身體的同時，挾帶著彰顯身份地位與展示時尚流行的意義，但在這之中，有著個人的主動性選擇與社會力量支配且主導著人們選擇服裝的可能，這也是 Daniel Roche 一直強調可以從各種社會關係中，發現服裝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之外，也能經由人們穿戴服裝的過程，分析社會中經濟與政治的發展過程。然而，在其研究中並未直接指出有哪些機制、或是力量足以左右人們選擇服裝的可能，只有點出遊走於時尚中的論述系統可以為人們帶來區辨的意義，以及了解哪些因素造成了時尚的出現。而我認為，延續 Daniel Roche 認為服裝可以作為觀察社會與人們生活的視角，還必須進一步了解哪些力量影響人們看待服裝的方式，於是，我將透過傅科（Foucault）探討論述權力治理的概念，試著從中分析在台灣的社會中，婦女們接觸到新的內衣與改變穿著內衣的習性，是因為受到哪些論述機制與權力的干預或是束縛。

傅科（Foucault）雖然循著亞里斯多德討論靈魂的脈絡探問身體議題，不過他提出靈魂之所以變成一個有標準及常態化的典範，是因為身體經過形塑、訓練、教養與規範才產生的，也就是靈魂是基於身體有效地具體化，才成為歷史上特別的想像理想。傅科（Foucault）甚至提出靈魂是身體的監獄（the soul is the prison of the body），他認為靈魂的探討不該是空泛的，而是一種權力的機制，身體上的框架與形式。換句話說，論及主體概念之時，不應該凌駕在形而上學的探討。傅科（Foucault）把焦點拉回到身體這個具體且隱含著各種權力運作的物質上，不斷強調身體是因為透過四面八方的論述權力而塑造出來的樣貌。我們可以透過傅科（Foucault）從顯性的機制管理與無形的知識系統兩種面向切入，探討論述權力影響身體與主宰身體的可能性。

2.2.1 顯性權力治理身體

在傅科（Foucault）的研究中，身體與主體受到論述權力的操控，淪為權力的產物，管理身體的方式與主宰主體和權力的形成密切相關，權力的無所不在成為其研究的核心。在這樣的脈絡中，首先必須了解權力意味著什麼、有什麼必要條件讓它無孔不入。

權力不是一個機制，不是一個結構，也不是我們擁有的某種力量，它只是人們為特定社會中複雜的戰略情勢所使用的名字。
(Foucault, 1990: 93)

權力在傅科 (Foucault) 的研究裡是作為其理論發展主軸的一部份，他認為我們的生活無處不是權力運行其中，不過，卻無法將權力與社會二元對立劃分來探討，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交錯且緊密的。傅科 (Foucault) 看待權力與社會的關聯性，認為並非分開兩個層次進行討論的，它們的關係是互相緊密扣連，權力既不是社會的底部，也不是默默操作著社會運作與發展，而是內在於社會中，成為社會本身的決定要素。(汪民安, 2002: 213) 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條件來發掘權力運作的可能之處。我之所以挪用傅科 (Foucault) 探討權力治理的概念，是因為我發現在台灣受到兩種政權的管理，服裝被歸納為其中管理的一環，甚至可以說因為有政治力的介入，加速人們看待服裝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尤其是殖民政府治理的時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與力氣改善台灣人的穿著，這其中不乏政治性的目的。Daniel Roche 提到服裝蘊藏著禮儀文明概念，在台灣社會中，我們清楚看到政府的權力宣導這樣的禮儀觀念，並從普遍之論述層面教育人們注重內衣與文明身體的關係，使得人們在接觸西式服裝所帶來的衝擊之餘，能夠更快速的接受新式服裝與服裝所帶來的影響。

相較於以往國內有關內衣的研究皆忽略這一點²³，在本文中著重於論述權力能夠影響人們穿著打扮的習慣，並改變他們在既有的社會價值觀中看待服裝的意義。另外，我發現，其實台灣婦女開始穿著西式內衣，跟整個政府推行的管理機制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換言之，過去的人們看待女性內衣為一種女紅文化的代表，視之為最為一件簡單的衣服，卻也在論述權力運作中開始產生變化。我認為要進行了解權力所在與作用於何處，必須回到傅科 (Foucault) 的研究脈絡裡。傅科 (Foucault) 提到要瞭解權力的存在位置以及分析其所帶來的影響，需要空間 (space) 與時間 (time) 這兩種必備條件，空間是作為觀察權力蔓延與進行交錯的場址，時間則是分析權力變化以及四處滲透的視角。也就是，在時間進程內的場域，是瞭解權力影響主體與身體的主要變數，從中我們才能剖析哪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不斷消長、互相影響著彼此，以達到控制與管理的目的。回到我的研究脈絡，探討台灣婦女在歷經不同政權的治理，因為透過無形或者有形的論述權力管理，我們可以探問的是：台灣婦女看待內衣與自己身體的觀感如何出現變異。

²³ 覃思齊 (2002) 與李玉婷 (2005) 的碩士論文都是討論女性內衣的歷史，卻鮮少撰述以及及忽略不同時期中規訓與改變婦女穿著內衣的因素。

從傅科 (Foucault) 的觀點中，我們知道權力蔓延四處，他認為身處社會的我們，身體與主體都受到了權力的操控。他表示：

權力無所不在，這並不因為它有特權將一切籠罩在它戰無不勝的整體中，而是因為它時時刻刻、隨時被生產出來，甚至在所有關係中被生產出來，權力的無所不在，並非它涵括一切，而是因為它來在四面八方。(Foucault, 1990: 93)

在台灣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論述權力成爲影響婦女選擇穿著內衣的因素之一，從政府頒佈的法令、體制下的學校機構、體制外的相關服裝學院，以及社會中無形的社交禮儀文化，我們都可以發現權力藏匿其中，使得人們開始注意到身體與服裝之間的關係，進而改變他們對於著衣後一個女性身體的認知。

主掌權力的在位者並不能只從權力施展的場域，去規訓人們穿戴什麼樣的服裝與呈現什麼樣的身體感，尤其是女性內衣—作爲一件私密且不被外人所見的服裝。而是透過上述權力施展的論述機制中，使台灣婦女逐漸接受了新的物件，以及認知內衣所蘊含的文明意義後，這種管理身體的技術將內衣與身體美感開啓另一種關係的聯繫。這正是在傅科 (Foucault) 研究監獄的誕生中，提出權力對身體有一種柔順性 (docility) 的規範，也就是透過各種管道精心操縱深體、姿勢與行爲，形成一種強制人身的政策。(Foucault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8: 136-138) 但是，我認爲在過去的台灣社會中，婦女們看待權力所帶來柔順性的規範，並不僅止於李玉婷 (2005) 提到作爲約束女性穿著內衣的必要性，而是還有 Daniel Roche 提到服裝包含了禮儀文化的規範。傅科 (Foucault) 認爲：「身體的可利用性、可馴服性、它們如何被安排，如何被征服、如何被塑造、如何被訓練，都是由某種政治、經濟、權力來實施的，都是由歷史事件來實施。」(汪民安, 2002: 171)

傅科 (Foucault) 指出，「任何一個目光都將成爲權力整體運作的一部分。」(Foucault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8: 193) 換句話說，在自己與他人的目光中，可以找到權力活躍於四處，而我們透過觀看與被觀看的方式進行解構身體與權力的微妙關係。傅科 (Foucault) 認爲在監視技巧被廣泛運用之時，我們不僅從外部觀看，甚至從內部觀看整個世界，「通過監視與觀看，個人被對象化、被觀察、被紀錄、被銘寫，同時這種監視是持續的、分層的、切實的，它構成了一種複雜的、自動且匿名的權力。」(汪民安, 2002: 196) 回到研究探問之初，當我翻開史料看到呈現穿著內衣與身體關係的論述，以及得知耆老們看待穿著內衣與身體的感受時，發現其中也存在著這種自己的眼光與他人眼光的束縛，因此，透過一種不在成文

規範中的監視，迫使他們不得不注意來自外在目光的關注，而調整自己穿著打扮以符合大眾論述之需。於此，我將透過傅科（Foucault）提出的顯性權力管理，以及柔順身體如何被建構出來的論述，來探討台灣社會中不同時期的政權管理之下，哪些因素可能改變了台灣婦女的穿著，同時透過論述權力的施展灌輸他們文明化的服裝與身體概念，這其中潛藏的意圖與作用對人們來說產生了何種效應。

2.2.2 知識與權力的交互作用

權力產生知識，而且，權力鼓勵知識並非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權力使用知識也並不只是因為知識有用。（Foucault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8：26）

除了在顯性的機制上可以看到權力面貌，知識的傳播與教育更是深植於人們的生活中。人們不知道該怎麼去回應和解釋對於身體的認知已經受到外力而改變與控制，那正是因為論述權力顯現於無形之中。對傅科（Foucault）來說，他透過知識建構出來的系統，解構了符號本身被創造出來的意義。「先前，知識駐紮在符號的內部，現在符號聽命於知識，它藉助知識來實施的表意功能，它從知識那裡獲得確切性和可能性。」（汪安民，2002：81）換言之，知識系統不僅包括了對語境與事物給予新的定義，它甚至顛覆了既有的符號架構中所指涉的物件。

而傅科（Foucault）詮釋權力、知識與人三者之間的關係為「人們關切的是身體政治（Body Politic），這是一組物質因素和技術，它們作為武器、轉換器、溝通途徑和支持手段，為權力和知識關係服務。權力和知識關係則通過把人變成知識對象而控制和征服人的身體。」（Foucault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8：27）在這樣的論述裡可以發現身體已經透過知識系統隸屬於權力的一環，而知識與權力交互作用所帶來的影響是人們可能忽略且不自知的。在知識與語言的層次進行對權力的詮釋，權力產生了知識，借由知識壯大與強化權力的存在，甚至鞏固了權力的地位，透過知識，人們建構了更多規範與原則，在這些現實中都隱含著集合社會、政治、經濟、歷史與文化等元素所形成的論述權力。我們不難發現，當傅科（Foucault）將權力等同知識的論述生產後，所有既定的物質與身體關係都得回到論述權力運作中，重新尋找發問位置。

回到我的研究中發現，過去一九四〇至一九六〇的年代裡，不僅可以從權力運作的機制中，發現改變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因素，更可以從大量出現在報紙、雜誌以及教科書內的資訊，了解當時建構一套看待女性身體

的方式。這與傅科 (Foucault) 提出權力與知識相互指涉，知識也是權力的表現方式相互契合。透過知識的傳遞，台灣婦女接收到更多如何穿著打扮的資訊，並且認識了有別於傳統的女性身體樣貌，使得穿著內衣的女性身體邁入美感問題的框架中。於此，我認為挪用傅科 (Foucault) 提出權力中的一環一知識體系，可以進一步了解：當時的社會，透過媒介描繪出什麼樣的女性身體、以及建構出何種女性身體美的圭臬，促使台灣婦女重新認識與重視穿著內衣的身體意義。

在本研究中討論傅科 (Foucault) 提到權力與知識作為管理身體的迥異手段，兩者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其實更應該值得關注的是，當我們以論述權力來解讀這一連串的身體行為實踐之際，衣服作為一件物件能透過外在機制與知識強諸在人們的生活中，使人們對於服裝物件有所改觀，那麼穿著內衣的身體受到控制與管理之時也是有其物質性的指標意義。換句話說，我認為僅從傅科 (Foucault) 管理身體的論述仍不能將我所要討論內衣與台灣婦女身體之間的關係完整陳述，因為當內衣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之時，穿戴內衣的女性身體更不能僅以論述權力的管理分析當時所建構出來的身體美感問題。於是，接著我透過巴特勒 (Butler) 探討身體作為問題的討論，回應與檢視女性身體是如何被建構出一套美感的框架。

2.3 視身體為問題與物質的探討

承接著傅科 (Foucault) 以權力解釋作為管理身體手段之一的討論後，我想透過 Butler (1993) 將身體視為問題 (matter) 作為發問的起點，更進一步去了解身體被建構出來的意義。Butler 探討身體的意義不脫離性別、性、權力、物質性 (materiality) 幾個面向的分析，在其研究中，除了提出自己對於身體與性之間的看法外，更對於過去研究性別與性差異、權力與靈魂、物質性與建構之間關聯的幾位研究者提出質疑，進而深化身體與性之間可能被忽略的發問位置，以及就目前討論身體與性之間的關係提出仍有不足的論述。

Butler 視身體為問題、是可以發問的位置，同時也將身體視為一個物質，探討其物質性被創造、建構與實現的過程。而在本文中能夠挪用以及帶著理論發問的位置，正是女性內衣也是個物質的同時，它跟女性身體的關係密不可分，透過人們給予的建構與合理化，內衣不再只是個物件，它也帶出來社會、歷史與文化上的問題，附加在女性身體上，又多了一種詮釋的可能性。身體本身就是問題，多了一件物件之後，它在生活中所呈現的又是怎樣的面貌，便是富饒興味的問題。我將從 Butler 循著傅科 (Foucault) 探討權力的脈絡以及發展出來身體中物質性的討論，來回應自己研究裡討

論身體美感被建構出來的可能。

探討物質與身體的概念，Butler 先回歸到亞里斯多德與傅科 (Foucault) 兩個就靈魂與身體的研究進行討論後，為身體之物質性給予定義。Butler 提到在希臘並沒有特別的指涉名詞來說明一個物件，物質向來被認為是潛在的及不能實現的，不過卻利用另一種說法與詞句來表示這物件的存在與用途，這種的表示方式我們稱之輪廓 (schema)，「它所指的就是形式、形塑、姿勢、呈現、外型，甚至是衣服，三段式推論的規矩，以及文法上的形式。」(Butler, 1993: 33) 亞里斯多德重視靈魂形而上的探討，於是，他認為假如物質本身沒有它自己的輪廓，那麼我們更不能了解其組成的元素，以及此物質如何成形。因此在古希臘時代中，亞里斯多德並沒有花很多的時間討論女性主義者們想要不斷引用重複的身體概念，因為物質性與理解能力對亞里斯多德來說並沒有很明顯的區分。

接著 Butler 認為傅科 (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及《性史第一卷》將權力觀點帶入身體與物質性作探討，才逐漸為物質的重要性給予指標性的定位。傅科 (Foucault) 認為靈魂之所以變成一個有標準及常態化的典範，是因為身體經過形塑、訓練、教養規範才產生的，也就是靈魂是基於身體有效地具體化才成為歷史上特別的理想想像。傅科 (Foucault) 甚至提出靈魂是身體的監獄 (the soul is the prison of the body)，他認為靈魂的探討不該是空泛的，而是一種權力的機制，身體上的框架與形式。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了解身體的重要與被建構出來的意義，才能回應凌駕於形體之上的靈魂。

2.3.1 置放在身體中的權力

Butler 承襲傅科 (Foucault) 的觀點，將權力帶入身體的討論，認為權力可以規範、維持及形成身體。不過，她指出權力不該是作為身體行動上的主體，而是在其本身作為特殊性的客體，也就是說，身體被視為問題之時，不該只有權力的脈絡來展開問題，而是以權力作為準則、規範身體的重要指標，同時我們應該將問題拉回到身體的物質性來討論，才能發現權力在其中的作用，而非一味以權力規訓主體的思考方式解釋身體的主體性。相對來說，Butler 回到傅科 (Foucault) 探討權力的脈絡來闡述身體之物質性的意義，並且認為權力運作創造出它所統治的主體，也就是權力運作在強制性權力關係中統治著這些主體，並以作為有效地輔助主體成形的強制性權力關係為手段來進行統治，這說明著，當我們看待權力作用於身體之時，卻忽略了權力也形成了身體。(汪民安等編，2003: 197)

在傅科 (Foucault) 對權力無所不在的論述中，的確，主體的物質性中，權力操作是重要的組成份子。但是，就 Butler 而言，傅科 (Foucault) 談論身體的物質性，不只是談到犯人本身，就連監獄都是在權力的物質性中被討論的。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是，物質性儼然成爲權力的一個效果，透過權力將物質性給呈現出來，不過，我們也應該要這樣思考，物質性在其本身的形塑或是組成作用中就是種權力的表現。這與我思考女性內衣放在歷史文明進展中，呈現的位置、被視之何種物質、就它自己的物質性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都是可以互相呼應的；換言之，當女性內衣當作衣服物件的時候，它的意義是遮蔽、禦寒；當作是女紅展演的時候，宣揚的是身爲女人的特質；不是僅用衣服的角度來看的時候，它與身體的關聯性又有種若即若離的曖昧。

而在本文中，我試著先從權力的施展，分析改變台灣婦女穿著不同於傳統式內衣的脈絡，並且透過知識重塑與建立內衣與身體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流變過程意味著論述權力左右著婦女們看待女性內衣此物質在社會中的發展。但是，不能就此以權力論述解釋穿著內衣的女性身體，換句話說，也不能以規訓的身體來詮釋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身體歷史，因爲在不同時代與文化中，賦予身體的意義與文化是不容忽視的，而這正是 Butler 提出必須要將身體也視之爲問題與物質來分析，才能發現在不同時期內的權力形塑出身體意義。同時 Butler 的論述也促使我去思考論述權力作爲切入探討物質與人、以及身體三者關係之際，不能一味著重分析權力運作的論述。當論述權力滲透在人與物質的關係裡頭、身體與物質之間的連接，它是需要去被討論與檢視的，甚至得挖掘更多造就權力或是與之相反的力量。除了在身體中的權力探討外，Butler 認爲關切身體必須得回到它作爲一個物質時所具備的物質性特質，其中包括了建構身體的概念以及從符號解構身體的論述。

2.3.2 身體之物質性的概念

在視身體作爲物質與問題的研究中，首先得掌握 Butler 界定身體與身體物質性的意義。她破除了性 (sex) 與性別 (gender) 是天生條件與社會條件賦予此兩者的區別，認爲就連性也是透過時間將此理性化的建構給予完整的具體化 (ibid, 1993:1)，換言之，Butler 認爲沒有與生俱來的男/女分別，因爲這麼完整的區隔都是在建構中展開的。基本上，在現在的認知中，性作爲區辨的流行，乃是因爲鞏固了異性戀的必要，才必須了解組成身體的重要性、甚至將身體的性給具體化呈現 (Butler, 1993: 2)。而身體的物質性都是可以透過解構來了解這一套劃分規則如何產生，又是在什麼樣的表演中被合理化。Butler 認爲在尋找女性身體的任何可能性與被框架

起來的意義，都需要回顧以及剖析對於身體此物質性的討論。於是，Butler 認為應該要從幾個個思考點切入身體的物質性。而其中在本文中與探討女性內衣、女性身體以及女人主體相關的面向如下：

(1) 將身體放入權力的脈絡中，身體的問題不能排除規範的基準，因為這些基準管理物質性的產生，以及掌握從身體上反映出來的意義。(2) 了解行為不只是由主體本身帶來他/她認為的行動，而是論述中的權力不斷反覆呈現此現象，既是規範也是限制整個行為。(3) 性 (sex) 的建構並非是身體上性別的建構，而是文化的規範控制身體的實現。(ibid, 1993: 2-3)

在本研究中將藉由 Butler 觀察身體之物質性的探討，發掘運作在論述中的權力如何改變行為，影響著一九四〇至一九六〇年間的台灣婦女穿著內衣後的身體觀感，同時透過分析各種行為論述的再現，建構女性身體美感的可能。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碰觸具有性別意義的身體所指涉出來的表徵話語，與呈現的符號圖像。於是，我們必須先了解 Butler 論及身體 (body) 與性 (sex) 既是符號也是物質一說之看法。

Butler 認為女性化的身體已經深根在性的特殊性中，當我們看待身體之際，我們已經將性此框架置放在問題內。打破性也是與生俱來的分類，Butler 關切的是，為什麼物質性 (materiality) 是不可化約的符號，如何成為不可或缺的符號。物質性本身是建構一說，已經除去讓物體性凸顯其他的可能性，就如同社會性別是表演性地產生，被內在的一致規範所壓抑，身體不是生物性的「自然的身體」，而是文化和權力所決定的。

因此，Butler 認為物質性除了透過文化建構呈現出來之外，難道它本身沒有可能就是種建構嗎？也就是我們必須了解物質性乃是來自其歷史緣由累積而產生，歷史重要的程度來自於性之間的差異、彼此作協商而決定。這意味的是，「物質是各種在性與性的論述中產生的沉澱物。」(Butler, 1993: 29) 所以當我們思考性與身體的關聯性之時，更應該反思在這兩者之間有何位置已經決定了一切，透過什麼物質、什麼論述，讓我們視之理所當然的女性身體成為本當如此的看法。而在我研究台灣婦女穿著內衣後所展現的身體觀感，即是帶著這個問題去剖析：被眾人視為該當如此、不可撼動的身體美感神話如何在性論述中衍生出來。

另外，Butler 探討身體的物質性時，顛覆過去研究中，總是將符號學作為研究身體議題的主要考量。Butler 指出：

符號乃因身體建構而生產與展現。物質並非簡單、無思想的所指，也不是如同表面上看到那樣的僅有那份外在的意義，而是在時間軌道中透過世俗化的操作而產生其意義。(Butler, 1993: 31)

這樣的論點其實與傅科 (Foucault) 探討知識與話語的構成有異曲同工之處。也就是，無論是身體或任何物質，都不能一開始就用解構的方式來解讀其符號意義，因為物質本身的概念已經因為其歷史結構、因果關係而被再次概念化，忽視這層已經存在的歷史過程，就會把問題簡化。這與 Daniel Roche 探討服裝在法國社會歷史變遷中扮演何種角色具有相同的研究脈絡。Daniel Roche 指出服裝不只是符號的呈現，也不是僅表現出外表的意義，能指與所指無法詮釋在背後的文明進展中累積所產生的物質性，以及就服裝在特定的時空中人們對此物件給予特有的意義，也就是差異性以及變動性無法全然透過符號學來拆解。

在這些國外理論的研究中，我認為一九四〇至一九六〇年間，台灣婦女穿著內衣之改變，可以循著 Daniel Roche 研究服裝史來探討社會、政治、文化與經濟的脈絡，進而從傅科 (Foucault) 觀察權力四散在社會中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去解釋哪些機制可能改變了人們看待身體美感的價值觀，然後再回到 Butler 探討身體為何是重要的物質，其物質化的過程如何被建構出來。這意味著要了解身體的意義，就必須回到它如何以及為何重要的脈絡中詳加討論。我認為透過 Butler 的論述，會有助於深入了解台灣婦女看待穿著內衣後的身體，有著什麼樣的文化與歷史建構於其中，進而看到女性身體美感的問題。

第三章 探問台灣婦女選擇中西式內衣的流變過程

在進行尋找一個可能影響台灣婦女摒棄舊有的傳統內衣，選擇西式內衣的過程裡，我先回顧屬於中國的內衣做些簡略的介紹，以了解在中國內衣史中，有哪些詞彙是代表著女性最為貼身的衣物，與它在不同時代中以何種樣式呈現。

現今論及的女性內衣是承襲著西方內衣的演進史而產生的服裝，也就是大家所俗的「胸罩」。但是在中國服裝史的脈絡中，也有屬於自己的內衣，即為「肚兜」。不過，「肚兜」是因襲清朝當時用來稱呼內衣的名詞，中式婦人的內衣，其實隨著改朝換代，呈現的樣貌與賦予此服裝的稱謂，都有些許差異。在不同年代的歷史文獻中，可見婦女的內衣被稱之為小衣、褻衣、腰巾、小衫、抱腹、纏弦、抹胸、抹腹、裹肚、兜子、訶子、袒服等。

根據周迅、高春明（1995）、吳麗娟（1989、1992、1998）研究指出，在中國歷史中於西元前八百一十八年就有內衣史料記載，內衣稱為褻衣，也為衷衣，也就是貼身穿的衣服。從司馬相如《美人賦》可見：「女乃弛其上服，表（露）其褻衣。」因為平時不能輕易示人，所以稱作褻衣。左傳也載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期袒服，以戲於朝」。杜預注，左傳曰：「袒服，近身衣。又云：婦人近身內衣也」。後漢書文苑傳，爾衡：「於事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南北朝之際，婦女內衣別名為「抹」，在梁劉綰《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悅傾城詩》中出現「抹小稱腰身」的敘述，以及隋煬帝的《喜春游歌》也有「錦袖淮南舞，寶抹楚宮腰」的詩句，我們皆可以從中看到當時有關女性穿著內衣的描述。

到了唐朝，婦女身著名為訶子的內衣，其作用有了重大的轉變，主要功能已經不是護腹，而是遮蔽胸部。換言之，此時的女性內衣與現代所認知的內衣意義有些相似性。根據宋高成撰事物紀原載文中表示：「唐楊玉環私安祿山，指爪傷胸乳間，乃製訶子護之。」訶子即屬抹胸，也就是最內層的衣服。宋朝以後婦女日常生活的服飾出現「抹胸」「裹肚」，皆為貼身的衣服。清埤類鈔記載：「抹胸，胸間小衣也，一名抹腹，又名抹肚；以方尺之布為之，緊束胸前，以防風之內侵者，俗稱肚兜。男女皆有之。」

明代婦女的內衣出現背心的樣式，此時內衣的樣式比較奇特，在腋下部分還有一帶可以將乳房部份裹緊，依稀可見的是，在明代已有束胸的風氣。明代小說中常提及主腰，即是此種內衣的說法，但與西方的束衣相比，

主腰並不能將胸部塑造出隆起的形狀，而且也無束腰的功用。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九回：「許氏洗了浴，點了盤香，……下面穿了新做的銀紅棉褲，兩腰白繡綾裙，著肉穿了一件月白綾機主腰。」《水滸傳》第二十七回「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擦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

到了清朝，抹胸的樣式有兩種，俗稱「肚兜」或是「兜肚」為其一，另一種則是束於腰腹之間，為之「抹胸肚」。清代男子也穿抹胸，一般做成菱形，上端部分裁為平形，形成五角，上面兩角及左右兩角綴以帶子，使用上面兩角帶子繫於脖頸，左右兩帶繫結於後背。而一般泛稱「肚兜」作為中式內衣的代表，就是延續著清朝指稱內衣的用詞與款式。

循著中國式的女性內衣歷史脈絡下來，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樣式開始在日治時期進入另一個里程碑，也就是肚兜與西式內衣相遇之際。本章旨在說明，歷經不同政權統治的台灣，婦女們透過哪些方式改變了內在衣服的穿著，而這些促使婦女們接受新式內衣的原因，又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層面下展開的。另外，在這過程中，內衣對於台灣婦女的意義，是否也在接觸西式內衣後有所轉變。

無論是在哪個時期的治理下，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習慣，都無法避免從風俗習慣、以及政治力介入層面進行討論。我們可以問的是：是什麼樣的教化手段，讓婦女們認知到穿著內衣的必要性與意義？當婦女穿著內衣與其手工巧藝息息相關之時，透過體制的教育與規範，是改變或者強化了婦女穿著內衣的想法？有形與無形的機制規訓中，婦女們穿著內衣的意義，又反映了社會上怎麼看待女性穿著內衣的身體？這些問題都是在這章節中，將要逐一展開的主要分析內容。

3.1 傳統內衣作為展示女紅的呈現

在台灣的传统社會裡，女紅是展現婦德的一種方式，舉凡印染、刺繡、縫紉、紡織等工作都屬於女紅的範圍內，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便將女紅與縫紉技術劃上等號。中國女紅文化不僅僅是傳統農耕社會底下的產物，作為劃分男耕女織的生活型態描繪，同時也為婦女持有此技術作為生存之道與持家之本的另一種詮釋。陳惠雯研究大稻埕的婦女生活時，也提到「做女紅是女性必須學習的手藝，自己縫補衣物、刺繡和做鞋。」（陳惠雯，1999：63）

從實用性功能看女紅意義，是婦女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技能，尤

其是對於身處過去農耕社會的女人來說更是如此。然而，從藝術層次來說，透過女紅文化的展示，可以看出婦女在此展現其手巧心思細膩的一面，也就是在社會文化脈絡外，女紅呈現了審美與藝術的價值。（胡平，2006：9-10）

所謂傳統的中式內衣也就是「肚兜」，它隨著歷史朝代與當時穿著流行的影響，呈現不同的樣式²⁴。現在一般指稱的肚兜，除了具有保暖與保護身體的實用功能之外，還有禮俗制約下呈現的象徵意義。最為重要的是，肚兜上的刺繡代表一種表現作用，透過縫製衣服展現自己與他人不同的巧工與心思，藉此展示自己的女紅手藝²⁵。

首先就內衣的實用性來看，這件小小的衣服，根據老一輩的說法，其功能性最主要是能擋風護腑。古人認為保護肚臍能杜絕受風寒之疾，同時保護腸胃健壯，於是有穿內衣的必要性。主流內衣仍是為肚兜稱霸的年代，男女老少都是穿著此件衣裳的，並不是只有婦女才穿著，只是縫製皆來自婦女巧手。所以單就婦女跟肚兜之間的關係來說，這件內衣不僅只有功能性的意義，尚有婚嫁制度下的禮節象徵意義與社會功能。

根據吳麗娟（1992）指出，在論及婚嫁的台灣習俗中，女方陪嫁的嫁妝裡，要準備六到十二套內衣。因為內衣在傳統習俗中代表財庫的象徵意義。另外，新娘要特別為新郎準備一件「女婿兜」，也要準備許多不同花紋的肚兜，作為回贈或是答謝親人的禮物，同時要送給公婆各一件，表示祝福，意思為「兜財」。除此之外，嬰兒從出生後四個月開始也會使用肚兜，通常都是從外婆家縫製好送過來。女方對於女兒生下孩子，必須要贈禮的習俗是相當重視的，所以準備親手縫製的肚兜，除了是表示喜氣和保平安之意，也是因應傳統規範的制度，讓男方知道女方很關心女兒的生活。所以，我們可以從傳統習俗中得知，肚兜這種傳統式的內衣與小孩和婦女的關係甚為密切。現齡七十三歲還在擔任兼職教學一職的吳女士甲，於二十年華嫁為人婦，也就是中央政府來台不久之際。她表示：

我自己在結婚的時候，也親手縫紉了十套新的內衣（馬甲樣式），作為嫁娶的陪禮，為此還特別去上課。雖然那時候縫製的內衣已經不

²⁴ 肚兜的演變歷史在尹玫瑰（2001）和周迅、高春明（1995）的研究中，已經有詳盡的探討與圖文解說，於此就不加以贅述。請見附錄圖片一。

²⁵ 荻村昭典（2000）在其研究服裝社會學中，認為服裝最為主要的特性為保護作用以及滿足自我表現慾望，隨著歷史文明的演進，服裝納入社會文化體系中，增加了許多特性，好比衣服成為民族文化的象徵，以及有自給自足的特性，衣服製作的手工業技術被稱為家庭縫製。（荻村昭典，2000：19-21）

是肚兜的樣式，不過一切習俗還是要跟著來，也讓公婆知道我會縫紉。(吳女士甲)

女紅的定義雖然被簡化成縫製技術，不過刺繡技藝在傳統內衣裡還是具有其特殊性：肚兜上面的刺繡巧思，一針一線代表著婦女在時間和精力上，更能夠呈現婦人在縫紉上的技藝。衣服上面的刺繡圖案多半不離喜事、歡樂、平安、恩愛與吉祥等意境，透過色彩與圖案的顯現，傳遞了婦女的巧工之外，也藉此達到感官視覺上的調情作用，有著現代人所謂的情趣意義。(吳麗娟，1989：96) 這與國外研究指出內衣與調情一直是密不可分的論述如出一轍²⁶。

以服裝上的刺繡技巧到縫補製衣過程，作為檢視婚前的婦女能否成為好太太與好媳婦的標準，不僅存在於台灣傳統社會中²⁷，在日本社會裡也可以看到有這樣的標準存在。這能說明殖民政府統治台灣後，更加重視台灣婦女的縫紉技術與家政教育的培育。在日本的社會裡有著與清代時期的台灣相同的傳統價值觀，如他們視製作衣服的職業技術與家庭勞動並列，於是，婦女居多被要求在出嫁前都要學會一定的縫製技術。(荻村昭典，2000：21) 這樣類似的傳統價值觀一直延伸至殖民政府殖民台灣時期，尤其殖民政府殖民台灣的後半時期間，實施皇民化政策之際，更針對婦女進行思想灌輸，透過婦女鞏固家庭的中心價值，以及教導婦女做為人妻應該具備的條件，這時也能看出殖民政府開始重視本島婦人的地位。

在經濟與思想戰爭下，確立家庭型態變成為婦女的重要任務，但是本島婦女居多為未受教育、教養薄弱，於是，從婦人教育來改善家庭概念是首當其衝的。另外，女子青年也是殖民政府實施教化的一個主要群體，在訓練女子青年中，就有明確的表示該學科含括修身、裁縫、禮儀作法、育兒、花栽培、野菜栽培、急救法、家庭防空等，促使她們認知自己是皇軍的妻母，應該具備哪些技能與手藝，才能作為後方支援。(楊雅慧，1993：71-79)

即便肚兜隨著時代的進步以及政策影響台灣婦女穿著，不再是主流的女性內衣款式，藉由縫製內衣與刺繡圖騰作為檢視媳婦女紅技能的習俗也

²⁶ Fisher-Mirkin (1998)、Steele (1996) 分別指出內衣一直是調情的重要工具，它暗示著褪去外衣後，預告著暴露的興奮，因而強化對性的好奇。

²⁷ 根據卓意雯 (1993) 的研究指出，清代時期的婦女從小就要與母親分擔家務工作，學習如何挪起針線剪裁刺繡，或是幫忙修補破爛。台灣婦女要熟悉一切的家事工作，事實上是以便能為稱職的媳婦或是母親，而出嫁前所有訓練的目的，也是為了婚後能善盡婦道。(卓意雯，1993：64)

逐漸淘汰，但是，大多婦女的內在衣物還是透過親手縫製而成。研究大稻埕的婦女生活一書中提到，「做女紅是女性必須學習的手藝，自己縫補衣物、刺繡和做鞋。王女士表示：古早人的內衣都是竹紗、麻的，很涼，白色的內衣和兩個口袋都是自己慢慢縫的。」（陳惠雯，1999：63）也就是即使婦女穿著內衣樣式有所改變，縫製內衣這樣的女紅文化仍然承傳保留下來。

而研究中三位身份不同的受訪者，都有縫製內衣的相同經驗。張女士甲年近八十歲，是位從日治時期就居住在台灣的婦女，從小在山上長大生活相當困苦，家裡經濟狀況較為貧寒，她並沒有就學唸書，至今與先生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居住在山上。另外，吳女士乙從小出身於富貴人家，家裡食用的鹽、糖都不需煩惱，是為家中還有僱請工人的千金小姐，於日治時期即受相當完整的教育，就讀至高等女子學院（現在的高中學歷），精通日語、國語、與台語。曹女士是位年逾七十的女士，小時家境狀況也不錯，家裡也有提供她上學就讀，並且在完成學業後擔任警察一職。她們三人皆表示，當時她們身穿的內衣皆是手工縫製而成。

以前生活貧苦，都是自己手工縫製衣服，去看別人兜售的款式，然後自己回來憑印象做，內衣褲就利用麻布袋，自己縫一縫就可以穿，沒有辦法去買啦！（張女士甲）

內衣（背心樣式）都可以自己做，甚至當媽媽了也是自己做內衣給小孩穿，很簡單的款式像背心一樣，做內衣不是困難的事情。（吳女士乙）

我媽媽會做衣服，就穿媽媽做的衣服，內衣（背心樣式）也是一樣啊！那個時候的台灣婦女都幾乎會自己作衣服，大多數的人們都是穿家裡自己縫製的衣服，除非有錢人家才能消費的起外面賣的洋服、或是去給人家訂作衣服。之後給孩子在幼年穿的衣服，大部分也是我自己縫製的。（曹女士）

從上述的訪談內容可以發現，即便是家中經濟狀況相差甚遠，個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也是南轅北轍，但是她們的內在衣服都是經由手工縫製而成。製作內衣對於當時的婦女而言，可說是如同雕蟲小技一般的稀鬆平常。並且，我們可以知道穿著自製的手工內衣，不僅是因為縫製技術成為家庭勞動下的一環，還有外在生活條件的影響，導致婦女們從母親那裡習來縫補織衣的技巧，衣裳皆可以自給自足。延續著清代社會中，台灣婦女多半從母親習得縫補織衣的技術，再加上日治時期針對女子家事技藝的宣導與

教化，台灣婦女們擁有縫紉內衣的技術，成為基本的生活技能。

然而，中央政府來台之際，大批外省族群舉家移民到台灣，帶來的縫製文化與日本治理下的台灣呈現迥異的情形。這時候縫紉技能，已經不侷限於家庭生活與禮俗規範之中，更不只是婦女才擁有的技藝。在這股移民潮裡，有許多人是裁縫師、布料行老闆。根據葉懿慧（1996）指出，許多外省人打著「京滬」之名，以經營美容院、旗袍時裝行、布店、及百貨等為生，經營商家與縫製衣裳的師傅也不限於女性。從葉的研究裡，可以發現他以些微的篇幅，說明當時社會的流行風貌，而我將透過兩位外省籍婦女的訪談，為前人的研究作更為細膩的補充。

這兩位外省籍的女士，一位是現齡五十六歲的郝女士，目前仍在經營旗袍訂製的服裝店，於中央政府遷台後舉家跟隨遷移來台。就她印象中，內衣雖然在求學過程中沒有那麼需要，不過都可以上街買的到，但還是有專門的人士在訂製，而這些專門為人製作服裝的師傅，除了有女性外，也有男性擔任此職務。另一位黃女士現齡已經八十四歲，出身於上海，從小過著優渥的生活，與姊妹和同學常去逛百貨與挑選內衣。因為先生被調任至台灣擔任區長，於是在中央政府遷台後，辛苦輾轉至台尋夫。在生活穩定後，前往啓聰學校擔任教師一職，目前的生活屬於退休狀態。

我從福建過來，當時從大陸移民過來的有許多人都是裁縫師傅，尤其是沿海地區。我先生是學這行做旗袍，我跟先生學做旗袍的，那時候從大陸過來的裁縫師多半是男性，至於內衣（胸罩樣式）的盛行其實就印象而言，大概也是我們過來之後才開始，也有人為了要穿旗袍而去訂作內衣。（郝女士）

在上海的時候我都是去百貨買內衣（胸罩樣式），內衣的樣式已經很像現在的胸罩，只是做的比較尖。到了台灣，也是去委託行購買，或者請人專門定做，沒有自己在縫製的。訂作內衣的師傅有男有女，不過還是找女師傅比較妥當些。（黃女士）

對照之下，我注意到，在中央政府來台治理的年代，女性內衣的縫製技能已經逐漸拓展至消費市場中，並非侷限於個人製作供給自家穿著的範圍，或是納入風俗民情之規範裡。至於女子是否會縫製內衣，也不再成為判斷女子有沒有婦德的標準。此外，縫製技術也不只是婦女的專利，男人也開店販售服裝，為女子量身訂作衣服。而本省籍婦女更因為選購內衣的場所逐漸增多，以及訂作手工內衣的風氣盛行，於是，自行在家縫製內衣給家人與自己穿著的習慣，也沒有以往般普及。從以下訪談內容可以得知：

我們小時候穿的內衣（背心樣式）都是媽媽縫製的，在鄉下生活比較困苦點，家裡費用吃緊，媽媽上過學也幫人家縫衣賺錢，所以都是穿媽媽做的內衣和衣服。大概上了高中（民國五十六年之後）自己才開始去商店買內衣。（李女士）

雖然我們小時候穿的不是肚兜，也不是胸罩，不過媽媽並不會縫製衣服，都帶我們去買小背心樣式的內衣，或是我們姊妹們就一起上街買。（童女士）

李女士出身於鄉下務農的家庭，現齡五十二歲，所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學歷，畢業後及赴台北工作。由於母親會自己縫製衣服的技能，所以小時候的內衣與衣服都在母親的包辦下不用費神。她表示加上媽媽是受過日式教育的洗禮，並不會特別要給小孩穿西式胸罩的內衣來凸顯胸部的形狀。所以，自己開始注意到要穿內衣，是在求學過程中自己比別人發育的還要好，受到同儕眼光的注意，才開始學著要去購買內衣，因為自己的縫紉技能只有達到一般的縫補衣物與繡花程度而已，也不會自製衣服與內衣。另一位童女士是現年已六十一歲的外省籍婦女，擁有大學學歷。隨著母親從上海遷台，由於母親並不會任何的縫紉技藝，所以無論是穿著什麼樣的內衣樣式，都是要去店家購買。

從上述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不同年代的婦女中，她們所具備的女紅技能的意義隨之轉變，能呈現傳統婦德的縫製內衣這一技能也在時間軌跡中漸漸消逝。婦女的女紅文化在傳統社會裡是備受重視的一環，這其中的原因包含婚禮習俗與整個農業社會下對於婦女該具備此技藝的價值觀相當深厚。雖然到了中央政府時期，因為外省移民族群引進新潮的商店與百貨，婦女可以透過商家購買到內衣。男性裁縫師加入縫製衣服的市場，縫製內衣不再是女性專有的技能。不過居住在台灣的婦女多半會這項製衣技術，加上城鄉差距與經濟能力的差異，許多女性穿著的內衣還是在家庭勞動範圍中，母親為子女縫製內衣之景仍舊可見。但外移來台的族群，因為外在穿著打扮的需求，開啓手工內衣的商機，於是，兩種女性內衣的消費型態在二次戰後是並存的。

總之，從傳統內衣肚兜的製造過程裡，可以得知婦女承襲習俗規範而擁有縫紉技術，這項技術與當時農村社會發展出家庭勞動中的縫紉職業有密切相關。此外，除了傳統價值觀以及家庭因素造就婦女會縫製內衣的技術之外，更因為殖民政府時期針對婦女的技藝培訓，尤其是縫紉技術的訓練，使得台灣婦女視縫製衣裳為家常便飯之事。因為婦女縫製技術的普及，內衣樣式在層層教育與推廣下逐漸西化，使得婦女穿著的內衣與縫製

的內衣不再是肚兜的樣式，更因此影響著婦女對於內衣的認知。在這節中，我們可以發現的是，傳統內衣對於婦女的意義，有著以覆蓋身體及禦寒保暖的功能性價值為首的首要意義²⁸，以及在禮俗脈絡中的象徵婦德與調情的象徵性意義。同時，我們可以得知傳統內衣樣式所承傳下來的女紅文化，並不因為後來內衣樣式的改變而消逝，反而隨著縫製內衣的技術在日後教育政策推廣下，開啓了手工內衣的消費市場。

3.2 權力作為改變婦女內衣的中介者

台灣婦女從殖民政府時期開始逐漸摒棄傳統式的內衣，這整個改變過程，不僅僅是單純衣服的流行與時尚影響，在學校教育方針、體制外的服裝學院、以及政府運作下的法令與組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婦女西服的改革。台灣婦女縫紉技術的養成，因為外在力量的介入，將屬於家庭內的縫製技藝轉移至體制內的課程訓練，此時我們可以發現，教育對於婦女穿著內衣的樣式影響甚鉅。誠如 Entwisle 提到「著衣是一項不斷發展的實踐，需要知識、技術與技能。」（Entwisle 郜元寶等譯，2005：2）

在這節中我企圖討論的是，台灣婦女的內衣開始西化，婦女們摒棄傳統肚兜的選擇，與知識及技能有何種密不可分的關係。隸屬於家庭內的女性縫製技能，如何邁向成文規範下體制內的課程，使得台灣婦女們經由知識的灌輸與技能的訓練，開始接觸與接受西式內衣的樣式，並且開啓她們對於身體美感的認知。我發現在殖民政府時期與中央政府時期的治理下，交錯隱含著三種權力論述面向，直接與間接地改變婦女穿著內衣的習慣。也就是說，西式內衣的樣式以及穿著概念，分別透過政府施展公權力：頒佈的政策、學校體制內的教育政策，以及女子技能補習班的盛行而被引進。因此，我透過這三種面向的討論，分析台灣婦女接受新式內衣是受到哪些因素左右，而婦女們因為穿著別於傳統式的內衣，開啓身體與內衣之間什麼樣的新認知。同時這些面向正是前人研究中所忽略的一環。

3.2.1 法令與組織間接影響女性穿著打扮

殖民政府在接收統治台灣之際，著手教化人民改變服裝的方針，在各個時期採取不同的態度與策略。沿襲清朝接收台灣的管理方式一般，剛開始都是針對男子的服裝儀容進行改革，日後才是要求婦女摒棄中式傳統服裝。

²⁸ 根據小川安朗指出「穿衣服已成為習慣的人類，衣服從只有覆蓋身體的作用向裝飾身體的階段進化。」服裝還停留在最為基本的訴求，也就是覆蓋身體的功能性中，這就是個未分化的社會（荻村昭典，2000：26）

早期日本治理台灣之時，認為風俗習慣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所以採取較為放任的態度。根據〈風俗習慣與台灣〉記載所云：

移風易俗乃古今東西以為最難者，新政與新政被治者之間，常畫鴻溝，本為常事，尤其如中國種族，於此點以頑牢不可拔見著稱。是則，領有本島以來，關於人民之風俗習慣不加任何干涉任其自由。（臺灣慣習記事，1902，2-11：216）

於是，在殖民政府接管台灣初期，政府及民間組織僅僅對吸食鴉片、男子辮髮、及女子纏足這三大陋習進行較為積極的改革，特此成立「本島人風俗改良會」²⁹，藉此大力推行改善台灣社會中的傳統習慣。到了一九三七年，殖民政府頒佈「國家總動員法」與「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要綱」法案，這個時候才把改革對象轉移到台灣婦女身上，鼓勵台灣婦女在平日的服裝打扮上改為穿著和服。

而在日本治理台灣的晚期，成為婦女穿著服裝改變最為激烈的時期。一方面是日本在本土也倡導傳統服裝的改良運動，希望和服能夠改良成為方便活動的服裝。加上和服製作過程繁瑣、費用較高，穿上這種傳統日服之後反而造成婦女行動不便。相較之下，西洋服裝樣式顯得簡便許多，並且婦人們可以自行縫製，穿上洋服後她們在活動也較為方便。政府考量這些因素後，開始提倡婦女穿著洋服。我們可以從以下日本人討論台灣服裝改革的文章中，瞭解殖民政府在台推行和服的不可行性，而他們認為婦女穿著洋服才符合時代的需求。

早在四百年前兩森芳洲即有創見，撰寫「たはれ草」大談和服需要改變，只是當時挑戰傳統服飾的前衛看法並沒有風行當時，直到大正初年，在東京上野的博覽會中展示了改良版本的和服：袖口改寬闊且袖長縮短、外套改成短版式的，如同今日的西服一般，和服才開始邁入另一個時代。同時，因為大正期間發生過相當大的地震天災，多數人由於身著和服十分不便，難以逃困，但是アッパッパ³⁰這種簡便服就方便行動，在當時也造成一股流行風潮³¹。

²⁹ 王詩琅（1974）在〈日據初期的習俗改良運動〉文中提到「明治三十三年（1901年）籌組天然足會。大正三年（1914年）組織「本島風俗改良會矯」正辮髮、纏足弊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對髮不改裝會。」（《臺灣社會生活》，民俗叢刊 106 號，中華民俗協會，頁 164、167、170）。

³⁰ 日語中的土語，意思為簡便服。

³¹ 作者宮本延人等三人在〈服飾鼎談臺灣と服裝〉文中以對談的方式，討論殖民政府

捨棄活動上比較方便的台灣服相當困難。如果和服非常便利，人們自會穿用，然而和服卻是價格昂貴又使行動不便，將台灣女裝改為洋裝是比較有可能的，獎勵和服則毫無意義。(中村哲人，1941：11)

從上文中可以得知，殖民政府並未強行要求台灣婦女接受和服穿著，倡導和服作為主要婦女服裝的論述也在日治晚期逐漸消逝。不過，真正透過明文規定介入婦女服裝的時間點，是實施皇民化運動之際。由於中日關係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故日本在台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希望台灣人成為具有日本精神的皇國國民，隨即推行婦女服裝改良運動，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台北州支部首先發起了「本島婦女服的改善運動」，此後關於台灣的服裝與婦女穿著討論常見於報章雜誌中³²。德永秀夫針對此時的婦人服改善運動提出一些看法，他在〈本島婦人服の改善に就いて〉一文中指出：

服裝的改變是皇民化運動中的重要一環，包括服裝的樣式與穿著氣質都是必須要符合國民精神，因為本島人的服裝與支那還是密不可分，沒有與國民精神與內地文化相互融合。於是，希望藉此能夠摒棄支那式穿著與支那文化所蘊育出來的教養，改變本島人的氣質與教化之，使他們成為皇民的一份子。同時重新培育他們對於國家的意識與情感。

文中將婦女服裝分為兩部份，一種為青年女子的服裝：年輕女子多半不太喜歡支那式³³服裝，愈來愈多人能接受洋服樣式，同時也願意穿著和服，只是和服穿著複雜，價格也較為高昂，所以接受度還不是那麼普及。另一種為中年女子的服裝：中年女子的教育程度居多較低，也沒有國民的自覺能力，當然也不太會想要改變既有的服裝。然而，台灣婦女對於殖民政府改善本島婦人穿著也提出了概括的六項原則³⁴，希望國家能夠將原有衣服的方便性以及習慣考慮進去，使她們在穿著打扮上不與之前的習性有所太大的革新。

在台推行改善台灣服裝的議題，他們認為改變台灣婦女服裝不能只有提供穿著和服一種選擇。(1941:66-67)

³² 德永秀夫(1940)在臺灣時報發表〈本島婦人服の改善に就いて〉，立石鐵臣(1941)著作有〈本島人の女性服装〉，宮本延人、大澤秀雄、佐多長春(1941)於臺灣時報發表〈服飾鼎談臺灣と服装〉，黃氏鳳姿(1943)著有〈本島婦人の服飾〉。

³³ 當時的文章與雜誌皆稱台灣人為本島人，日本人為內地人，支那人為中國人。

³⁴ 德永秀夫的文中提及改變台灣負服裝的六項原則，主要是針對台灣婦女外衣的領口鬆緊、衣袖長短以及裙擺寬度、褲子收口作適度調整，這樣的改革一方面符合日本婦女服裝文化，另一方面也保留婦女穿著中式服裝在活動上的方便性。(德永秀夫，1940：38-41)

而其實本島婦人服改善案的主要的對象是中年以上的婦人，因為她們的教育程度低，也沒有多機會接觸新來的服裝文化，所以政府透過法令使其改變原來的穿著是最為直接的方式。而改變服裝的根本方針為：（1）使本島婦人服外觀上看起來等同於皇國婦人的造型，（2）適合本島婦人的生活型態，但是也要配合皇國婦人新式服裝的標準，（3）無論是改變的服裝還是新式服裝都要符合經濟的、便利的以及簡便的裁樣。（德永秀夫，1940：38-41）

在這一連串倡導本島婦人服改善方案中，我們可以發現法令干預婦女穿著打扮，只能就外觀衣服去要求與改革。同樣的，能夠被檢視符合標準規範與否的也是外衣，並無法直接影響婦女內在衣服的選擇。但是，我發現在政府鼓勵台灣婦女穿著和服及倡導西服洋化之時，已經間接影響了內衣的穿著樣式。因為如果外在的衣服都已經受到西服的薰陶而演進，可以想像的是，內在衣服也在這股風潮中漸漸地被汰換。

我們可以說，殖民政府政權透過法令的頒佈，逐漸地影響人們的穿著打扮，這是一種施展論述權力的方式與管理手段，並且以一種直接且明顯的方式，介入人們既有社會中的風俗習慣，改變生活長久以來的服裝習癖。雖然在驗收成效上，仍須要時間作為緩衝的媒介，並且這一連串改革婦女服裝穿著的目的，是因應著當時實行的皇民運動相關，我們卻可以從中得知，台灣婦女在這波改革中，增添接觸洋服的機會，同時也漸漸拋棄舊有的中式服裝。另外，我覺得最為直接與改變婦女內衣相關的因素，則是縫紉技能納入體制之內的事實。經由教化與知識的傳輸，確實能夠讓台灣婦女對於她們原本所穿的內衣有所改觀，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婦女接觸到與肚兜不同的內衣款式，也就是學校體制強化女子縫紉技術之餘，更進一步指導她們該怎麼穿著、縫製什麼樣的服裝，同時將服裝中的文明觀念帶入內在衣服裡，使台灣婦女們在穿著內在衣服上有著與「以前人」不同的知識。

於是，我接下來要探討的是，日治時期間政府從設立女子學校，以及將剪裁、縫紉等技能納入女子必須學習的課程，從中教育婦女們變更穿著內衣的習慣的過程如何形成。而至中央政府時期的學校體制雖然也有將縫紉等手工藝課程納入體制中，不過因為時局環境影響，以及看待婦女的製衣與裁縫等技能不如日治時期般受到重視，那麼在這個時候政府又是如何塑造與建構婦女們穿著內衣的意義。

3.2.2 女子縫紉教育於學校體制內紮根

殖民政府在接收統治台灣之際，著手教化人民改變服裝的方針，於各

個時期中採取不同的態度與策略。沿襲清朝接收台灣的管理方式一般，剛開始都是針對男子的服裝儀容進行改革，接著才是要求婦女摒棄中式傳統服裝。我們可以先從日本政府積極設立女子學校得知，殖民政府希望藉由教化改善存在傳統社會中深厚「男主外，女主內」及本島婦人不需要上學的觀念，同時，屬於家庭勞動的女紅文化，在這個時期中開始納入學校教育體制中。「日本時期的女子教育有設立裁縫科與家事科，分別教授學生縫補、製衣、刺繡及食衣住行等知識與衛生觀念。」(游鑑明, 1988: 122-123)

回顧在殖民政府統治台灣的的前二十年，台灣人就學情形並不普遍，加上還有私塾書房等教育制度競爭，日本人辦理的公學校鮮少台灣人就讀。相對地，女子就學的情形也不普及，最早有基督教會提供女子就學的機會之外，就沒有其他提供女子上學的地方。直到一八九七年，殖民政府為了施行女子教育，才設立了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校，鼓勵女子唸書以及學習技藝。陸續從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成立公立女子學校，包括普通中學與高等女校³⁵，此時台灣女子的教育體制才算完整落實。

而女子學校的設立，不僅是提供了台灣婦女就學與習得識字的機會，還將女紅文化帶入課程中，希望透過教育體制訓練婦女的手工技能。換言之，在台灣傳統社會中，認為婦女應該擁有的女紅技能，在這個時候收編納入體制中。並且我們可以從一系列的教學課程安排裡發現，殖民政府相當重視女子的女紅技能。

在殖民政府治理下的女子教育體制中，我發現政府很早就將縫紉與手藝視為女學生必須學習的技能。一九〇四年公學校就正式將女子裁縫技能編列為課程之一，其他教學科目有修身、國語、漢文、體操、裁縫、唱歌、手工、農業³⁶。專門教育女子的學校，課程包含修身、日語、習字、裁縫、編織、造花、唱歌。重要的轉捩點是在一九一九年創立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³⁷，也就是女子可以受更高等的教育。同年，台灣總督府頒布了「台灣教育令」，此時確立女子職業教育的規定，這也表示殖民政府開始重視本島女子的教育。

³⁵ 1898 年成立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手藝科、1907 年設立台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附設於台灣總督府高等中學校內）、1919 年台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以及 1922 年因應「新台灣教育令」設立公立高等女學校。（張妙娟，2000：71-76）

³⁶ 資料來源詳見：許佩賢（1993），〈塑造殖民地少國民一日據時期台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頁 118-119。

³⁷ 杜武治（1997）提到，台灣的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修業制度，跟日本國內的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還是不同，修學年限比日本國內還要少一年。（1997：178）

一九二二年修正台灣教育令，目的是爲了弭平內地人與本島人的教育差異、不平等對待。其中女子普通學校裁撤，改爲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此時增加女子受中等教育的學生數量，促使女子的就學體制更爲完善。雖然高等教育中技藝教育的要素減弱，不過新設的「家政」科目取代了過去的技藝科目，而其教學比重僅次於「國語科」。（榎本美由紀，1990：8）於一九四一年殖民政府又再次調整教育法令，在此改革中特別側重家政科的課程，視家政課爲高等女學校中重要的課程之一。（杜武治，1997：227-229）而至一九四三年針對台灣公立高等女學校，將繁複的課程分爲基本教科（包含國民科、理數科、家政科、體鍊科、藝能科）與增課教科（包含家政科、實業科、外國語科）兩大類，這時候更確立了家政科課程的完整綱要，也就是將所有女紅技能一起併入其中。

從上述回顧殖民政府成立女子學校以及將女紅技能列爲女學生學習課程之一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得知，女紅技術細分成各種名目的課程，到後來成爲整個女子教育體制的完善中的重要科目，也就是殖民政府設立「家政」課，概括收編所有的女子技能。也因爲「家政」課程的確立，日治晚期，成立許多關於女子技術學校，就是以教導「家政」爲主。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開始，陸續有許多公、私立的女子技藝學校、家政學校、女學校成立³⁸，皆在宣揚女子需習得家庭生活之技能、以及涵養婦德等目的。殖民政府希望藉由學校機制教化台灣婦女，成爲他們理想中的女性。也就是婦人習得裁縫手藝不僅是對家庭有幫助，更可以靠這項技能獨立生活與謀取就業機會。從過去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女子家政課的確立以及蓬勃發展的女子技能學校，都是說明殖民政府除了重視女子在學業上的精進之外，更在乎她們有無習得其他技能，以及能否在往後擔任起賢妻良母一職。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在農業社會中的台灣，大家根深蒂固地視女紅文化作爲評斷婦女的重要指標，於是成爲婦女們不可不會的技能之一。爾後，在殖民政府治理台灣之際，又將女紅技藝收編納入體制中，所以對於受過教育的女子來說，縫補織衣更是駕輕就熟的技藝。女紅技能從屬於家庭的勞動工作轉而成爲學校培訓目的之一的過程中，我認爲女紅縫製技術收編在學校體制裡，是最爲影響婦女穿著方式的一種手段。學校作爲權力施展的場域，在位者透過傳授知識之際，教導婦女縫製什麼樣的服裝，潛移默化中也改變她們的穿著打扮習慣。同時可以說明的是，掌權者認爲

³⁸ 根據榎本美由紀（1990）研究指出，1934年台南市立女子技藝學校成立、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會則設嘉義市立女子技藝學校，同時私立台北靜修女學校新設特別科，傳授家事、手藝、裁縫等實業科；1935年設立台中市立家政女學校；1937年台北家政女學校開辦；1939年街庄聯合組合成立東石實踐女學校、北港實踐女學校、豐原家政女學校；1940年另有斗六家政女學校、新營家政女學校、虎尾家政女學校等成立。

什麼是婦女該學習的技能、並且強調與凸顯其重要性，而這正是女子「家政」課所成立之目的。學校教育作為施展論述權力的機制之一，配合著當時的政策執行教化女子的穿著裝扮，這兩者之間的共謀關係可以在女紅文化從家庭走入學校中明顯得知。在我所訪談的過程中，耆老們的回憶也呼應了這一段歷史。她們認為殖民政府時期的學校教育對於當時的婦女們改變其內衣的穿著，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縫製技能的訓練，甚至支配她們所穿著的服裝。

吳女士甲認為母親年事已高，但從未穿著肚兜作為內衣，按理說，那個年代的婦女理當穿著肚兜，但她母親沒有這樣的經驗，乃在於受到日式教育的影響。而吳女士乙則提到，在她就學的過程中，在上縫紉課程時，老師都會告訴她們該怎麼穿著與打扮，而且這時候也會教導學生怎麼裁縫簡易式的洋化內衣。她們分別表示：

我母親現在已經高齡九十多歲了，但是她沒有把肚兜做為內衣來穿，是因為她有受過日式教育。(吳女士甲)

我還有看過我媽有穿肚兜，不過我們上學就沒有穿那種東西，都是穿背心式內衣，況且學校也會教我們怎麼做。(吳女士乙)

從訪談中除了可以得知，她們記憶中的學校教育對於服裝的影響性之外，另外，還發現到了殖民政府治理台灣的晚期，台灣婦女穿著的內衣逐漸改換成簡單的背心樣式，等同於我們現在認知的襯衣。換言之，這些耆老在就學的年紀就已經沒有穿肚兜的習慣。此外，當時婦女穿著的背心款式，也多半經由自己從學校習得的縫紉技術自製而成。也就是，殖民政府完整的女子教育體制中，學校成為訓練婦女學習縫製衣服技能的機構，女子的縫製技能不再只是倚靠家庭教育，而是由政府接手作為統治人民的一種管理手段，藉此也改變了傳統社會中的人們習於穿著的內在服裝。權力滲透於在教導台灣婦女縫製衣服的課程裡，並且將當權者他們認為女子應該怎麼穿著打扮的思想徹底灌輸給台灣婦女。於是，傳統的中式內衣—肚兜對於台灣婦女來說已經不是適宜的內衣，取而代之的是白色、棉麻材質的小背心衣服，這種樣式的內衣成為當時女學生或是年輕女子選擇內衣的主要款式。

我們可以得知日治時期間政府相當重視女子技藝的訓練，而到了中央政府時期，卻因為政治與經濟多重因素交錯影響下，難以找到足夠的史料與殖民政府時期作相對照的分析，只能以有限的資料從側面了解，中央政府遷台後針對女子技藝的重視有著什麼樣的特殊性。而事實上，中央政府

遷台初期並未特別著重婦女的女紅技藝，但是我卻發現，隨著政府飄洋過海來台的家政教科書，為台灣婦女帶來認識內衣更為具體的知識與資訊，尤其是內衣與身體的關係，這與殖民政府教導台灣婦女改穿西式內衣所倡導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處。

早在中央政府接收台灣、政權交替的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我發現相關教育的資料與教科書並沒有被完整的保存下來，乃在於早期因逢政局尚未穩定、經濟蕭條、民生通貨膨脹等問題充斥於社會中³⁹，整個大環境處於動盪不安以及混沌之際，外省族群與軍人大舉遷台，政府尚不能掌握戶口調查，也導致許多孩童在無法順利就學，又或者提前兩三年即入學，這些因素都導致學校教育的體制無法完整落實與有計畫的執行。另外，再加上學校內所使用的教科書，也多沿用在大陸使用的版本，更因為戰亂後，許多遺留下來的資料也是零散而不齊全的，使得要從這些文獻中了解當時整個教育體制，進而著手探討政府有無特別針對女紅技術的培訓，實在難以評斷。

不過可以發現的是，中央政府遷台的初期，著重教育國民的科目以語文類科目為首，比如國語、歷史、自然、地理與算術，尤其側重在國語的訓練，其所佔的上課時數就佔據所有科目加總時數的三分之一⁴⁰，政府希望藉此使台灣民眾脫離日本殖民時期所受的思教教化。所以相對來說，當時技術性課程的比重是非常少的，關於女子的技能訓練、以及女子學校體制在中央政府來台早期是不具規模與不被重視的。

雖然史料文獻有限，但我認為還是可以從當時遺留下來的教科書中，得知政府對於女子技能課程的規劃，有著什麼樣的學習方針與目標之願景。我從國立編譯館圖書館中找到最早與女子教育相關的教科書，分別是民國二十二年出版的《家事教科書》及《家事》，兩本教科書分別為女子中學校及師範學校用、及復興初教中學指定的教科書⁴¹。書中對於衣服的材質與選擇有簡單的敘述，也記載著裁縫與補綴的針織方法，特別一提的是，在《家事》一、二冊中，藉由問與答教學方式，記載著個人穿衣衛生

³⁹ 林鐘雄（1991），《台灣經濟發展四十年》頁 32-33。

⁴⁰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教育部頒佈的小學課程標準總綱，將學科分類為公民訓練、唱歌遊戲、國語、算術、常識、工作及課外集團活動，低、中、高年級分別國語科目佔據的時數為 420 小時、470 小時、450 小時，全部上課總時數依年級分別為 1170 小時、1500/1470 小時、1650 小時。

⁴¹ 根據館藏資料顯示，直至民國五十六年後，各家出版社才又陸續印刷〈家事〉課本。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後，一直沿用在中國出版的課程章程與教材，於是，我以此兩本在 1933 年出版的家事課本作為中央政府時期的研究文本。

習慣，以及內衣選擇和穿著之必要性，也針對選購材質與縫紉方式加以說明。而這類型作為指導女子技能的教科書，旨在希望受教育的女子，能夠從課堂中習到關於服裝穿著的常識以及縫補針織的技術。書中內容如下：

衣服之剪裁及式樣……（四）式樣與年齡合適，如幼年女孩赴會時，穿綢料長衣，亦非所宜。裝飾品需少，而合乎時機，價見之裝飾品，不如不用，學生平日更無帶裝飾品之必要。（第二冊，頁5）

（二）每日衣服之保管，包括何種事項？……內衣及襪，需常換洗，使歷久之道。……（四）內衣與健康有何關係？平日吾人所稱內衣，及襯衣與睡衣是也，內衣之合宜，與個人健康關係甚大，有時吾人覺疲倦，而不適意，皆因內衣太緊致血脈不流通，行動不自由，而有此結果。……（第一冊，頁17）

問題四 對於布材料，我應有何種知識，始能為圍裙及內衣選擇合宜之材料？……（第一冊，頁20）

從以上教材的內容中我們可以得知，在中央政府時期間，高等教育學校（現在稱呼的國、高中）所出版的教科書，已經特別針對女性內衣的功能詳作解說，此外，也出現教導學生穿著內衣與外衣的禮儀文化論述。文章內容不僅僅告知學生穿著打扮應符合其年紀與出席場合，也強調必須注意貼身衣物的選擇以及洗滌方式，因為內衣與身體是最為親近的接觸，故內衣的乾淨與否攸關著我們身體的健康。在課文中出現這樣的論述，凸顯政府從教育體制強化人民穿著內衣的習慣，藉此灌輸女子穿內衣與文明社會的產物—禮貌與健康概念—緊密相連，尤其是健康論述在課本上出現，意味著國家機器透過教育賦予女性內衣一個更為現代化的定位，希望女性在選擇內衣之餘也能注重身體健康與衛生習慣。同樣地，我們可以從李玉婷（2005）的研究中得知，中央政府治理台灣之際，將指導女學生穿著內衣行為納入健康教育課程中，她認為權力在學校教育裡左右且強化女子必須要穿著內衣的觀念，其中可見政府施展權力的影響力之大，足以規範女子穿衣的習性。

我特別想指出的是，即便女學生的縫紉技術在中央政府治理期間並不如日治時期來的重視⁴²，但是這時的學校教育卻將內衣所指涉的文明化意

⁴² 根據國立編譯館的資料庫顯示，中央政府搬遷來台之時，國民學校側重的科目為國語、歷史、地理、自然與算術科目，而這些齊全的教科書也都在民國四十一年之後有較為完善的保存。

義，透過課程與教科書完整地灌輸給學生，利用了權力可以展現的形式，在知識系統中遊走，建構了內衣與身體的健康論述，這樣的論述與殖民政府時期教導女子汰換中式內衣，改著小背心的出發點有不謀而合之處，兩者都以身體健康與衛生觀念出發，使人們接受穿著西式內衣的行為、或者是作為改變台灣婦女過去穿著肚兜的習慣。

令我格外注意的是，相較殖民政台治台晚期已經將所有女紅技能歸納在「家政」課程裡，中央政府來台的授課教科書與課程規章中，卻沒有特別設立這樣的科目指導女子學習技能。關於女子縫紉技能與衣服簡介的課程，在中央政治治台早期都是納入在藝能科目當中。好比在國民學校裡有關女紅課程都隸屬勞作課程內，直到國中才另闢工藝（女生家事）課程，不過，國民中學的課程標準是直至民國五十七年才有完整的資料可供參考，也就是直到國家政治與經濟環境已經趨於穩定，家政課程才往教育的底層紮根。換言之，其實在中央政府遷台初期的教育方針中，沒有那麼著重於女子技能的培訓，也不會強調女子該學習女紅技能，多以範疇性的課程規劃女紅課程。

而在訪談中，從中央政府遷台後才開始就學的受訪者表示，在她們就讀國小與國中階段，實際上接觸裁縫課程的機會並不多，學校的家事課程或是藝能課程，主要教導的是簡易的拿針線、縫補衣服與鈕釦，或者是繡花技術。至於製作衣服這種繁複的技術，學生並未在學校課程中習得。童女士與李女士雖然相差十歲，且前者生活在台北大都市、後者在鄉下成長，但在兩人的就學過程裡，只有習得一點簡單的縫紉技術。

舉家來台之後我才開始就學。學校教得縫紉課程很簡單，國小沒有什麼裁縫課程，直到國中也是學習拿針線縫扣子，製作衣服這樣的技術沒有在課程裡頭。而我就讀的又是女子高中和國立大學，不是那種技術訓練的女子學校，也就是像實踐、銘傳那種新娘學校，在我們那時候都這樣稱呼，我記憶中只有在那種學校內才有教導學生縫製的課程。（童女士）

記得開始上一些縫紉課程大概也是國中的時候，不過沒有教縫紉衣服，而是一些學繡花、縫補扣子。後來有設立一些專門給女生就讀的高等學校，才有在教製作衣服的課程，像我們就讀國小以及普通國高中都沒有學這樣的技能。（李女士）

另外，我找到在民國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間的國小課程中，中高年級的勞作課程標準內出現了關於縫補衣服的介紹，這可以佐證當時主要的上

課教材與授課內容包括了哪些項目。簡單的衣服材質概要以及縫製技術都有名列其中，政府可謂從基礎教育即開始讓學生熟習自己穿著打扮的知識。中高年級勞作課程標準內容如下：

3. 棉、毛線的簡易編織。 4. 衣服、鞋、襪簡易的縫紉和補織。（《國民學校課程》，1952年11月，頁163）

雖然在國小課程中可以發掘中央政府來台後仍舊將女紅技術納入學校體制內，不過佔總學科比例與教學內容相對殖民政府時期都來的少，故這時期的女學生並不能在國民學校內習得完整一套的縫補織衣技術，換言之，女子必須要受高等教育才可以獲得更多關於製作服裝的知識。

在中央政府治台間，學校體制逐漸重視女子家政培訓始於民國四十二年，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首創設立了家政科，至民國四十七年專門屬於女子的家政學校才正式成立，也就是台南家政專科學校。而直至民國四十七年成立了「實踐家政專科學校」隸屬高等女子教育機構，才正式為培育女子家政技能奠定更穩固且明確的基礎。這時延續著日治時期重視女子技能的教育體制，重新培育家政人才。家事職業高等學校也陸續成立，教授女子裁縫製衣的技能訓練更為完善。根據民國六十二年出版的《高級家事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指出，學習服裝設計與裁縫、刺繡、縫紉技藝等皆列為專業科目，這個時候甚至出現了旗袍縫製科別，這意味著當時訂製旗袍的功夫算是獨門學問之一。

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光復時期的台灣，因為政治與經濟不夠穩健的影響下，教育體制及課程規章逐年處於修改的狀態，直到民國四十年中期後才趨於穩定，此時的學校教育並沒有特別重視女子的縫紉技能，而是將目標放在國語、自然、歷史與地理課程，希望台灣人民能夠跳脫日本殖民思維，女學生所學的只是簡單縫補衣物、以及繡花樣式。加上政治因素的干預，社會杜絕進口日本書籍、政府控管日貨交易（葉懿慧，1996：54），台灣婦女們也無法輕易取得教導婦女製作衣服的日本雜誌，也降低自學製衣技術的機會⁴³。於是，在光復後就學的婦女，身上多半穿著母親在日治時期間習會縫紉技術所縫製的衣服，女性的內衣更是如此。

不過，成長於中央政府遷台後的台灣婦女，因為接觸到更為多元的洋

⁴³ 受過教育且會製衣的耆老皆表示，看日本雜誌中的紙板製衣學習縫製衣服，其實一點都不難，這也是她們在上課之餘能夠自修縫紉技術的一種方式，並且也可以知道當時流行什麼樣的服裝。（受訪者來自吳女士甲、吳女士乙、製衣的王女士）

服與上海風服飾，加上外省婦女平時打扮以旗袍為主，此穿著受到大家的重視外，更蔚為一股女性服裝的流行風潮，因此，內衣因應外衣的流行，出現更多種樣貌以作為適宜的搭配。另外，手工連身內衣的縫製技術也在中央政府來台後被人們引進⁴⁴，使婦女們在挑選內衣時又有新的樣式可供參考。但是請人訂作馬甲式手工胸衣⁴⁵或是上百貨與店家購買胸罩式內衣，都是屬於經濟環境比較富裕的人家才能做的消費行為，居多女孩與婦人還是穿著自製簡便的背心式內衣為主。

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製作女性內衣已經不再是女學生或是婦女皆會的縫製技術，反而成為特定一些人的謀生工具。即便學校教育有教導學生簡易的縫製衣服技能，但跟日治時期相比，婦女需受到更高等的教育才有機會習得繁複的縫紉製衣技能。此外，更因為隨著旗袍的流行以及洋式服裝的普及，女性內衣發展出其他款式的社機，如手工連身內衣和胸罩形式的內衣，尤其是手工內衣的盛行在此時達到高峰。根據郭幸蓉(2000)的研究指出，製作手工內衣的師傅多半是在國外習得歐洲縫製技術，於民國四十九年之後來台從事訂作內衣的行業。在覃思齊的研究中也提及，手工連身內衣的製作是來自於國外的裁縫技術(ibid, 2003: 21-22)，習得此技術的人開啓另一種商機，就是專門為婦女量身訂作修飾身體的內衣，直到家政高等教育趨於穩定與規劃開班授課後，才有比較更多的人習得此縫製技術。

在訪談中意外得知，當時有外國人在台灣討生活，憑著就是自己擁有縫製連身手工內衣的技術。劉先生是位年過六十五歲的湖南籍外省人，與父母親隨著國軍撤退來台，五年前才從中油公司主管位階退休，是個想法洋化且開放的伯伯。他提到在他年輕的時候，因為工作的關係，相當熟悉西門町的環境，他表示：

光復後，大約在民國四十年到五十年間，西門町有個白俄羅斯女人專門縫製女性的胸罩。直到民國五十五年後，國際品牌黛安芬、華歌爾陸續進來台灣設廠，大量製作內衣的工廠也開始上軌道，手工內衣才沒落。這位女士就沒有再繼續工作了。(劉先生)

我們可以從學校教育這方面了解，製作內衣的技能在政權轉移的時間軌跡中，逐漸跳脫家庭、學校等傳授的技藝範疇，而是邁入消費市場體系。日治時期的管理手法強化了台灣女子人人幾乎會縫紉的技藝，內衣可

⁴⁴ 根據覃思齊(2003)、李玉婷(2005)皆指出手工內衣是在光復過後才盛行。

⁴⁵ 見附錄圖片二。

以透過強而有力的權力機制滲透於生活中，而使得婦女們不僅拋棄了舊有的內衣，也擁有縫製新式內衣的技能。爾後，中央政府治理時期雖然沒有特別強調女紅教育，不過我們依舊可見在學校教育中仍有灌輸婦女關於穿著內衣與健康密不可分的一系列知識論述，此時我們可以發現，政府關注婦女身著內衣的行爲，儼然不再把焦點著重在穿著何種款式的內衣，而是進入合宜性層次的討論範疇。另外大量外省族群的加入、與美軍駐守來台，爲台灣社會注入更爲新潮與多元的服裝，這其中也包括女性內衣的樣式。因應著流行的外衣與西化洋服風潮的盛行，內衣與身體的相關性成爲學校安排課程內重要的一環。

除此之外，我發現教導婦女學習縫紉的技術不僅是政府體制內的管轄範圍，在日治時期與中央政府治理時期間出現了體制外的縫紉補習班，成爲提供婦女進修女紅技能的去處。而體制外的學習機構，爲更多無法就學卻想學習女紅技能的婦女帶來方便，且影響力與學校教育相比有過之而不及。並且在洋風助長下，洋裁補習班的盛行也加速西式的女性內衣在台逐漸普及化與大眾化。

3.2.3 體制外的女紅補習班學院林立

除了在政府規定之下的教育課程中，有教導女學生縫補剪裁製作衣服技能之外，我格外注意到在日治時期與光復後的中央政府治台期間，有所謂女紅補習班的成立，在當時關於這機構的廣告處處可見，卻鮮少在相關研究中被深入討論。而我認爲這類型機構的成立，不僅僅是提供台灣婦女們在課堂之餘進修的機會，也給無法就學的婦女一個管道習得縫補織衣技能。同時我們還可以從教科書與雜誌廣告中得知，這些女紅補習班引進更爲豐富的洋裁服裝資訊，以及西方觀看女性身體美學的論述。

類似「職業補習學校」的私立台南家政女學院在一九二九年即創立，一九三〇年代興起許多家政女學院，主要是配合當時家政教育與皇民化風潮，加強培養賢妻良母之角色，同時也爲了解決女子升學管道的問題。進入一九四〇年代，職業補習學校、家政學校之盛行，與提倡職業婦女需實施主婦教育、以及「新體制運動」都有密切相關性，婦女需回歸到家庭的論述層出不窮，於是，職業補習學校設立的理念與倡導皇民化政策密不可分。（榎本美由紀，1990：11）我們除了可以從研究殖民政府時期的女子學校與職業補習學校的設立源由得知，女子女紅學校的成立與政府政策以及推廣宣揚婦女教育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性；另外，從耆老訪談與雜誌中的學校宣傳廣告以及教科書內傳授製作服裝的樣式，皆可以發現補習班不只是爲了因應政府政策需求而設立，同時也扮演著加速台灣婦女接受洋化西

服的重要角色。

在葉懿慧（1996）的研究裡指出，從日治時期開始，日本人就在台灣創立了女子縫紉技藝的補習班，如吉見縫紉補習班⁴⁶。而我們也可以從耆老的訪談中得知，在她們印象中除了學院內的女紅課程教學外，尚有專門教導婦女裁縫的機構存在，並且她們曾經在這些補習班中學習縫製技術過一年或是幾個月，有的人學習縫製內衣的方法，有的則是習得一身替人修改衣服的縫製好功夫。從文獻與訪談兩種資料顯示，補習縫紉的風潮在台灣曾盛行一時。吳女士甲就是在婚嫁前跑去報名學習製作衣服的技術，希望獻上自己的手工內衣作為嫁妝與伴禮。另一位訪談對象則是六十八歲還在幫人修改衣服的王女士，她也是特別去上縫紉課程後，學會製衣技術而靠此技能謀生。

我有去外面學過縫紉課，特別去學習如何製作內衣（馬甲樣式）。不過那時候我學習製作內衣的樣式是整件連身的，不是像現在這樣的胸罩。（吳女士甲）

我現在幫人家改衣服、修褲長的技術都是在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去學的，有些專門教查某人的機構，好像現在的補習班啦！至於學製作內衣的好像跟我學的又不一樣，不過都有專門的地方在教。（王女士）

這意味著過去的台灣婦女不只是從體制內學校教育學到女紅技能，也能透過體制外的補習班教育習得製作內衣與西服的技術。另外，我從日治時期的古老報章雜誌裡中，發現有幾本雜誌內如《台灣婦人界》、《美容醫學與化妝的魅力手帖》、《婦人世界》、《婦人與家庭》等內夾帶的廣告，處處可見刊登著各式各樣的女子技術學院、美容學校、製衣補習機構招收學生的資訊⁴⁷。這之中的學習課程以訴求裁縫技能為主，我們從這裡可以更清楚地知道，日治時期的女紅技能課程傳授女子學習的內容，例如美顏術（化妝）、洋髮（設計髮型）、刺繡、洋服製作、以及禮儀訓練課程等，而在招生廣告中以洋裁學院所佔比例居高，還有些學校是專門教授美容的技術，甚至培育產婆人才的學校，於此時都紛紛出籠。

另外，許多名為「學院」的學校，也不完全隸屬政府的國民學校，則是因應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培養台灣婦女成為賢妻良母的目標，趕上風潮而設立，吸引婦女前來學習技能。於是，縫補織衣的能力對於當時的

⁴⁶ 日本人創辦的縫紉補習班在光復後都隨之停辦。（葉懿慧，1996：54）

⁴⁷ 見附錄圖片三與圖片四。

台灣婦人來說是非常稀鬆平常的技能。我們可以從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女子補習學院得知，在日治時期間女子擁有女紅技能是相當重要，同時，我們可以根據廣告上面呈現的補習教學內容，進而瞭解此時洋服的流行備受重視。相對來說，西式內衣在這女子縫紉補習風助長下，以及洋裁成爲主要製作服飾的範疇，漸漸地也成爲女子必須學習的課程內容之一。尤其當我從舊書攤中挖掘到當時學習洋裁所使用的教科書—《文化洋裁講座》⁴⁸，可以更加說明與釐清在這股縫紉補習班盛行的年代，婦女們究竟學習製作哪些款式的衣服，進而從中吸收到哪些西方美學的女性身體意象。

從這本教科書的內容中可以看到多種款式的西式內衣製作方式，以及穿著打扮該注意之處。此書刊是由當時相當有名的文化服裝學院⁴⁹所出版，在搜尋此學院的相關資訊時，我發現文化服裝學院出版了一系列洋服裁製的書籍，內容詳述許多西洋款式的衣服，遑論貼身衣服の種類更是如數家珍，幾乎是仿照法國時尚流行的服裝樣式，作爲教學裁縫的內容。這與日本本身歷史背景有甚大的關係，尤其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開始接觸西洋文化，對此造成的影響功不可沒。「明治維新以來，西方服裝傳入日本，逐漸被接受以及仿造其優點進而改變傳統日本的服裝。」（中村哲人，1941：66）

在《文化洋裁講座》書本內，不僅撰寫服裝製作的過程，還仔細介紹每種服裝的用途、使用的布料材質、款式與色彩的選擇應該因出席場合有所斟酌，另外，編者以問與答的方式回應居多人們在穿著打扮上所遇到的困擾，一併在書中做簡易的答覆。最爲我所關切的台灣婦女在改變其穿著傳統內衣的過程裡，接觸西式內衣的可能方法，可以在這一系列洋裁書中找到一個方向，也就是體制外的縫紉補習班提供了一個加速台灣婦女接觸西式內衣的途徑。因爲在書中我發現有不少篇幅介紹著多種款式的西式女性內衣，包括襯衣、胸罩、內褲、襯裙等，教學內容包含詳盡的打版說明、以及縫製方式⁵⁰。我認爲可以藉由了解裁縫教科書的內容得知，當時的台灣婦女已經對於西式內衣有更進一步的認知，就在她們學會如何縫紉西式內衣的過程中，其實也間接影響了她們昔日穿著的內衣樣式。同時，從書上也可發現女性模特兒穿上西式內衣後的體態，是一個具有腰部曲線

⁴⁸ 見附錄圖片五。

⁴⁹ 文化服裝學院創立於一九二二年，是日本國內早期認可的洋裁學校，僅收女學生。因爲當時訂做衣服的商店還不普及，希望透過學校的設立使女性有縫紉的技術，不需要倚賴洋服裁制的商店。但是二次大戰爆發後，禁止洋裁學院的運作，反對洋服穿著，所以學校也暫停一段時間。

網路資料: <http://www.taisei.com.jp/cmtime/column/tower/1999/0701.html>。

⁵⁰ 見附錄圖片六。

的身材⁵¹，這可以說明當時的西式內衣與西方建構的女性身體美學處於不可分割的一體。

由於在日本的服裝文化中，西式內衣屬於外來的物件，並非日本文化中的產物，所以在使用的詞彙上直接以外來語直譯指涉物件，於是在翻譯書中撰述的內容即保留原文的指稱，書中以ブラッシェール⁵²稱之胸罩式的內衣。教科書除了以圖樣詳盡說明如何製作一件女性的內衣，與呈現穿著後的女性身體圖片，更以文字說明女人穿上此西方衣服的用意所在，文中指出此衣服具有罩住乳房的功能，主要的用意是固定乳房的位置，不使其造成晃動。另外，作者針對不同大小的女性乳房在穿著胸罩後的意義詳加討論，書中如此描述：

較為大的乳房，因為穿著胸罩可以使其不容易下垂；而較小的乳房，可以加入スタイル，也就是胸墊，使之較為美觀。當然也有一些比較美麗的胸部不太需要穿著胸罩，不過一般來說，在一些場合中女人還是要穿此件衣服以表示禮貌。(5：43-44)

換言之，我們可以從這本教科書的內容得知，女性內衣對於婦女們而言已經不再只是從學校與補習機構學習縫製的技能而已，而是在學習縫製的過程中，也開始被教導怎麼樣的穿著才能呈現所謂的美感、美觀，以及符合年齡以及所在場合要求呈現的禮儀文化。

到了光復之後的中央政府來台時期，縫紉補習班文化承襲日治時期的發展延續下來，此時陸續成立登麗美安、馬俐美拉等非日本人設立的縫紉補習班。(葉懿慧，1996：54)爾後，我發現還有發行製作衣服的期刊供消費者訂閱，內容詳載當時流行服飾的打版模型⁵³。這些都持續影響著台灣婦女開始接觸更多不同於傳統社會中的穿著打扮，且西服也逐漸成為當時的流行指標。

從日治時期至中央政府來台初期這期間，我們可以從史料與訪談中得知，一直都有提供婦女學習縫紉技術的機構，長期下來縫紉教育的普及，使得多半的婦女都會裁縫技術。一般婦女會縫製技術之後，居多挑起製作家中老小的簡易服裝，尤其光復後，不是每戶人家都負擔的起量身訂作成

⁵¹ 見附錄圖片七、圖片八、圖片九。

⁵² 即為 brassier 的外來語。

⁵³ 〈麗新服裝雜誌〉於民國六十三年出版，事實上它並非今日我們平常看到的雜誌書刊類型，而是以報紙形式 A3 大小紙張出刊，以四個版面刊載內容，將製作衣服模型與圖版詳記下來，每刊的教學內容都有不同樣式的西服呈現。

衣的能力，身上穿著的衣服居多仍是自製而成；而縫紉技術較佳的婦人，則開起服裝訂製店。因為光復後的成衣市場不大，許多衣服還是以少量進口為主，或是個人依照自己的喜愛，挑選布料來訂製衣服。於是，家庭經濟狀況比較寬裕的人家，才會特別前往找裁縫師訂做衣裳，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手工連身內衣的市場。根據《王榕生時裝》雜誌提到：

此時婦女所採用內衣以 U 型領「背心式」為主。設計停留在包紮式、緊身的款式質料上也多為易皺的粗布，且是在裁縫奠定作，或小型家庭工廠出品。(王榕生，1980：34)

而訪談過程中，吳女士乙表示在光復後憑藉著自己擁有縫紉技術，以及具備閱讀日文服裝雜誌的能力，於是，可以幫別人訂製衣服以維持家中生計。王女士則表示，有些朋友特別去學手工內衣的技術來符合市場的需求。

因為學校有教怎麼縫紉衣服的技術，自己也有興趣看書學習，我唸書的時候就有很多日本服裝的書，裡面都有教怎麼做衣服，自己學會了後來就開始幫人家訂作衣服。光復後要拿到日本雜誌比較困難，不過學會了這項技術，就看客人要什麼樣的款式和拿什麼布料給我做衣服，在鄉下多少可以靠這個賺錢。(吳女士乙)

年輕的時候就有聽說朋友特別去學那種國外連身的內衣（馬甲樣式），一方面大家也開始注意到內衣的重要性，然後看外省人穿旗袍很好看，可是不知道怎麼穿裡面的內衣，所以都會特別去找外國人流行的內衣款式，然後回來自己作。只是我學的不是那種裁縫技術，也不太會作，那很花時間和功夫的，也不是大家都可以作的來。(王女士)

從上述的史料中，我認為可以看到當時婦女學習縫紉技能的場域不限於體制內的學校教育，並且婦女們因為習得這項手藝後得以靠製衣謀生，而在光復後，我們可以看見另一種因應時髦而誕生的內衣流行樣式。

在這節中我分別從實施法令頒佈、學校體制、以及補習班學院三個面向，探討台灣婦女縫紉的技術與穿著打扮之間的關係，企圖說明的是台灣女性接受有別於傳統中式內衣與習得縫紉技術的知識有緊密的關連性。在不同的政權治理下，卻同時推行栽培婦女的縫紉技術，透過知識教育的傳遞以及法令規範的頒佈，改變女性的穿著打扮。尤其可見的是，殖民政府時期管理的台灣，政府介入左右婦女穿著的力量十分強大，論述權力運作於法令、學校教育與民間補習文化，逐一教導台灣婦女汰換中式服裝、甚

至是潛移默化的改變了內在穿著。即便沒有發現直接介入女性內在穿著的論述與規範，但是從不同的政權強調女紅技能的訓練，與教育過程中引進大量的西服文化與穿著禮儀知識，我們皆可從中得知這樣的脈絡為台灣婦女開啓接受新物件的視野與廣度。

但是，在過去探討台灣婦女穿著內衣與胸罩的文明史研究內，並未分析台灣婦女穿著女性內衣的轉變，與女紅技能、從家庭中母親教授女兒的技術轉至體制內與外，成為有系統地女子技能訓練之間的關連性。縱使相關研究經由透過與耆老訪談的方式，了解她們過去會自己縫製內衣、製作背心式內衣以及有請人訂作連身內衣的經驗，但是卻少了追問這樣的情形是如何產生。我認為規範身體去接受新的物件，並非理所當然或是無從考察，而是可以去拆解論述權力於其中的運作方式，如同傅科(Foucault)所云，它默默的進行且隱藏於社會各處中，藉由空間其一的條件也就是縫紉教育機構的成立，推廣且強化了縫製西式內衣的知識與認識穿著內衣的女性身體意象。

而另一方面，在時間的軸線上，雖然中央政府時期少見於政府針對婦女縫紉技術加以訓練，卻因為婦女們擁有縫紉技術的普及程度，加上洋風隨著美軍駐台不可抑止，報章刊載著洋服發表會以及明星的時髦裝扮⁵⁴，這些因素都加速婦女接受洋服的打扮。同時外省族群的加入，引進旗袍穿衣的流行與更為多元的西式裁縫技術，並且從國外學會製作西式內衣的師傅也逐漸增加，兩者間接影響了台灣婦女認識與接受此西洋文化的產物。換言之，論述權力的運作不僅在我們顯而易見的機構與教育中產生效果，還在教化中的知識與思想灌輸下對人們發生作用。

但是，影響台灣婦女穿著西式內衣的因素，我發現不只有上述三個具體的面向，還有在文明社會演進的過程中，所發展／明出來「乾淨」與「衛生」觀念強諸於內衣這物件上，更造就了穿著中式內衣不如西式內衣有衛生概念的論述油然而生。下一節我將挪用 Daniel Roche 研究法國服裝文化史內提到材質演進與衛生乾淨觀念的關係，來說明支配台灣婦女穿著西式內衣的另一個因素。

3.3 藏匿於內衣中的文明產物

在 Daniel Roche 的研究中，他認為法國服裝出現了僭越與模仿、從眾的現象與服裝的經濟面向，也就是材質的發明有很大的關係。人們原本在

⁵⁴ 見附錄圖片十。

各自位階內擁有彰顯與代表其穿著打扮的符碼，以及適合其身份應該穿著的服飾材質，但是服裝材質的革新技術，將這一切約定成俗的規範打破，尤其是亞麻布的發明，影響著不僅是人們僭越與模仿上層階級的穿著，更因為材質的輕薄與色澤，而被加入乾淨與衛生概念於其中，使得人們開始從服裝的材質中，重新界定骯髒與乾淨兩者強烈對比的差別。

相對來說，不是只有在西方文化中才可見材質的創新與文明產物之間的共存關係。在台灣的文化脈絡裡，內衣除了具有功能性與呈現女紅文化的意義外，更因為材質的革新技術，使得政府教化人們穿著內衣之時，將乾淨與衛生等觀念加諸在衣服此物件上面。只是在過去的研究裡鮮少人注意到，可以從服裝的經濟面向，來思考台灣婦女汰換中式內衣與穿著西式內衣之後帶來什麼樣的身體感。而我認為影響甚鉅的原因是，乾淨與衛生的觀念從內衣發揚光大後，更將這樣的觀念加諸在身體上，建構了一個穿著內衣而具備禮儀文明的身體。於是，我先從了解台灣婦女被教導穿著麻棉布料內衣來找尋內衣隱藏著文明化的象徵意義。對於服裝研究上相當有成就的吳女士甲即表示，過去殖民政府治台晚期一直到中央政府來台初期這段時間內，台灣人的衣服材質以棉麻布居多，而女性穿著的內衣，也因為肚兜式微後，改為穿著小背心、或者以西式內衣的胸罩作為替代，但這類型的衣服材質都是採用棉質布料。

我們以前的衣服都是以棉布為主，內衣（背心樣式）也都是棉布材質，比較吸汗。日據時代女人還有束胸風氣，也是用棉布纏繞，生產完要用的束腹也是棉布條。不過，日本人當時不知道我們古早的人穿著肚兜那樣的內衣在裡面，知道之後覺得不好，後面涼涼的，所以都教我們不要再穿那樣的內衣。（吳女士甲）

而造成麻布料得以成為台灣主要的內衣製衣材質，是源自於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的紡織工業突飛猛進，大量廉價的棉織品傾銷到台灣市場，日後因為原料取得相當容易，棉布才逐漸成為當時製衣的主要材質。

其實，殖民政府接收台灣的初期，在紡織工業上還是仰賴大陸進口原料，尤其是比較高級的緞綢類產品。而且棉、麻、桑等經濟作物價值並不如稻米與甘蔗來的高，所以殖民政府並沒有在此花心力培育。（蘇旭君，1993：26）直到戰爭結束後，日本本國自己技術的革新，棉布量產到可以傾銷到台灣，根據《臺灣之紡織工業》的統計，日本取代了大陸成為台灣棉布的主要供應區，棉布輸入量大於其他地區輸入量的總和，這也就成為日後台灣婦女服裝穿著改變的原因之一。

受到布料供需變化的影響，臺灣男性服裝逐漸西洋化，而閩族婦女的服裝，也因為材質的選擇深受日本文化影響，加上絲綢布料取得不如早期來得容易，所以傳統台灣婦女以絲料為主的服裝，逐漸由棉布取代成為主要的服裝素材。（蘇旭君，1993：27-28）而傳統的女性內衣—肚兜，以棉絲材質為主，政局的交替，從大陸進口過來的原料也不如往常般容易與廉價，整個布料供應的轉變，加速衣服樣式的汰換。此外，隨著原料進口不需要再倚賴大陸輸出，製作衣服用料漸漸習於棉、麻布材質，這樣的趨勢也在政府宣導衛生與乾淨觀念中，加速汰換傳統的女性內衣，也強化了穿著西式內衣的正當性。其中一位男性受訪者胡先生現齡已經八十歲，於日治時期就受過教育（高中學歷），出版過許多以日語書寫的書籍，內容包括介紹台灣的民俗風情習慣以及觀光景點，另外還有教學日文的教科書。他本身一直從事日語教學工作，至今還在翻譯文章與投稿發表評論，是位相當關心當今國事的老先生。

我們可以從以下訪談中得知，台灣不分男女之別，對於內衣的認知都具有上述論及的文明產物，也就衛生與乾淨的意義：

以前日本人教我們要穿內衣（背心樣式），就是要我們學習乾淨整潔習慣。肚兜後面是空的，直接跟外衣貼近，日本人認為這樣不衛生。（胡先生）

小背心內衣可以常換洗，外衣就不用穿了一次就換洗，貧苦人家也沒有那麼多衣服可以替換。大家穿內衣除了可以吸汗、保持身體衛生健康，也是減少換洗外衣的一種方式。（曹女士）

胸罩式內衣又不能吸汗，還是不常穿啦！我也都教小孩子穿內衣，男生就是汗衫，女生就是小背心，這樣也可以隔絕跟外衣的接觸，萬一對衣服材質比較過敏，這樣皮膚也不會直接就接觸到。棉布很舒服也不會讓身體癢啦！我們以前都是這樣穿比較常見。（吳女士乙）

換言之，伴隨著材質的進步與原料取得的便易性，內衣也隨著材料的取得變更樣式外，文明社會裡的乾淨與衛生的概念，更是殖民政府教化人民穿著衣服的另一個重點。「服裝更能夠被視為禮儀文明和宮廷文明的最前線代表，這是將人們與世界緊密扣連不容被分離的一環。」（Daniel Roche，2000：3）從日治時期開始，穿著西式內衣不僅與乾淨與衛生概念結合，同時整套穿著內衣的禮儀文化論述也在逐漸萌芽。

我從日治晚期出版的雜誌中，找到當時的流行雜誌《美容醫學與化妝的魅力手帖》一書，其中有特別針對內在衣服的類別與功能加以介紹。文中提到：

洋服逐漸成為婦人穿著的首要選擇，就必須了解內在衣服該如何與外在衣服做搭配，以及認識不同種類的內在衣服其功用性。穿著內在衣服主要是考量皮膚衛生因素，所以非常重要。(103-104)

這意味著內衣不再只有遮蓋身體的功能性意義，還多了一層衛生觀念的重要性，作為內在衣服的功能在於使身體的皮膚不直接接觸外在衣服。不僅如此，內在衣服的選擇還必須顧及外在衣服的搭配性，這也表示從穿著內衣的身體，已經開始被塑造出乾淨的身體以及適合場合呈現美感的身體。換句話說，文明社會中的禮儀身體透過內衣論述逐漸萌芽，而且將衛生與乾淨概念強加在穿著內衣的論述裡，在中央政府時期內更將如此的論述納入教育課程內，以更為具體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們。這與 Daniel Roche 提到，從小訓練人們服裝穿著與身體的健康與衛生為一體的概念，有謀合之處。

另外，我們從中央政府時期出版的教科書可以得知，政府透過學校課程，更為直接地灌輸人們內衣與衛生之間的關連。在國民學校課程標準總綱內便提及：

除了公民訓練課程中以衛生為必須力行的學習內容外，在社會（常識）課程及自然學科也含括衛生內容，包含了衣服的衛生概念，以及如何打扮乾淨整潔。（《國民學校課程》，1952年11月，頁148）

此外，我發現還有一本作為女生習得女紅技能的《家事》課本，裡面出現了更多關於女子內衣與健康關係的論述，內容如下：

襯衣之清潔，亦頗緊要，無人身體排泄，無一時停止，其排泄物均藏積於衣上，若不十時工和，不但有污穢之態度，且阻止排泄之進行，是以每星期至少需有兩次之更換。因更換有洗滌問題，……。洋布最易洗滌，……洋布為製內衣之良好材料。麻布之性質，與洋布略同，為傳熱較速，不合作冬日內衣之用。……晚間換睡衣，亦衛生之道，內衣經過身體一日之排洩，不免有潮氣，而積有排洩物。

穿合於衛生之衣服，是個人之本分，因使身體健康，係吾人之本分故也。……（第一冊，17-19）

這些資料同時指涉材質的演進，與婦女觀看內衣與身體的關係有著明顯的相關性。也就是說，穿著內衣不只是遮蔽、護腹防受風寒的功能意義，還存在著因為材質的進步所帶來的文明概念，台灣婦女重新認識不同款式的內衣之外，也額外接觸內衣底下所隱藏著乾淨與衛生概念。然而，民眾要如何接受這文明概念的訊息，首當其衝的就是政府藉由教育手段，灌輸婦女們選擇不同內衣樣式的知識外，還教導她們必須注意到自己身體的健康與服裝的衛生觀念，並且將一套連接健康的身體與乾淨衛生內衣的知識，有系統地安排在學校課程內，使人們重新認識內衣這件衣服。

不僅於此，於一九五三年中央政府推行第一個經濟計畫，將紡織、食品加工工業列入重點培植工業，民生必需品不需藉由進口舒緩貧乏問題。同時在這波大量移民潮中，一些大型紡織廠也跟著來台設廠，配合著政府的經濟計畫，開始研發新的服裝材質，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台灣的成衣工業開始萌芽，服裝市場才逐漸從供應國內市場，轉戰至外銷市場。（葉懿慧，1996：19-22）這也意味著國人不必再為服裝原料的取得而擔憂，並且人們更易於取得大眾化的棉麻布料來製作衣服。而內衣也因應這波紡織革命，加速了人們選擇材質上的更替，並且將製作內衣的新布料與乾淨概念視為不可分的一體，這也正是 Daniel Roche 認為，材質上的革新能為服裝增添更為不同以往認知的象徵意義。

由此可見，在殖民政府與中央政府治理台灣期間，因為原料的輸入與產出不再需要倚靠進口，且服裝材質的演進發展導致婦女們使用棉、麻布製作內衣成為當時的趨勢。於是，從內衣的經濟面來看，內衣不再只是一件單純的內在貼身衣服，而是在這一連串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下，隱藏著文明社會中創造出來衛生與乾淨的符碼，婦女們穿著白淨的棉布西式內衣所意味的是乾淨與衛生的身體。再加上一九四〇至一九六〇年間的台灣是一個洋風盛行的年代，西式內衣的介紹與樣式逐漸廣為眾人所知，同時在外省婦女來台引領新潮外衣的影響下，開啓婦女們對於內衣有嶄新的認知，也就是穿著內衣之必要性與合宜性，是為了因應搭配外在衣服而存在，這也使得女性內衣成為展示禮儀與美感身體的一個中介者。而這樣的建構過程，更在光復後，手工內衣成為台灣婦女們爭先跑去訂製、與作為女人的主流內衣隨之茁壯。這即是我在下一章欲進一步探討，透過穿著內衣的女性身體被創造與建構出何種意義與圖像。

3.4 小結

整體而言，西方的女性內衣對於台灣的婦女來說是一件新的事物，而新的物（new commodity）進入到了不在其文化脈絡下，經過時間給予的變

化過程，使得這新的物逐漸成爲必需品（necessity），這樣轉變的過程是需要技術與知識層面的治理。畢竟屬於台灣的社會脈絡中，本身已存在對於中式婦女內衣的看法。傳統內衣的設計並不只是要遮蔽胸部，而是要遮住肚臍以免身體受風寒，故中式內衣一肚兜是連身至腰部的剪裁，這與西式內衣的發展脈絡是大相逕庭。於是，在這章我以傅科（Foucault）提出的權力與知識管理，解釋台灣婦女如何認識與接受外來文化的新物件，且淘汰自身文化的內衣，並且將西式內衣成爲必需品的可能發展加以分析。

在這一個轉變的過程裡，除了時間因素的考量外，過去探討台灣婦女內衣穿著演變的研究，都忽略了政府機制推行的教育政策、實施頒佈法令足以影響人們的服裝打扮。即便是內在的衣服，也可以透過技能栽培與知識傳遞，使一件不可公開示眾的衣服，女人穿著肚兜的習慣逐漸轉變爲煥然一新的西式內衣樣式。也就是在不同政權的治理之下，我們皆可發現學校教育體制培養台灣婦女的縫紉技能，促使婦女接受穿著西式內衣的樣式，並且在教化的同時，也灌輸學生們一個健康的身體與乾淨的內衣緊密扣連的論述。

我之所以從傳統社會裡重視婦女的女紅技能與中式內衣之間的文化談起，主要強調的是，女紅技能走入體制系統中的一環，傳統的婦女內衣不再只屬於家庭勞動內的女紅文化與社會脈絡下的產物。反之，在日治時期女紅技能併入體制後，教育機構成爲施展權力的最佳場域，我們可以從學校裡針對女子技藝課程的安排、補習班文化因應政府重視女子技能教育而盛行的過程中發現，當時的婦女被規訓必須擁有女紅技術。同時政府也可以透過機制內的教育與體制外的知識傳播，將中式服裝逐漸汰換，引領人們學習與認識洋服與西式內衣。即便在耆老們的回憶裡，他們也不知道爲什麼沒有再穿肚兜，不過，根據從事服裝研究的吳麗娟則表示：「肚兜不再成爲主要的女性內衣與殖民政府教育有很大的關係。」論述權力的蔓延與影響力是無遠弗屆，甚至是在人們不自覺之中已經持續進行，因此，校內的課程安排與洋裁補習班的盛行，加速台灣婦女對於西式內衣的認識，也促進她們接受了不屬於本身文化的產物，而是新的物件—「西式內衣」的機會，進而展開認識西方女性身體美學的可能。

從法令、學校教育婦女縫紉女紅技術，及因應社會需求所設立的女子補習機構，這三種存在著權力運作的空間條件，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政府透過顯性的機制施展權力，使之對婦女的服裝進行規訓與監視。從體制內、外訓練女子皆會縫紉技術外，傳授洋服、和服裁縫的技術，以及何爲穿著打扮合宜的知識，這些都是作爲汰換過去台灣婦女傳統服裝的手段。歷經日治時期與中央政府來台後的台灣婦女，先後接受藏匿於機制下的權力規

訓，直接與間接的改變傳統中式服裝穿著，也因為外在服裝樣式不同，內在衣物隨著時間、社會風氣與教化多重因素介入，因而轉變。在當時的學校教育與補習學院，廣傳洋服縫紉技術，縫製小背心的女性內衣知識普及化，進而成為主要的女性內衣樣式。

但是，單單從政府之法令頒佈與教育機制了解論述權力對於人們的影響是相當有限的，也不足以說明論述權力的構成。換句話說，論述權力之運作是普遍滲透在人們的生活與倫理層面，也就是內衣與一個禮儀身體與文明身體相關的連結逐漸壯大，才是更為彰顯論述權力發揮的作用。這就如同爾後外省族群融入台灣文化，增添上海風、港風的流行服飾，引領有別於肚兜、小背心式的西式女性內衣風潮，以及此時縫製技術的知識更為豐富外，加上紡織品材質的演變與普及程度更加完善，造就另一種樣式的內衣出現與流行，也就是手工連身內衣。這代表著不同族群的加入與經濟條件的轉變，使得女性內衣樣式有了更大的巨變，同時也為台灣婦女注入另一種新的身體觀感，一個符合西方美學的曲線體態，以及搭配中式旗袍呈現凹凸有緻的女子身體。

我特別在這章節分析台灣婦女內衣的穿著改變之脈絡，一部份是企圖說明權力影響著不僅是外在服裝的改變，而是能透過機構、教育、賞罰等有形無形的權力控管人的行為或是價值觀，包含了婦女在女性內衣的選擇，也被教化習慣穿著不屬於此地文化的衣服，而這樣的探討是過去研究中所忽略的。然而，管理服裝改變的方式不僅只有權力的運作，傅科 (Foucault) 提到還可以透過語言與知識的影響。在知識與語言的層次進行對權力的詮釋，論述權力即產生了知識，藉由知識壯大與強化論述權力的存在，甚至鞏固了論述權力的地位，透過知識，人們建構了更多規範與原則，在這些現實中都隱含著集合社會、政治、經濟、歷史與文化等元素所形成的權力。這與 Daniel Roche 從服裝的經濟面解釋材質的演進，與文明產物之間的關係建構出一套知識有異曲同工之妙。

換句話說，台灣婦女穿著不同樣式的內衣，是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被塑造出來的結果。女性內衣既是承襲傳統習俗中該擁有的女紅技能所展示的婦德文化，所以婦女人人會縫製傳統式內衣，自製自用。之後，在不同時期的政府管理下，透過學校體制、法令規範、以及補習班的設立強化台灣婦女的縫紉技能，並且從中改變她們縫製的衣物，教導穿著西式內衣且淘汰中式服飾，同時希望她們接觸和服與洋服文化，這種種機制的管理下還需要一套知識來捍衛這強大的論述權力運作，而布料的革新技術、原料供給上的無慮，正是將內衣與乾淨、衛生的知識發揚光大的主因，甚至為人們開啓對於文明身體的認知。

而另一部份，我希望藉由回顧造成台灣婦女穿著內衣樣式改變的脈絡中，尋找除了社經條件及政治力影響著婦女穿著打扮之際，縫製內衣與穿衣的知識隱藏著改變婦女看待身體的方式，也就是文明社會內與禮儀文化中的身體論述從中誕生，這其中包括健康的身體、禮貌的身體與美感的身體，皆可以從女性內衣的樣式轉變中找到被建構的可能性。這正是 Daniel Roche 認為研究服裝物質文化史，可以觀察論述權力涉入改變服裝的樣式，與在材質演進的過程中，發現服裝意義轉變的可能，進而探討這些影響時尚與服裝的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為身體與服裝符碼建立起新的關係。除了分析女性內衣在台灣脈絡中的演變之外，還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此物質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女性內衣樣式的轉變，造成何種婦女看待身體的感知出現。

於是我在下一章節將延續台灣婦女因為穿著不同樣式的內衣，討論她們穿著內衣後的身體所反映出來的意象為何，又有哪些因素伴隨在女性的身體裡面，甚至我們可以這樣問的是：內衣此物質被賦予多重意義的指涉，那麼女人在穿上它之後的身體，是否也呈現了與之相同或是更為多樣的意義，而這樣的過程如何被形塑而成。



第四章 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身體意象

在這章裡，我試圖說明台灣婦女身著內衣的身體其意義的轉變，也就是除了內衣本身的功能性意義之外，因為其樣式的改變引進更多變的文化與社會意義，進而改變了我們觀看女性身體的方式。換句話說，內衣究竟是遮蔽身體、胸部的衣物，又或者因為時代的進步與文明社會的發展，使我們認為女性顯露乳頭為不雅之行為，而必須要透過內衣來遮掩。而對於台灣的婦女來說，內衣除了是遮蔽身體的一件衣服之外，在文明社會中所衍生出來的羞恥感觀念，使她們在穿著不同樣式的內衣下，呈現的文明身體意象又是為何？而透過此內衣與外在流行服飾所搭配而成的身體美感論述，其過程又是如何產生？這些都是我亟欲在此章節中探討的重點。

內衣對於女性身體的意義究竟為何？這個問題若從現代觀看女性內衣的思考模式來說，脫離不了創建「女性化身體」的神話，也就是我們以當代對於女性內衣的認知，認為穿著此衣服能夠凸顯婦女的女性化身體，創造出所謂符合社會價值的禮貌身體與美的體態。換言之，內衣就是一件將女性的胸部烘托成形，同時要刻意遮蔽女人乳頭的物件，而這樣的穿著才是合乎禮節的行為。但是如果以此論點追溯過去內衣與台灣婦女身體之間的關係變化，似乎略顯薄弱，且不見得能解釋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台灣婦女穿著內衣所呈現的身體意義。而內衣的演變與呈現出來的女性身體感覺，隨著時間與文化的脈動，其實是一直處於流變的狀態。我們可以這樣說，衣服的作用不僅僅是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身體上，或是強化了身體的特徵；而事實上，潛移默化賦予身體的重要性，也隱含著許多文化因素，而這些文化含意又非常接近身體本身，使得眾人都誤以為衣服與身體的關係是渾然天成的。（Entwisle 郜元寶等譯，2005：179）相同地，人們似乎認為穿著內衣的女性身體是理所當然的，而忽略了造就這個理所當然的緣起以及其過程的變化。

在我思考女性內衣與身體的關係之時，我首先針對當時的婦女穿著內衣所表現出來的身體感覺與意義進行分析與討論，因為服裝不可能展現身體而不具任何意義。相反的，服裝能美化與修飾整個身體的特徵，女性內衣更是具備如此的功能。在過去的相關研究中，最先備受提問的是女人穿與不穿此衣服的身體感覺，接續探討性與性別的關係，也就是女人的身體如何被建構出來。另外，在這些研究中有不少涉及色情、性感、時尚與女人身體扣連的討論，尤其是國外的研究，更彰顯現代的女性內衣能反映與

顯示這些議題的重要性⁵⁵。不過，我認爲一味參照國外的研究取向，並且只依循西方內衣發展的脈絡來探究內衣文化，其實會侷限在現代性發展出來的論述，而忽略了不同時空背景下因爲文化與社會脈絡之不同的影響，無法發掘內衣與台灣婦女身體之間隱含著多重的意義與指涉。

回到台灣社會的脈絡中，我發現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六〇年間，內衣對於婦女們來說，是存在著實用性的穿著意義，文明社會裡衍生出來乾淨與衛生相互交錯的符碼，以及遮掩女性乳房與乳頭性特徵的禮儀文化。也因爲這些意義在內衣中被創造與生產出來，使得台灣婦女看待自己穿著內衣的身體隨之改觀。婦女們藉由穿著內衣所展示的身體，除了蘊含著發明服裝中含有包覆與避寒功能所呈現著內衣後一個遮蔽的身體意象，更添加了禮貌與健康的概念，以及美感與性感的身體認知。而這樣的轉變過程，我認爲是作爲觀察身體與物質之間的一個視角。「身體基本的事實—即它一般來說必須穿著合適地出現—指出了服裝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服裝與社會秩序的聯繫。」（Entwisle 郜元寶等譯，2005：4）

在不同時代與社會裡，台灣婦女的胸部與身體，透過民俗風情的教化，與媒介論述的宣傳，使得人們對看待內衣這件衣服與身體之間的關係有著顯著的差異性。在這章節中，我將透過當時耆老的回憶、媒體的文字敘述與圖片以及畫像作爲主要的分析對象，試圖描繪女性身體在穿著內衣後被建構出多重意義的身體。我將藉由這二十年間女性內衣的文化論述與日常生活中著衣經驗，重新檢視與認識台灣婦女穿著內衣與身體的關係，探討兩者是否只有在實用性與展露女性性別這兩種語境脈絡裡產生意義，或者又因爲穿著樣式的改變，開啓了更多種詮釋女性身體美感的可能性。

4.1 台灣婦女看待身體與內衣的關係

歷經不同歷史時期的治理文化，台灣婦女開始穿著有別於傳統式的內衣，從肚兜、小背心到連身內衣這樣的穿著實踐過程裡，內在衣服對於台灣婦女來說有了多重意義。其中包含著婦女對於內衣此物件的認知，已經不再只是一件遮蔽、禦寒的貼身衣物；也不僅僅是宣揚女人的特質，作爲女紅展演的代表性服裝。而是有可能在論述權力管理的介入之下，使得台灣婦女因爲穿著內衣後改變觀看身體的方式。這意味著人們接受什麼樣的服裝、穿著什麼樣的內衣後，從中認知到身體需要遮蔽與否的意義，進而

⁵⁵ 國內研究有覃思齊(2003)探討現代女性穿與不穿的身體感覺。國外研究 Valerie Steele (1989, 1996, 2002) 指出一九六〇年代後婦女大舉燒毀胸罩，強調解放女性身體的過程。

產生看待身體有無羞愧的感受，甚至婦女們可以透過穿著內在衣服凸顯胸部與展示身體曲線之美感。而此過程是蘊含著承襲整個縱向文明的力量，發展出橫向的多重感官認知與主觀感覺。

若說衣著既是被社會組合與建立形成，卻又是通過個人而發生效果的實踐結果，那麼在我思考女性內衣置放在台灣社會的歷史脈絡中，可以發現的是，內衣除了是包覆身體最裡面的一件衣裳外，在其本身樣式的改變以及政府提倡改善束胸風氣後，內衣的意義不再侷限為遮蔽身體與胸部的定義之下。相反的，內衣成為凸顯女性外表特徵的一件衣服，因此，影響了女性身體呈現出來的體態。這正是服裝造就女性氣質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它將自然的事物引入文化範疇內，並且賦予身體多重的文化意義。於是，我試圖從台灣婦女看待內衣的方式裡，尋找內衣與身體關係轉變的發生，瞭解在這建構的過程中，被稱為自然的文化事物如何形成一個看似理所當然的組合。也就是我著重處理的是，牽連禮儀、文明與女性美感的內衣論述，如何鑲嵌並反映出台灣的特殊歷史條件。

4.1.1 內衣作為與外衣區隔的服裝

肚兜是傳統中國社會裡代表內衣的服裝，即便歷經殖民政府治理與中央政府管理兩個時期，台灣社會中無論男女老幼仍有不少人還是習於穿著此樣式的內衣。這種習慣不易被人們摒棄是因為肚兜本身服裝的款式設計，肚兜的作用是為要保護人們的胸部與腹部，人們皆認為穿著內衣可以預防疾病與風寒。「中國人認為人身以肚臍最柔弱，肚臍吹到風，最容易感冒，所以胸腹的保護特別重要，此乃養生之道。」（吳麗娟，1992：18）另一方面，在與耆老訪談的過程中，進一步了解到，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內衣僅僅不過是件與外衣區隔的衣裳，「內」在衣服就是只有自家人才能看到穿在身上的景象，「外」在衣服則是穿著給別人看，並且遮掩自己穿著內在衣服的身體。

訪談中一位現齡六十八歲的羅先生表示，記憶中小時候住在鄉下地方，曾目睹現齡高達九十歲的母親在年輕之際，身上穿著肚兜一件衣服在家附近活動，並且也會在夏天只穿此衣服感覺比較涼快。他於公職人員上的工作崗位退休後，目前在鄉下從事義工活動。另外一位是目前仍在擔任小學教師的陳女士，現齡五十七歲，從小生長於台北，不過她也曾目睹奶奶（若還在世的話已是人瑞高齡）穿著肚兜，且只將視內衣為貼身衣物，作為與外衣的區隔，家裡小孩人數眾多，也不會覺得奶奶只穿一件內衣有啥特別。作為中部客家人的蔣張女士現齡七十歲，雖未曾見過其高齡九十歲的母親穿上肚兜式內衣，不過就她母親而言，內衣作為在家中唯一穿著

的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

曾看過母親（現齡八十八歲）年輕時平常就穿肚兜做事情，走來走去，有外人前來，才趕緊將外衣穿上。大概自己很小的時候還有穿這種衣服，不過沒多久，大家都是穿著汗衫棉布的寬鬆內衣了。（羅先生）

我小的時候，奶奶平常時間在家裡也會穿肚兜。加上那時候她有裹小腳不方便出門，所以天氣一熱在家都是只穿肚兜一件衣服。除非要外出，或是有人來才會披上外衣。（陳女士）

我的媽媽（已過九十歲）沒有穿肚兜，是穿那種長衫的棉布製成的內衣，然後中間綁起來，其實也就是電視古裝劇會出現的那種內衣。在家裡平常也都是這樣穿著，只有看到外人前來才會將外衣披上。（蔣張女士）

從以上訪談內容我們可以得知，殖民政府治台晚期至中央政府來台初期的二十年間，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樣式雖然有些許的差異性，有的人在光復後仍有穿著肚兜的習慣⁵⁶，有的人則汰換了傳統的中式內衣，改為穿著寬鬆的棉布內衣。不過，他們對於衣服的認知明顯地區分成「內」與「外」的意義。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內衣僅是一件作為與外在衣服有所區隔的衣裳，婦女們穿著內衣的身體並不忌諱被自家人所見，尤其是在以前的農村社會裡，婦女們因為工作性質或天氣炎熱的關係，在家附近出沒，多數人只有穿著一件肚兜或內在衣服。但是她們看到有外人前來，就會將外衣或是長衫穿上，作為遮掩只著一件內衣的身體。這意味著，婦女穿著肚兜這件內衣，對於家裡的人來說，就是一件衣服，而面對不熟識與外來的客人們，此衣服還是需要被遮掩的。

肚兜的設計主要是遮蔽身體的胸部與腹部，背部則呈現縷空狀態⁵⁷，即便穿著此貼身衣物意味有穿衣服，在內衣擁有包覆身體的意義之下，因為是最為內在的衣服，於是還需要被外衣所遮蓋。如同 Steele 提到「從傳統的典範來看身體只有裸身與穿衣此二分法，直到人們穿著內衣才開啓了一個灰色地帶，內衣同時是“穿”衣的表現，卻不是“外”衣的樣貌，所以可說穿了衣裳也等於沒穿。」（Steele, 1996: 116）

⁵⁶ 根據吳麗娟研究指出，直到第二世界大戰後，台灣鄉下純樸之處，仍可見老婦人以及小孩穿著肚兜。（吳麗娟，1989：94）

⁵⁷ 見附錄圖片十一。

而早期的台灣婦女面對內衣是穿上也是沒穿的舉動，其實也點出穿著內衣與外衣之間的差別在於著衣所呈現的禮貌文化。也就是面對家裡的人，她們認為穿上內衣儼然是有穿著衣服，但是面對外人之時，卻不能暴露自己只有穿著一件衣服來遮蔽身體。誠如內衣「隱藏於外在衣物之下，就像身體本身也是匿藏在內衣中，內在衣服是件神祕的服裝，只有在親密的朋友的前面、在私人的臥房中才能展示。」（Steel，1989：56）我進一步亟欲討論的是，內衣所遮蔽的女性身體透過外人的眼光更為引人注目之時，那麼婦女們遮蔽與掩飾的是什麼樣的身體，而在內衣樣式的汰舊革新過程中，是否又將遮蔽與掩飾的意義再次翻轉，成為彰顯「女性」身體的重要物件。

4.1.2 遮蔽與彰顯「性」特徵的女性身體

我們可以從台灣婦女看待內在衣服與外在衣服的差別得知，其實女性內衣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中與西方社會看待此服裝是如出一轍，皆視之為私密的服裝，並且直接相關的是作為遮蔽或展現身體的一個物件。不過，在我們追溯最初台灣婦女穿著肚兜以及小背心作為內衣的身體樣貌，仍可以發現，透過此衣服建構出來的女性身體，是與西方看待穿著內衣的女性身體迥然不同的。

在西方內衣文化史的脈絡中，女性內衣除了有保護作用外，我們當今看到的馬甲內衣其實主要目的在於塑腰，而間接地受到內衣的設計與剪裁影響，西方婦女穿上內衣後，反而凸顯出女性的胸部⁵⁸。然而，回顧中國婦女內衣樣式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式內衣的設計無法強調女性的胸部，也並非以凸顯女性乳房作為設計的訴求。「從性別標示的意義上講，中裝被要求賦予藏形、掩形的功用，而西裝則講究以衣來烘托人體的美。」（張竟瓊，2002：43）清代末年之後，肚兜成為女性內衣的主要樣式，但就其本身的設計與剪裁，也非以訴求雕塑女性的身體或是凸顯女性胸部為主，也就是說，女人在穿戴此衣服後所呈現的身體無法展示其乳房的性特徵。反之，大家所稱呼的內衣，也僅是意味穿在身體裡面的內在衣服，甚至是藉此件衣服掩飾自己的胸部，不希望成為眾人的焦點。

我們回顧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間，無論是在台灣或是中國，婦女們還盛行著束胸的習氣⁵⁹，許多婦人怕自己的胸部過於明顯突出，於是會

⁵⁸ 見附錄圖片十二。

⁵⁹ 從北洋畫報於一九二六年陸續刊登西式內衣樣式的介紹，大力推廣解放束乳之風氣，強調女人之美在於自然，而非將乳房綁捆、壓迫胸部，這也違背衛生概念。

使用棉布條捆緊乳房，來遮掩較為凸顯的胸部。而在台灣又因為受過殖民政府的治理，以及流行穿著日本和服的影響下，婦女們多數認為胸部需要被遮掩，甚至存在著透過內在衣服塑造自己的身體呈現沒有胸部的形狀。於是內衣除了有遮胸的功能外，還有束縛的意義，就是以棉布包捆乳房，使婦女的胸部成為平胸的形狀。這樣的情形一直到光復之後還是可見。

民國三十四年之前，由於受戰爭的影響，社會的經濟條件凌亂，衣服不必再補貼，已經是很幸運的事，女人講究內衣根本談不上。此外，因襲風俗習慣與傳統的觀念，還用布條將胸部縛緊，唯恐因胸部過於突出而被譏笑。（王榕生，1980：34）

在訪談過程中，一位日本籍的二十六歲本江小姐表示，她外婆那邊的親戚是台灣人。她記憶中的外婆（已經七十五歲）和奶奶（八十歲）穿著和服的時候，裡面是不加穿內衣，只有用浴衣層層包覆著身體。因為在穿著和服時，是不能凸顯女性的胸部，尤其是胸部過大的婦女們更會特別注意這點，她們會使用棉布纏繞胸部，然後穿上薄浴衣之後，再穿上和服。

我奶奶穿和服的時候裡面沒有穿內衣，而是一件一件衣服疊上去，這樣就可以遮住胸部，而且女人穿上和服也無法凸顯胸部。除非是特別從事特別職業的婦女，因為和服開的襟口不同所以才能露出胸部。（本江小姐）

除了承襲中國的束胸風氣與受到日服的流行影響下，在日治其間政府大力推廣婦女穿著洋服殖民國晚期，更伴隨著服裝流行資訊發達、服裝學院盛行的外在條件影響下，婦女們接觸到西式內衣的款式，但是她們仍舊將內衣看成為遮蔽胸部的服裝。訪談者表示如下：

日本人管理的時候，雖然大家已經不再穿肚兜，但是因為日本人也有束胸的習慣，加上我們這邊的人覺得女性胸部過於明顯好像就很好，所以除了穿小背心之外，只要胸部稍微比較大的女生，都會用棉布纏繞起乳房，這樣就不會被看出來是大胸脯。（吳女士甲）

我們以前那個時候哪有給人家看自己胸部有多大，都希望不要被注意到自己的胸部。又不像現在大家都要穿的讓人家看到胸部。穿背心也就是讓胸部平平的，最主要還是可以吸汗，可以不用常換洗外面的衣服啦！（吳女士乙）

束胸在鄉下比較少人這樣做啦！大部分都是要出勞力的工作，所以也沒人在注意胸部大或小，穿著一般小背心的樣式也不會讓人注意到胸部，所以也不用特別束胸。（蔣張女士）

從上述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得知，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至中央政府剛光復台灣之際，其實多數台灣婦女在看待內衣與身體的關係，還是停留在束胸與遮胸的觀念裡，傳統的倫理價值觀仍是約束婦女們穿著打扮的主要規範之一。雖然當時的教育方針與政策頒佈，促使台灣婦女接觸到不同於肚兜的內衣資訊，但是身處那個年代的台灣婦女，居多還是將穿著內衣停留在不顯露自己女性化身體的思維中。換個說法，她們認為沒有展示出自己具有胸部的女性身體，才是符合當時認為美的女性身體。

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婦女看待身體的方式，顯然因為內衣穿著樣式的更換有所改變，也就是肚兜作為老一輩婦女的內衣，雖然並非強調束胸與遮掩乳房的功能，主要是保護身體的功能。但在爾後因為棉布取得容易，小背心樣式的內衣逐漸取代肚兜成為當時女性主要的內衣款式，此衣服的設計也無法烘托出乳房的形狀，但在婦女的看待此時的內衣與身體關係，儼然是一件作為遮蔽胸部的重要衣服，也就是婦女們將內衣視為掩飾女性性特徵的主要服飾。

於是，內衣作為一件既是女人遮胸與束胸的衣服，蘊含其中的意義是經由整套社會價值觀所建構而成，並且婦女們展示的身體意象，是需要穿著內衣的實踐過程，以呈現當下認為遮掩胸部的女性身體才是得宜的表現。「我們觀看和理解裸露身體的方式受之衣著習俗的制約，因此衣著對於我們理解身體是至關重要的。」（Daniel Roche, 2005: 3）這正是回應了 Butler 提及看待身體與性之間的關係，必須先瞭解整個文化與歷史建構起我們看待身體的方式，並且針對物之物質性的探討，也得回歸到它本身形成其意義的結構中進行分析。

換言之，影響台灣婦女透過內衣來掩飾自己女性化的身體，除了內衣本身此物質所具備的社會價值賦予的意義，無法將女性突出的性特徵展現出來外，更因為當時婦女看待自己身體的方式，被教化認為乳房是不應該外顯的器官，於是，需要透過服裝包裝呈現一種符合社會期待的女性身體。

論中國或西方國家，某一時期的社會禮俗都曾以緊身胸衣要求女性掩飾突出的胸乳。在日常生活中，男性裸露上身被視作平常之事，女性則不能；除了特殊場所性挑逗的裸露之外，「掩飾」確實是女性已經內化的服裝心理。（陳義芝，1999：98）

於是，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思考的是，什麼是女人的身體？遮蔽與掩飾胸部的內衣，建構了台灣婦女遮蔽性特徵的女性身體，並且將一定類型的身體和「女人性」之間作為聯繫。

然而，內衣作為遮蔽女性性特徵的意義之下，卻在手工內衣的引進、西式內衣款式逐漸普及後，以及外省婦女從中國帶來的流行服飾影響下，為女人的身體與內衣的關係開啓另一種可能性。台灣婦女穿著內衣作為遮蔽與掩飾胸部的的身體於此時有了轉變，內衣反而成為凸顯「女性」身體的重要服裝。

我們可以從在李玉婷（2005）與覃思齊（2003）的研究中得知，手工內衣盛行的年代，台灣婦女們開始透過穿著內衣來修飾與雕塑出具有曲線感的女性身體。這也表示，當台灣婦女接受穿著西式內衣之際，內衣已經不再只是作為遮胸與束胸的服裝。一篇以「今日袒胸露臂的小姐對於中世紀的時裝當不敢想像」作為副標的報中文章寫著：過去的台灣社會裡，女性內衣的功能性在於遮蔽乳房，而非藉由衣物將它隆起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反之，刊登這篇文章的年代（也就是民國四十二年）婦女們穿著內衣是為了使其胸部隆起。

在都鐸爾王朝處女的象徵就是露胸，一個少女未嫁就掩蔽酥胸便被認為極為不大方和不知禮。至一八二〇年後的一百年間，便是扁胸、無臀，長足的束胸女郎盛行時期。現在作為人家祖母，老婆婆回想二十年前去購買乳罩的事情當不禁啞然失笑，那時，乳罩不是用來使乳房挺直而把它壓下。（自立晚報，1953年1月29日）

另外，在聯合報中刊登一篇家政講座：解說乳罩⁶⁰縫製法，文章內容提及到女性的內衣具有修飾胸部的曲線之功能。我們可以發現，此時關於內衣的論述已經成為包裝身體與呈現美感體態的物件，也就是，西式內衣作為主流內衣之際，婦女們穿戴這件衣服，不再是著重其遮蔽胸部與保護身體的功能。

乳罩的用途，主要為調節乳房過大或發育不良，使胸部能曲線畢露。並將乳罩分做五種：無帶型、兼束腰型、硬托型、涼爽型、假乳型。「硬托型」是針對「乳房下垂者適用」，目的在「乳房因乳罩下部挺起而不致下垂，胸部自會勻稱」；「假乳型」則是針對「乳房過小」者，「施以假乳調節之」。（聯合報，1953年9月8日）

⁶⁰ 此時用的乳罩稱呼，就是我們現代稱女性內衣—「胸罩」的意思。

換言之，隨著西式內衣樣式的演進與流行，婦女們可以經由穿著這種款式的內衣，凸顯女人身體的性特徵—「乳房」。不僅因為內衣本身樣式的汰換，導致婦女們對於穿著內衣後的身體有不同的認知，更因婦女們爲了搭配盛行於當時的旗袍服裝，格外會去注意內衣的穿著，以展示自己具有乳房的體態。製作旗袍執業的郝女士就表示：

過去婦女穿旗袍是一定要穿內衣（胸罩樣式）的，才能把胸部給支撐起來。有些人可能不習慣穿內衣，也會要求我們在做旗袍的時候多縫胸部的內襯，讓乳房看起來比較明顯。（郝女士）

除此之外，與耆老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在中央政府來台治理後，婦女們看待身上穿著內衣的身體，與日治時期相較之下，有著明顯的差別認知。此時她們藉由穿著內衣展現自己的「女性」身體，也就是不再避諱一個具有胸部的身體，而是透過內衣將乳房的曲線呈現出來。而這重大的轉變與當時流行的手工內衣有明顯的關連性。

在訪談過程裡發現，無論是本省籍或是外省籍的婦女，都有訂製手工內衣的經驗，其中有的人是想要藉此衣服雕塑身材，有的人則是追求當時的流行而去訂作，有的人則是看過自己的母親曾經穿過，並且告訴她長大後可以去訂作這樣的衣服。即便促使她們擁有此內衣的原因大相逕庭，但是她們都明白透過此款式的內衣是可以展示更美好的身材，甚至我們可以說，婦女們穿上這種樣式的內衣，其胸部的形狀展露無疑。

其中一位出生於台灣中部本省籍的張女士乙，現齡六十四歲，實踐家專畢業後即擔任家政老師一職，目前退休在家。她表示自己年輕唸書的時候，就十分注意當時的流行服裝，在大家流行穿著旗袍的時代，她也跟著去訂作了手工內衣，事實上那個年代的手工內衣其實價格不斐。另一位南部本省籍的簡女士，現齡六十七歲，曾擔任過高中教師，目前退休在家。她認為年輕之時開始跟著流行去訂製連身內衣，主要的原因是爲了要穿旗袍，才得大費功夫一番。而在早期還不流行穿著旗袍的時候，女生的胸部根本不會是目光焦點所在。

我是在台北唸書後看到很多婦女在一些場合都會穿旗袍，年輕女子雖然居多穿著洋服，不過也會開始注意自己的身體或是胸部。聽人家說手工內衣對於身材的雕塑有用，而且穿上那種內衣後再穿旗袍才能將女性的身材給展現出來，於是我也跟著去訂作了。（張女士乙）

我們以前在上海穿的內衣就是自己去百貨買的，到了台灣剛開始要買內衣都不容易，但是可以找人訂作。又因為也愛穿旗袍，我們這些同事、朋友都會一起去作連身的內衣，這樣身體都會被修飾得很好看，穿上旗袍也很美。(黃女士)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其實因為布料材質，其實都沒有現在來的進步。現在稱的調整型內衣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手工內衣。我們跟著流行去訂作衣服，其實也不全然是要給人家看胸部，而是穿了那樣的衣服後，身材變的好像比較玲瓏有緻。不過因為是訂作的關係，服裝的彈性也不大，可能是這個因素才能讓身材變好。然後再穿上當時盛行的旗袍後，身體的曲線都很明顯。(簡女士)

從以上的內容我們可以得知，在中央政府遷台後，內衣對於女人的身體，不再侷限於一件保護身體與遮掩胸部的意義裡，而是婦女們透過內衣此服裝來彰顯女性具有性特徵的身體，同時婦女們因此在乎自己打扮後，是否呈現符合當時身體美感的意識也逐漸抬頭。

內衣在其樣式流變的過程中，不但是一件女性特有的服裝物件，且夾帶著多重穿著的意義。重要的是，人們藉由這件衣服，將女性的身體置放在既是遮掩卻也是展示的框架裡。而女性內衣除了作為遮蔽與展示的「女性」身體的功用外，我更進一步要釐清的是，什麼樣的力量與觀念加諸於在穿著內衣的身體，使婦女們認為穿著內衣是必要的。換句話說，婦女們對於身體美感的認真已經不再停留於遮蔽與掩飾胸型，而是在這件衣服所包覆身體的意義中，還增添了文明化的身體意象，其中包含了乾淨與衛生的身體、以及避免呈現不好意思的胴體。

4.2 穿著內衣後的文明身體：自己與他人的眼光

隨著內衣樣式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這二十年間的演進過程中，婦女們看待穿上此衣服後的身體觀感也隨之轉變，她們藉由穿著內衣展示了兩種看似矛盾卻又是相互結合的女性身體意象。而更有趣的是，在「遮蔽」與「彰顯」的身體感中，同時存在著「文明」身體的概念，也就是婦女們都會穿上內衣，無論是以何種形式或款式所呈現的內衣。

什麼原因導致台灣女人們皆穿著內衣這種普遍現象的產生，並且在他們的認知裡萌生有文明身體的概念？我們可以從日治時期的教育課程中得知，婦女們開始認識到內衣是具有「乾淨」與「衛生」的象徵意義，而且在穿著此衣服後，可以保護外衣且使之不與身體作直接接觸。於是，這樣

的論述正當化了穿著內衣的必要性，使得女性身體的也落入乾淨與衛生的文明框架中。然而，這樣的脈絡與西方強調穿著內衣的意義有雷同之處，西方認為穿上內衣的理由「正是保護外衣不因流汗或污垢而弄壞，也避免身體與羊毛粗糙布料直接接觸而引來的不適。」（Ewing，1978：180、Steele，1996：116）

在二十年間的台灣社會脈絡中，婦女們雖然透過穿著不同樣式的內衣，呈現差異性的身體觀感，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透過穿著內衣在遮蔽與彰顯女性身體的同時，卻也呈現了具有文明意義的身體。而什麼是「文明」的身體？又應該這麼問的是，穿著內衣後所建構出的「文明」身體是一個什麼樣的身體？我認為透過了解婦女從自己與他人的眼光中可以發掘建構出文明身體的過程，可以進一步了解，這文明化身體包含著何種更為細緻的意義。

4.2.1 什麼是「不好意思的身體」？

Elias（1998）曾以「羞恥感」解釋了文明的起源，而包覆身體的衣服也因應人們對於裸體的觀感有所改變，發展出不同的樣式與設計來包裝身體。也就是當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呈現在外人面前，有著社會上賦予應該如何展示身體才為合宜的狀態，於是，人們選擇什麼樣的衣服來遮蔽與裝飾身體就變成相當重要。「人們對於裸體感到羞恥感，所以為了應付一些場合和需要，於是設計了特殊的衣服來增加身體的莊重。」（Craik，2000：164）

但是如果直接以西方解釋羞恥感的穿衣意義套用在我們生活裡，似乎忽略在不同社會脈絡裡，看待同樣一件服裝卻能所發展出來不同的意義。也就是當中、西式內衣在台灣社會中開始交鋒之際，台灣婦女穿戴內衣後看待自己的身體，不全然落入西方認知身體的羞恥感思維中。相反地，我認為台灣婦女穿著內衣後的身體，隱含對於羞恥的觀感還是不同於西方社會的，而且我們必須去檢視與質疑的是：看待穿著內衣的羞恥感為何？她們遮蔽的是什麼樣的身體？在意的什麼樣的身體被這件內在衣服所掩飾，而存在著不好意思的感覺。對於台灣婦女而言，女性的身體在其「性」特徵在被內衣所包覆後，有著遮蔽與彰顯的意義，但是我發現，在她們看待「遮」的意涵也因為內衣樣式的轉變有所不同，同時在「顯」的脈絡中也蘊含著「遮」的意義。

我們先就西方提出「羞恥感」置放在服裝的脈絡裡，重新詮釋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的台灣，婦女的身體經由內衣的包裝後，呈現了何

種「羞恥感」概念。在內衣作為遮蔽女人身體的意義裡，其實可以發現，當時的本省籍婦女藉由穿著內衣掩飾隆起的乳房，這不僅於是受到傳統習慣與民俗風情的影響，更因為婦女們開始在乎他人的眼光。我們可以從王榕生發表的文章中得知，從他人眼光中看到婦女隆起的胸部似乎是件丟臉的事情。另外，與出生於中央政府遷台前的本省籍婦女訪談中得知，她們對自己凸顯的乳房感到羞恥。這種羞恥感在台灣社會的脈絡中，是一種不想被人看到「女性」的身體，也就是性特徵過於明顯的情形下，會使本省籍婦女感到不自在而且不好意思，於是，她們覺得需要透過內衣來掩飾這具有「不好意思」意義的乳房。

在我們那時候女人的胸脯太大出門都會頭低低，沒有像現在這樣要人家看到啦！那時候穿背心當作內衣就不會看起來很大，麻煩一點就是用棉布包起來，在不然就是盡量用外面的衣服遮住胸脯，讓它看起來平平的。（羅李女士）

其實日本來管理的時候，女生穿著還是比較含蓄，雖然已經接觸了洋服也知道胸罩那種東西，不過大家多半還是會添加襯衣或是背心那種衣服當作內衣，我自己現在就是還有穿啊！沒穿很不習慣。會這樣穿一方面是習慣了，覺得多穿一件可以吸汗，但是其實主要是因為多穿幾件，胸部不會看起來很大，我們那時候胸部大的女人，很多都被笑稱為「布袋奶」，這種女人很多都是當奶媽，幫忙餵奶的。（吳女士甲）

日本人教我們怎麼穿著服裝也都不要我們把胸部露出來，就是不要讓它看起來很大很突，那樣不好看而且我們那個年代根本不覺得胸部大是好事，大家都會因為胸部太明顯感到不好意思。（吳女士乙）

你看我現在也都是裡面隨便穿著襯衣，胸部哪會很明顯。以前的女生才不想要把胸部弄得大大的，很奇怪而且也會被人家笑。日治時期我開始穿小背心、汗衫也都會注意一下胸部會不會太大，免得出門很不好意思。（曹女士）

在這些耆老訪談中，我發現在日治時期成長的本省籍婦女，多半都會認為自己的胸部是不應該彰顯的，並且這個明顯且隆起的性特徵，是造成她們感到不好意思的主要因素。另外我注意到，至今在她們身著外衣下所包覆的身體，其實仍然看不出來其顯著的「性」特徵—乳房。換言之，羞恥的乳房對於這些本省籍的年老婦女來說，已經是根深蒂固的想法，並且需要透過內衣與外衣的雙重遮掩下，才能展示出她們認為合宜且不會感到

羞恥的「女性」身體。

而我特別注意到在覃思齊（2003）研究裡，她將西方認為顯露乳頭是不禮貌的觀點，置放在台灣的脈絡來探討。她指出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目的，是爲了遮蔽突起的乳頭，也就是將西方認為內衣具有「遮」的意義直接套用在台灣社會中。可是我發現這樣的研究結果，其實忽略了一群生活於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的台灣婦女，她們穿戴內衣之時，所著重的「遮」不完全隸屬於此框架內。尤其對於外省籍的婦女而言，她們接觸西式內衣與乳罩之時，難以發現將內衣作爲遮蔽乳頭的衣服，藉此避免呈現尷尬的女性身體這種論述。

過去我們穿著的胸罩不是現在的圓形樣式，是比較尖的款式，很簡單的布去縫製，其實穿上後乳房看起來就很挺。至於會不會很凸顯乳頭，其實當時候我們也不會那麼注意，也沒有想到這麼細節的事情。（黃女士）

穿內衣倒不是什麼怕乳頭明不明顯的問題，以前的人也沒有特別去注意乳頭這件事情。這應該都是比較晚期的事情，至少我們剛開始接觸胸罩都不會認為是要遮蔽乳頭。（郝女士）

我們那時候穿胸罩不會特別說要去遮乳頭，因為當時候也不是以這個訴求來告訴我們要穿胸罩的。穿上後反而是讓自己的身體更美，我們年輕的時候才不會怕人家看胸部，也不會覺得露出什麼東西而不好意思。倒是我們的小孩在長大過程中，才慢慢注意到這樣的問題。（梁女士）

這些從大陸遷台來的耆老們接觸乳罩的時間比較早，但是在她們穿上內衣後的身體感知中，其實不完全存在著「顯露」乳頭的「困窘」身體。這樣的情景延續到光復後，台灣婦女開始接觸手工內衣之際也如出一轍。

其實以前的人不會那麼注意女人的身材，更不會去觀察到乳頭那麼細微的事情，像我們去做手工連身內衣，其實也不是說為了要遮蔽乳頭。學生時代開始會穿內衣也不是怕別人看到奶頭，反倒是說，有胸部好像得有衣服托著，免得晃來晃去不好看。（簡女士）

開始穿內衣大概也都是上了高中之後，就是怕胸部太大不好意思，所以才要穿胸罩式的內衣。加上制服也比較薄，怕胸部太過明顯，男、女生共校的情況下，都很怕被別人注意到，所以才開始穿胸罩。

不過母親因為受過日式教育，認為穿胸罩反而讓別人注意到胸部，所以並沒有買來給我穿。她從小就教我要穿的是小背心那種汗衫，她那一輩沒有那麼注重說要穿胸罩啦！除非是出席一些很重大的場合，才會多少穿一下。(李女士)。

我的胸部又沒有很大，剛開始穿內衣也不用去穿到胸罩那種樣式。是到了出社會之後，大概都已經是民國六十多年的事情，才開始注意到要穿內衣。因為露乳頭不太好、沒有穿內衣身體好像不太美觀，這時候才開始穿胸罩。不然以前的我們根本不注重這種小細節，也沒人看。(童女士)

與這些受訪者交談之際，我發現婦女們多數認為穿著貼身的內衣是怕自己的胸部過於明顯而感到不好意思，以及不美觀等考量，於是，她們認為需要透過這件衣服來避免上述尷尬之景，反而鮮少提及當今我們認為女性穿內衣是怕激凸的乳頭被人看到的想法。甚至從當時男性的角度來看，胡老先生提到在日治時期間，他們並不會特別將眼光投注在女人的胸脯與乳頭上。從以下的訪談可以得知，當時的人們在乎或是觀看的不是一個女人的乳頭，而是明顯的女人乳房。

女人以前穿衣服都是規規矩矩的，在日治時期的女生沒有人敢把胸部弄得很明顯，我們也不會去特別看這個部分，更不用說在不在意什麼乳頭很明顯，那個年代雖然服裝樣式慢慢多了，但是風氣還是很保守。(胡先生)

相對而言，覃思齊（2003）指出女性穿著胸罩來遮蔽尷尬的乳頭，這樣的著衣實踐過程，並不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的台灣社會中產生同樣的效應，更不是造成台灣婦女們看待自己身體具有「不好意思」感覺的原因。我認為台灣女性為了要遮蔽乳頭而穿胸罩的著衣實踐過程，其實是更為近代的脈絡，也就是當代社會建構出一套女性必須要穿著內衣，以符合禮儀文明社會中界定什麼樣的身體能夠展示於大眾的論述。

釐清屬於那個年代的「不好意思」女性身體所指涉的意義之外，我與本省籍與外省婦女訪談中發現，其實她們穿上內衣後的身體感知是存在著差異性。本省籍婦女認為穿內衣是要避免呈現具有「性」別的身體，免得在當時的民風之下受人譏笑與議論紛紛。然而，外籍婦女卻認為透過內衣所展示「女性」的身體，並不會有不好意思的想法，反而是種美感的呈現。

另外，除了在省籍上婦女們看待穿著內衣的身體有不同的感受外，年

齡的差距也影響著她們觀看身體的方式。尤其到了中央政府來台後，可以明顯發現，在這之後成長的婦女們，她們開始吸收到穿內衣的行為，是為了避免乳房的晃動，以及遮掩乳頭的知識，並且更加在乎自己的內在穿著得宜與否，與是否受到他人的目光注視，因而產生了對於不穿內衣有羞恥與尷尬的感覺。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社會，並沒有龐大的知識與論述，討論與教育女子穿胸罩與遮蔽乳頭之間直接關連性，婦女們除了以耳濡目染與口耳相傳的方式，接受這件新式內衣的資訊。另一個作為檢視她們是否有穿著內衣的重要因素乃是，婦女們看待身體的方式已經受之於外在眼光的影響。

我們可以這樣說，內衣中含有「遮」的意義，在隨著內衣樣式的改變以及婦女們看待身體的方式不再只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而呈現了兩種不同的意義，其一為遮蔽「乳房」，其二是掩飾「乳頭」。不過這兩種遮蔽的身體，是在自己與他人目光的注視下產生作用。兩種意義同樣指涉著婦女開始遮蔽具有「性」意義的身體，因此，她們才認為需要藉由「內衣」來掩飾一個具有不好意思意義的身體。

4.2.2 禮貌的身體意味著健康與合宜

隨著人們在穿著服裝的實踐過程裡，也為服裝與身體賦予新的定義。Daniel Roche (2000, 2002) 更是直接指出，在文明社會中，服裝對於人們的意義不再侷限於功能性的目的，而是多了一個穿上服裝後呈現符合社會所期待的身體。人們的身體透過服裝儀容打扮後，呈現象徵健康與合宜的身體，這兩者都在社會關係裡交互運作與產生關連性。相同地，我們可以從台灣婦女面對女性內衣流變的過程中，重新認識穿著內衣後的身體，呈現了哪些多重意義。

西式內衣開始取代肚兜之際，寬鬆的小背心樣式內衣，成為日治末期台灣婦女能夠自製且穿上的主要內衣款式。它的設計不僅延續著傳統觀念中認為內衣的主要功能在於能保護腹部與胸部，同時身體的背部也能夠被遮蔽住，不與外衣直接接觸，此款內衣兼容並蓄著兩種功能外，加上在一套知識教化下，使人們認知到比肚兜多出後面一塊布的內衣，是更具備著吸汗與維持身體健康的作用。

換言之，在婦女穿著內衣蘊含著束胸與遮胸的過程裡，內衣此物件本身被塑造出來的著衣意義，還夾帶著衛與生乾淨的概念，使得婦女們視之內衣成為與身體直接接觸的重要衣服。而透過內衣來掩飾乳房的女性身體的論述，是經由整體教育體系所建構出來的一套穿著規則。首先從家庭教

育開始，母親即告訴女兒要穿著內衣來保護身體，並且在殖民政府與中央政府時期的學校教育中，也開始灌輸學生們穿著服裝的衛生與健康的知識，藉此強調穿著內衣之必要性。更因為這樣的論述在教育政策中廣為實施，使人們認知到得維持它本身服裝的乾淨，才能保持健康的身體且避免病菌的傳染，人們因此瞭解內衣對於創造健康的身體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成長在台北現齡高達八十五歲的陳先生認為，日本人給予孩童衛生觀念之強大，導致他們開始學習穿著乾淨與衛生的內衣，服裝成爲教育他們爲衛生觀念中的重要一環，因爲保持乾淨的衣服才能有助於身體的健康。

日本人很注重衛生觀念，所以都會教我們該怎麼穿衣服，然後告訴我們內衣應該穿怎麼樣子的，還要常換洗，身體才會好。(陳先生)

我母親有受過日本教育，那時候媽媽也都會教我們要穿內衣，然後得注意內衣的整潔，要常常清洗更換。不過那時候我們女生、男生穿的內衣都是小背心款式，沒有現在的女性內衣樣式。後來自己上學了，學校也有提到要維持衣服的整潔，自己念家政學校的時候，也格外要求整個服裝的衛生乾淨。(張女士乙)

然而，不僅是在日治時期才存在著建構內衣與健康身體的論述，中央政府時期的教科書也同樣地將內衣與身體的健康發展劃上等號，我發現作爲女生習得女紅技能的《家事》課本內，記載著許多關於女子內衣與健康的論述，內容如下：

內衣太小，或式樣不合宜，有阻止身體發展之危險，闖入舊日女子穿小背心，腰部束緊帶，按衛生之原理考察之，使之有極大弊病。小背心阻止肝部之發展，束帶有妨腹內各生機之工作，……。(第一冊，17)

從上述的史料中其實我們可以發現，當婦女們開始選擇不同於舊式款式的內衣，建構身體與新式內衣的論述也逐漸形成。這樣的教化手段不僅使台灣婦女接觸了新的「物」—多種西式內衣，也接受了穿著內衣後展現「新」的身體，一個穿著內衣能夠展現健康且衛生的身體，作爲文明社會下所呈現的禮貌身體。

然而，內衣作爲創造健康的身體僅僅是呈現禮貌身體中的一部份，穿著合適的內衣與外衣搭配作合乎禮儀的打扮，才是婦女們首要學習的任務。我發現在日本的婦女雜誌中，已經出現了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內在

衣服，內容介紹的相當鉅細靡遺，含括各種款式的貼身衣服，其中包含上半身的胸罩、襯裙、睡衣，以及下半身的內褲、吊帶式內褲、絲襪等西方社會中婦女們不可或缺的內在服裝。文中闡述著每件衣服的用途、以及穿著的必要性，來強調每件內在衣服有其獨特之處⁶¹。不僅如此，在縫紉教科書上與流行雜誌中，還出現了教導婦女們該如何配合外衣去選擇內衣樣式與顏色的資訊，甚至刊載了如何透過穿內衣來呈現女性胸部的美感論述，並且指出該如何將內衣與外在衣服做合宜的搭配。內容如下：

選擇ブラッシュェールの顏色來說，通常以粉色、白色與奶油色為主，樣式盡量以簡單為主，若想要有變化，就是加入蕾絲的點綴，除非需要與外衣相襯，才選擇較為深色的布料來製作，否則一般以淺色為主。(文化洋裁講座，5卷:45)

胸罩式內衣選擇上得注意深淺顏色，以及考量乳房大小，做適度調整。襯衣式背心內衣可在家中穿著，配合洋服穿著要注意長度選擇。(美容醫學與化妝的魅力手帖，104-105)

若說「著衣是一個具體的活動，而且是一個被嵌入各種社會關係中的具體活動。」(Entwisle 郜元寶等譯，2005：6)那麼台灣婦女需要透過穿著內衣，來符合文明社會中樹立合乎禮節與合宜的遊戲規則，一點也不為過。我們可以發現，從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初意來說，與人們賦予此衣服本身的文化價值與實用性緊密相連。但是到了多款內衣樣式的崛起與流行之際，反映的是，內衣與身體之間存在著更多透過論述形成的女性身體意象。其中可見的是，當人們開始接受內衣是隱含著具有乾淨與衛生意義的同時，台灣婦女進一步認知到，穿著內衣與自己呈現的合乎禮節的體態息息相關。

換言之，對於早期的台灣婦女而言，內衣其實是一件最為不過簡單的衣服。隨著內衣樣式的更迭，出現多元樣式的西式內衣，以供台灣婦女們因應場合與追求流行趨勢作選擇，穿著內衣逐漸轉向成為女性展示禮貌身體的意義。但是內衣作為呈現一個具有禮貌的女性身體的物件，不是狹義的落入遮蔽女性乳房與乳頭的定義內，而是作為管理人們的健康與建立衛生觀念的重要服裝。也就是說，當時台灣婦女們所形塑的女性身體意象，是含括在整個文明化的身體概念中。「服裝與文化、經濟以及社會現象息息相關，它在歷史上所佔有的位置不僅與個人、性慾以及社會緊密扣連，在許多過程中也扮演著塑造以及控制身體的角色。」(Daniel Roche, 2000：196)

⁶¹ 見附錄圖片十三。

於是，當我們重新檢視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身體，是具有一個符合社會期待與塑造的文明身體意象後，更進一步要探討的是，這樣的身體在結合外衣與流行時尚後，「女性的身體」又是呈現了什麼樣的樣貌。也就是婦女們透過內在與外在服裝包裝後的身體，展示出何種定義下的一個「美」的體態。

4.3 透過「內」與「外」衣包裝的女性體態

「對於衣著的研究，還是忽略了衣著作用於身體的方式，因此我們仍然有必要強調將日常生活中的衣著作為具體化的實踐來考慮：衣著怎麼作用於作為現象的運動著的身體、衣著如何是一種涉及「伴隨」著身體又「專注」身體的個人化活動的實踐。」（Entwisle 邵元寶等譯，2005：7）同樣地，在我們了解台灣婦女如何穿著不同樣式的內衣的實踐，更可以發現其實這實踐過程不僅僅是個人化的活動，而是屬於一個社會的實踐，一個可以透過權力與知識介入的實踐行為。

然而，在這個身著內衣的女性身體置放在社會實踐行為中，社會又是如何建構與塑造穿衣的「女性」身體體態？或者我們可以問的是，什麼樣的體態美感被展現出來？這些問題即是我在這節中亟欲探討的。

我發現在過去探討台灣婦女穿著內衣所呈現的身體研究，主要是側重在個人穿著內衣的實踐過程。也就是研究者透過訪談的方式，得知受訪者闡述自我身體在穿上內衣後與不穿之間的感覺，進而分析婦女看待穿著內衣後的身體，對於自己的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以及她們如何對內衣的給予什麼樣的定位。但是，我認為這樣的研究方式與結果，會忽略了在個人經驗之外，社會文化中早已建構一套審視女人身體的體態標準，而這套標準影響了台灣婦女選擇穿什麼樣的「內」與「外」衣，展示出當時認為應該呈現的「女性」身體。於是，我認為要了解內衣與女性身體之間的關係，必須回到整個社會脈絡中，檢視那個年代裡女性身體與穿著內衣的相關論述，才能更為清楚台灣婦女是如何認識這兩者之間的巧妙關係。

論及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身體意象，我們可以發現，少不了與外衣作為結合而發展出更為多元化的意義。也就是當洋服逐漸取代了舊式的中國服裝，又加上具有上海與港式風格的服裝，隨著外省族群遷台，逐漸成為婦女們爭先模仿的流行服裝，此時的內衣與外衣對於婦女們來說，存在著指涉可以形塑出女性身體體態美感的意義。我將在這章說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在台灣社會中，存在著什麼樣的女性身體想像，這種女性穿著衣服的體態又是如何被勾勒出來的圖像，或者可以更進一步問的是：

女性身體是置放在哪些語境論述中被討論與看待。

從日治時期晚期至中央政府接收台灣的初期這二十年間，台灣婦女們接受西方穿著打扮與塑造自己身體呈現美感的資訊日益增進，西方穿衣美學的準則藉由西服東進的過程裡，大量地出現在報章媒體中。於是，婦女們婀娜多姿的曼妙身體意象也浮出檯面，備受眾人關注。也就是說，一套女性身體美學的意識型態透過大眾媒體，漸漸地影響著台灣婦女看待穿衣的身體。

「日常生活中衣裝總要比動物的外貌意味著更多的東西，它是自我經驗和自我顯現的一個密切的方面，他與自我的身份的聯繫是如此的緊密，以致於這三者—衣裝、身體和自我—不是分開來設想的，而是作為一個整體同時被想像到的。」（Entwisle 郜元寶等譯，2005：6）於是，我將藉由當時刊載在報章中婦女們穿裝打扮的美感論述，以及所呈現女子身體的圖像，再加上訪談三種資料分析與對照，探討台灣婦女在著衣後展示出何種「女性身體」。

4.3.1 什麼是曲線美的女性身體？

從先前的討論我們可以得知，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初意是爲了要遮蔽乳房，呈現出不具女性性特徵的身體，但是隨著內衣樣式的演進與人們受到服裝時尚流行的影響，婦女開始藉由穿戴此服裝強調有胸部的女性身體，甚至透過此衣服修飾出具有曲線的身體體態。明顯可見的是，關於女性內衣的介紹，逐漸被置放在禮儀文明之外的框架中，也就是要如何透過這件衣服創造出「美」的胸型，以及雕塑出女性身體的曲線線條。

不過，在論及女性身體被塑造出具有曲線美感的體態之時，必須先回顧西方審視服裝與女性身體之間判別美感的脈絡。因爲從西方傳入東方社會的內衣不僅是一件衣服的穿著意義，而是伴隨著整個觀看女性身體的審美價值觀。而我認爲初步的檢視西方觀看女性穿著衣服所展示的身體，才能更進一步地探討，內在衣服如何塑造身體，以及與外衣的搭配之下，展示出有別於傳統社會中的台灣婦女身體形象。

從葉立誠（2001）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得知在二十世紀初，整個歐美女性體態的審美觀是以強調「S」曲線作為輪廓重點，也就是訴求婦女的身材需要達到「豐滿的凸胸、纖細的腰身、突出圓翹的臀部。」爲了要塑造出這種理想的身材，女性必須藉由穿著內衣—束腰（corset）塑造身體曲線。而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因爲受到美國好萊塢工業的影響，明星們紛紛

以服裝展現出「成熟、性感、嫵媚、強調曲線的」體態，並且帶領整個流行時尚趨勢以及女人的裝扮。此時的婦女在穿著打扮上都朝這個方向來裝扮一個具有曲線美的身體。（Hawthorne，1992：42）雖然到了一九四〇年代，一度因為戰爭，女性形象轉為以「樸素、實用性」作為當時標榜的口號，不過隨著戰爭結束，女性被賦予柔性特徵仍舊浮出檯面。在這個時期內，我們可以發現受殖民政府治理的台灣，也趕上這波儉樸風潮，眾人在穿著打扮上受到政府規定所限制⁶²，台灣婦女此時在打扮上也顯得相當簡單與注重實用性。到了一九五〇年與一九六〇年，西方國家再度流行細腰的「沙漏型」體態審美標準，於是束腰內衣又再度受到女性的重視。而一九六〇年代的女性身體審美標準仍與之前有所差異，此時開始強調女性的身材是顯露出骨感與消瘦的線條美，所以節食與減肥的論述也此時萌芽。（葉立誠，1995：32-24）然而這套西方看待女性身體的審美觀價值，也在台灣社會中逐漸盛行起來。

我發現，在日治時期間，早已透過婦女雜誌將西方價值觀內認為身為女人該擁有的樣態與裝扮再現出來⁶³。因此促使台灣婦女們開始注意到另一種別於傳統價值觀下的女人樣貌，進而學習與模仿西方的時髦裝扮。加上當時關於裝扮上的資訊琳瑯滿目，例如髮型、眼鏡搭配、化妝等⁶⁴，文中將不同臉蛋的女性逐一介紹，指導婦女該如何選擇合適的髮型與眼鏡，又該在哪種場合與時間中畫上適宜的妝，內容中鉅細靡遺地介紹眼部至嘴巴的每個妝容。

除此之外，雜誌內也敘述著如何保養女性身體中重要的性特徵—乳房，使之體態更為完美。我發現在這個時期甚至就已經存在著隆乳，與美化胸部的美容知識。《美容醫學與化妝的魅力手帖》一書中敘述如下：

使用按摩膏以及外擦藥膏對於較小的乳房幫助並不明顯，直接以注射方式或是吃口服藥的效果比較明顯。吃藥或是以打針方式都要經過醫生的問診後來使用比較安全，通常可以達到自己預期想要的效果。至於以按摩油或是乳膏狀的產品，得勤於使用與按摩，而且擦抹的時候一定要避開乳頭。以這樣的方式來增大乳房並非一朝一夕可明顯看見，需要持之以恆。（頁60）

換言之，婦女們已經開始注意到自己乳房大小是否符合一個美觀的身

⁶² 政府推廣國人以穿著國民服作為主要的服裝。

⁶³ 見附錄圖片十四。

⁶⁴ 見附錄圖片十五、圖片十六、圖片十七、圖片十八。

體。而這樣的資訊也在光復後持續蔓延，這意味著凹凸有致窈窕女性身體，逐漸成台灣為婦女們嚮往的完美體態。聯合報中的一篇〈時裝與變〉的文章提到：

因為乳罩、義乳是近來一個新興大行業，報紙雜誌靠這行收入很大廣告費。甚至一些左道旁門醫生並以隆乳數騙錢，雖然針到命除，報上不斷報導，但愛美者仍是前仆後繼。(聯合報，1954年9月30日)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婦女學習穿著與裁縫洋服的時候，也接觸了西方審美觀中標榜具有腰身曲線的身體。我們可以從當時的雜誌中看到，介紹新款洋服的資訊，都刻意地將女性的身體勾勒出一個具有腰身的身體，甚至一旁的文字敘述寫著，這樣的身體是一種理想的體態⁶⁵。

除了手工繪圖的插畫中可見此曲線身體的輪廓外，還可以從當時少見的人體模特兒照片中發現，經過外衣包覆的婦女身體是具有腰部曲線的⁶⁶。換言之，當時流行的婦女身體是蘊含著西方審美觀中有腰身的女人身體。甚至從在日治時期的雜誌內，隨記笑話的插畫中，發現早就已經有呈現女性突出的上圍圖樣，以及描繪出女性身體具有「S」型線條的模樣⁶⁷。從插畫圖片中，可以明顯看出婦女身穿西服洋裝，襯托出隆起胸部與纖細的腰部曲線。雖然漫畫插畫反應社會真實面仍有誇張之嫌，不過可以藉由這些圖片側面了解，當時西服的盛行與流行，女性身體的豐胸塑腰論述也逐漸形成。

然而，這具有豐胸塑腰的女性身體論述，在中央政府接收台灣後更是大放異彩。這是由於婦女們認識到另一種款式的內衣—連身手工內衣，透過它可以將女性身體的胸部與腰部曲線雕塑得更為明顯。於是，玲瓏有緻的曲線美體態已經不再侷限於腰部的纖細，而是多了一種塑造高挺雙峰的意義。

我們可以從與耆老訪談中得知，在她們穿上手工內衣的主要原因就是能夠整型，把身體曲線給雕塑出來，然後在穿上外衣後才能展現「女性」的身體。現齡八十歲的外省籍婦女梁女士，即認為有沒有穿手工內衣，對於展示身材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六十三歲的劉女士則表示，當年她是很愛漂亮的女生，當然也會跟著流行去訂製手工內衣，穿上它之後才能雕塑出

⁶⁵ 見附錄圖片十九。

⁶⁶ 見附錄圖片二十、圖片二十一、圖片二十二。

⁶⁷ 見附錄圖片二十三、圖片二十四。

完美的身材。

來台後手工內衣的師傅也不多，都要特別去找技術好的，因為穿那種內衣可以將胸部固定住、也可能讓小腹不見，穿久了就習慣要穿這種衣服了，而我們那時候又流行穿著旗袍，身材要是不好看，那麼穿旗袍就更難看了。(梁女士)

什麼樣式的西式內衣我都有穿過，我年輕的時候超愛漂亮的，你看我現在的打扮也知道。那時候流行穿著手工內衣我也跟著去作，可是穿那種衣服有點不自在，不過可以把肉都集中起來，胸部看起來比較壯觀、腰部也比較細，屁股也不會垂垂的樣子。(劉女士)

從中我們可以得知，無論是內在的衣服與外在的衣服，其功能性已經延伸至塑造女性具有「曲線」美感的身體，而這樣的女性身體美學觀也因為西服東進，使得台灣婦女在穿著打扮上，朝著西方服裝美學價值觀邁進。這意味著無論是內衣還是流行服裝，對於台灣婦女的身體所產生的意義，不再是實用性如此單一化的解釋，而是附有多重的功能性意義。同時，台灣婦女看待身體的方式也邁入追求時髦與美感的視野中，透過衣服展示她們當時認為一個符合流行與美的體態。換句話說，內衣成爲一種雕塑身體的服裝，而穿著內衣的女性身體是更能夠展現「女性」的身份。

4.3.2 透過洋服與旗袍展示的女性身體

在訪談過程中，許多耆老們皆提到，穿著可以修飾身體的內衣是因應外在衣服的需求。於是我試圖從穿著旗袍與洋服的婦女論述與圖片中，分析穿著打扮後的女性身體被置放在什麼樣的位置。「女人的服裝以及姿勢在賣弄風騷的規則中反映了整體地女性身體訓練。」(Freadman, 1988: 129) 尋此脈絡，在這小節裡我將從著重在台灣的畫作與報紙刊載的內容，找尋相關女人與服裝和身體的議題與論述，透過外在衣服展示的女性身體在哪些脈絡中產生意義。

4.3.2.1 穿著旗袍的女性身體圖像

我們可以從日治時期的畫作中發現，當時畫中呈現的台灣婦女，居多身穿中式服裝，其中雖有女性穿著改良式的中式服裝與洋裝，但明顯可見的是，畫作裡的女性身體並沒有具備凹凸有致的曲線身體⁶⁸。同樣地，在

⁶⁸ 見附錄圖片二十五、圖片二十六。

陳進⁶⁹作為台灣堪稱首位成功女畫家的作品中，其早期的作品內，描繪著傳統台灣婦女在化妝的姿態，身上是穿著改良式的中式衣服，畫中的女子體態也沒有強調女性胸部與腰部的曲線⁷⁰。

但是在陳進一九四四年與一九四五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穿上旗袍的女性身體，因為多了這件衣服身體曲線被凸顯出來⁷¹。雖然此時的台灣還是受到殖民政府的管理，但葉懿慧指出，其實早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就有些年輕的知識份子受到大陸地區的影響，婦女們有穿著旗袍的風氣，只是在台灣沒有造成轟動。（葉懿慧，1996：53）

我們除了可以從畫作中明顯看到，女子穿上旗袍後的體態與之前的樣貌迥然不同外，光復後的報紙內容也刊登同樣的女子身體意象圖片。販售商品的廣告中有著穿上旗袍後的女性身體圖像作為陪襯⁷²。換句話說，此時的女性身體已經邁入商品化與被物化的階段，許多廣告都附上具有姣好身材與曲線感體態的女子畫象，做為吸引讀者目光的手段。

除此之外，甚至在報中一小欄插畫中也出現了這樣的論述：旗袍對於婦女想要展示自己姣好的身材是大有幫助的。畫中以誇張與映襯的手法呈現，穿著旗袍的女子是要展示其傲人的雙峰，而相較依然穿著舊式傳統服裝的婦女而言，實在難以置信看到女子透過穿著打扮展示其前凸後翹的身材⁷³。

我們可以從上述的畫作與文章中得知，婦女在穿著旗袍後所呈現的身體儀態，皆是一致性地指向隆起的胸部與細腰的「女性身體」意象。這與耆老們談起在光復後，女子們開始紛紛注意自己有無曲線的身體相互吻合之外，同時也意味著，當時的人們逐漸接受透過內衣與外衣包裝後，強烈展演具有性別特徵的女性身體。

4.3.2.2 女子爭先恐後穿著旗袍的論述

除了從圖像中可以看到女子穿上旗袍後，展現了豐胸塑腰的體態外，在報紙上也出現許多關於女子穿著旗袍的描述。文章多半是敘述當時的女

⁶⁹ 在臺灣近代繪畫史上，陳進女士是一位相當重要的畫家；她同時也是光復前臺灣著名畫家中唯一的女性。

資料來源：田麗卿（1993）與 <http://www.juming.org.tw/epaper/20020205p.htm>。

⁷⁰ 見附錄圖片二十七。

⁷¹ 見附錄圖片二十八、圖片二十九。

⁷² 見附錄圖片三十、圖片三十一。

⁷³ 見附錄圖片三十二。

子喜於穿著此服裝來表演與展示身材，同時，文字描繪著當時的女子穿著旗袍的身影穿梭在人群與街景中，無論是哪種階層的女子都有此衣服有密切的關係。

在翻閱過去的報紙資料食，我發現在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的自立晚報內，最率先刊登關於旗袍的資訊，在一篇介紹巴黎時裝近貌的文章中，不忘提及代表中國服裝的旗袍也是當時流行的服裝。之後在一篇關於〈女招待〉文章中特別指出旗袍成爲風塵女子爭先添置的服裝，這代表著女性透過旗袍展現其身材曲線，是符合當時的潮流趨勢。內容如下：

女招待也就是酒家女子的收入已經不如日據時期般，要自己額外出支費用，除了食宿的支出，總得有一件旗袍（現在自從海風吹上台灣之後，連陪遊帶陪睡的兩百元代價都有點海化），外加一雙高跟鞋或是跑鞋，也有木屐……。（自立晚報，1947年11月19日）

除了從事特別行業的女性，已經開始跟隨流行穿起海風引進的旗袍服裝，一篇〈中華國貨公司巡禮〉文中也敘述著，站在百貨公司裡頭的女店員要有一番裝扮才能吸引客源，女店員的裝扮就是穿著洋風中帶點中國上海風的服裝。內容如下：

女店員打扮的花枝招展，他們穿的是一色服裝、但綠色的西式旗袍，胸前繡著阿拉伯藍字的號碼，玻璃襪子、白皮鞋、電燙頭髮、臉而塗抹濃厚的麵粉，兩夾及嘴唇上均有紅艷的胭脂，紅潤白嫩的天然肌膚，在家化妝品的修飾在弧光散射下的燈前美女，的確招攬不少顧客。（自立晚報，1948年4月19日）

另外在當時的報紙副刊中，撰述有錢人家的太太們常常匯聚一塊兒，討論流行款式的衣服。她們格外在意的就是旗袍這件服裝。一篇標題爲〈太太做衣記〉的文章詳述著太太們互相較勁彼此去訂作了哪些新衣服，接著探討她們爲了穿上好看的旗袍，斤斤計較地不願意再多穿一件羊毛內衣在裡面，免得身體顯得看起來臃腫不堪。在先生體貼的叮嚀下，不願意太太爲了愛美而受涼，太太最後還是將羊毛內衣穿上了。卻沒想到合身剪裁的衣服因爲多了這一件內衣，得耗費更大的力氣才能穿上漂亮的旗袍，但是就因爲多了一件不適合的內衣，換來更爲困窘的情景：「沒想到憋一口氣穿起來的旗袍，就在路上因爲顛簸無法再縮小腹的狀況下，旗袍裂開了……。」（自立晚報，1951年12月14日）

從上述的文章中我們可以得知，穿著旗袍的女子十分重視與在乎自己

的體態與身材，婦女們也知道，可以透過穿旗袍來展現女性身體曲線的美。如果內在衣服穿的不適宜，不僅無法凸顯自己曼妙的身材，也無法彰顯外面那件旗袍所呈現出一個凹凸有緻的曲線視覺效果。

4.3.2.3 旗袍成爲婦女重視的服裝

無論是從女性耆老口中得知，她們訂作內衣雕塑身材是爲了要穿旗袍，而且旗袍成爲她們出席重要場合的主要服裝，另外也可以從報章文中發現當時的社會描繪許多女子穿旗袍的景象。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宣導人們該注意自己的儀容打扮以合乎社會禮儀規範的文章中發現，會特別列舉女子旗袍此服裝作爲例子，教導人們該如何穿著此件衣服，可見女子穿旗袍在當時蔚爲一股風潮，並且是穿衣哲學中重要的一角。以〈衣著之道〉爲標題的文章內容如下：

衣服的功能除了冷天禦寒之外，就完全在於裝飾。蔽體這兩個字裡面，實已包含著裝飾的意義。……根據個人身高之不同提供些穿衣的妙計……女子的旗袍長度可以裁的略短，矮的可以裁的略長。（自立晚報，1948年11月5日）

另一篇〈衣服與身份〉的文章，則是撰寫針對個人年紀該選擇什麼樣的衣服以符合其身份，並且在選擇顏色上該留意的事項。在文章一開頭便有趣的寫著：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小白臉沒有畢挺的西裝，顯不出風流瀟灑，鵝蛋臉兒的小姐，沒有曲線美的旗袍，也顯不出風韻婀娜，十足摩登。（自立晚報，1948年1月16日）

特別一提的是，有一篇標題〈太太的胸部與我的面子〉的文章，以男性的角度出發對太太的裝扮發表屬於男性的心聲。文中除了點出女爲悅己者容的思維外，也特別提到，當時的女人喜於在胸部上大做文章，胸部之大與尖挺成爲婦女們穿衣之時特別注重的環節。內容如下：

我也喜歡太太裝扮，不過不需要太花費。太太回答說：「為了你不是爲了我。」當太太裝扮好當然非常漂亮，頭髮剪短了，據說是個聖女貞德型，旗袍的領子高到下頰，長到腳跟，短短的袖子露出兩條手臂，白色的小提袋，白色的高跟鞋，更使我驚奇的是，他的胸部呼的高漲起來不禁自問胸部的偽裝和美德有什麼關係？我的面子就寄在他的高聳胸部嗎？（自立晚報，1950年12月6日）

換言之，在以上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女人穿著旗袍似乎是相當平常之事，甚至成為女性著衣中的基本款式，而且婦女似乎理所當然的透過穿著這件衣服，可以將身材修飾的更為完美，甚至是透過著衣這實踐活動來展現與賣弄其與生俱來的「女性」身體。「女人的服裝經常透過篩選出來有若隱若現、暴露身體、浮華誇張和特殊場合所著的衣服，強調女性的美麗。」（Kidwell and Steele，1989：42）

4.3.2.4 穿上內衣後女性身體具有挑「性」的意味

「所有的衣服都是身體的時尚，但是由於有更多親密的關係連結著身體與服裝，所以服裝也就更有性的意味。」（Kidwell and Steele，1989：56）這意味著女性內衣作為最為貼身的衣服，與「性」的關連性最為直接與強烈。婦女除了透過穿著西式內衣凸顯外顯的性特徵之外，穿著內衣的女性身體更淪為象徵「性」的物質。

國內的自立晚報從民國三十九年起，出現連環圖畫〈宋蕙蓮〉的文章，內容透過插畫與文字的方式，重新撰述古代小說。我發現在文中的圖片裡，特別將女性的乳房半露於外衣之外，以此繪圖輔助說明故事的發展，而我認為這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圖畫確實可以吸引到讀者的目光⁷⁴。

另外，從民國四十一年起，自立晚報出現一則標題為〈麗麗日記〉的小說連載，此小說故事等同於我們現在堪稱的情色文學。內容描述的多半是酒家女子的故事，以及較為煽情的愛情故事，有時候也加上插畫的方式，將故事情境交代的更為完整⁷⁵。從中可以得知西式內衣成為故事中女主角的穿著服裝之一，女性內衣出現的脈絡也有了新的突破。文章內容如下：

這禽獸不僅毫無同情心，反而動手到我的衣服，我毫無抵抗，只有由他把旗袍剝去，然後是高跟鞋、玻璃絲襪，汗衫，乳罩……。（自立晚報，1958年7月1日）

在這一段敘述酒家女子受到欺凌過程中的文字裡，我發現描述穿著旗袍的女子身體下，特別提及了其他類型的西式內衣，這似乎也意味著當婦女穿上旗袍時，必須搭配著西式內衣，這套穿衣原則儼然成為不成文規定。

另外在一則〈戰時的女子體貼 是重於香豔〉文章中，以女子身著西式

⁷⁴ 見附錄圖片三十三。

⁷⁵ 見附錄圖片三十四。

內衣的體態圖像作為文字描述的陪襯⁷⁶。文字與圖片皆是以暗喻法指涉，女子的穿著打扮在挑起男性性慾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內容寫著：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這是誰也不可否認的。……愛美的天性也好，女人爭奇鬥豔的目的是，總是免不了爭奪為她們所心愛的男人。在優裕的環境中，男人多受色之誘惑，但在憂患的環境中（如戰場等），男人只受之於「動作」之誘惑……。（自立晚報，1955年5月19日）

在這些文章與圖片中，無論呈現的是性感還是美感的女性身體，可以發現的是，當內衣成為展示女性身體的主要物件之時，「女性」身體的意義顯得更為重要。我們可以這樣說，無論對於中西方而言，性感這一詞彙的發明與意義詮釋，都是現代的產物，與之緊密相連的正是性與性別的概念，也就是性感的意義建立在性的存在之上。「性感是一種慾望的表達」（江曉原，2003：15）這正是 Steele 認為內衣、性感與色情這三者的共存關係不容小覷的脈絡。換言之，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關於女子穿上內衣後的身體論述，也同樣地被置放在性與性感的脈絡裡，透過男性的眼光與性的訴求，將多了一件內衣的女性身體，推向彰顯「性」脈絡的意義內。

4.3.2.5 身著泳衣與西式內衣的身體

對當時的台灣婦女而言，除了一件旗袍外衣與西式內衣存在著緊密的關連性之外，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女人的泳裝也與胸罩緊密相關。民國三十八年的中央日報家庭與婦女版內出現一篇〈海濱服裝〉文章，文中說明泳衣是由乳罩變化而來的服裝⁷⁷。而在自立晚報內也有類似的文章，主要是介紹游泳衣的選擇：「女人的泳衣，形同戴一個乳罩和一條三角褲。」⁷⁸

除此之外，在報中還看到介紹製作乳罩的照片裡，附上女子穿上乳罩後的樣貌⁷⁹，文中還特別對此新乳罩能夠在夏天派上用場，具有消除解熱之功用作一番詳加註解。內容如下：

新型的乳罩出現了，比去年還要進步。配合著海水浴日光浴，所以設計上將多餘的部分都刪除。暑天女人絕是說「男人都舒服，一件

⁷⁶ 見附錄圖片三十五。

⁷⁷ 中央日報 1949年7月10日。

⁷⁸ 自立晚報 1950年8月30日。

⁷⁹ 見附錄圖片三十六。

單衫多麼涼快嘛！女人卻不行，休說內衣，就是皮也想剝下來。」（中央日報，1949年7月17日）

換言之，內衣與泳衣除了在形式上有雷同之處外，其實兩者的功用都是直接包覆在女性裸體上的衣服。於此，眾人觀看女性穿著泳衣的方式，其實明顯可見的與內衣並無多大的歧異，也就是它們雖是包覆女性身體的服裝，卻又是件不能當眾褪去的衣服。

在翻閱過去的史料中我發現，自立晚報中從民國四十三年開始，也就是美軍來台駐防之際，刊載圖片的版面日趨增多與豐富之外，描述女性身材的圖片、外國明星的劇照，以及新款式的女性服裝的圖片都大幅度增加。其實在一九五〇年後，受到美軍經濟援助的同時，美式風格的衣物也逐漸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受到西式服裝的影響，台灣女性的服裝開始特別強調線條和腰身的剪裁，以增加胸部的豐滿與腰身曲線之目的。（葉懿慧，1996：52）同時，報紙也刊載多種款式的西式內衣，如襯裙與睡衣款式等內在衣服⁸⁰，圖片裡呈現的也是一個具有曲線的女子身體。這也意味著，台灣婦女可以從大眾媒體中，得知當下的流行服裝資訊，從中認識更多元的西式內衣，並且對於女性身體的體態有了嶄新的認知，也就是透過著衣的實踐過程，將自己的身體置放在塑腰與豐胸的脈絡中。

不僅如此，還可以從報紙上的廣告內容發現，標榜百貨公司的促銷活動，以及訂作內衣與制服的商家，都刊登著身穿內衣的女性模特兒圖樣⁸¹，圖中女性的胸部因為穿了內衣而顯得相當突出。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光復後的報紙上，處處可見的正是婀娜多姿且摩登十足的女子身體，而這些女性身體個個都具有凹凸有緻的曼妙身材，頭髮也經過吹整燙過以呈現流行於當下的時髦髮型。總括來說，媒體不僅再現了當時人們對於女性身體的想像與嚮往，也將女性身體置入在消費市場的脈絡裡。

4.4 小結

根據 Grogan 的說法，他認為理想的身材是一種歷史演進的產物。（Grogan，1999：13）透過時間的積累、受之於社會風俗的規範，以及流行服裝的多重影響，看待身材與體態的方式隨之而轉變。我們亦可從台灣社會中得見，女子看待穿著內衣後的身體也是同樣的脈絡。

⁸⁰ 見附錄圖片三十七、圖片三十八。

⁸¹ 見附錄圖片三十九、圖片四十。

在不同的時間內，台灣婦女看待穿著內衣的身體的方式，從僅僅是件作為與外衣區隔的物件，至後來需要透過這件衣服來遮蔽與彰顯具有「性特徵」意義的女性身體，進而演變至可以透過此衣服展露屬於女性特有的曲線美感身體。我們可以發現是，造成此過程演變的原因不乏既有的傳統價值觀、知識與教育的介入、文明觀念的引進、以及流行於當時的服裝與時髦裝扮等多種因素。

在這一章裡，我企圖從台灣婦女在接觸西式內衣此新物件之後，探討她們穿著此衣服後的身體感受有著什麼樣的改變與變化。從衣服此物件層次來說，穿上西式內衣後的身體有兩種背道而馳的身體意義，一為遮蔽的身體、二為彰顯的身體，兩者都指向一個具有「女性」的身體。但就從內衣的文明層次而言，衛生與乾淨的內衣穿在身體上，提升至更合乎文明社會中認為人們該呈現的身體樣貌，並且一個具有禮貌意義的身體也在此時被建立起來。此外，我們可以得知，禮貌的女性身體不僅來在於內在衣服的包裝，更需要透過外衣的裝扮與點綴，才能將當時流行的女性「曲線美」體態展示出來，旗袍與洋服在此就顯得相當重要。

但是來自於不同社會環境下的婦女，其實對於穿著內衣的身體有著明顯的差別認知。本省籍婦女看待內在衣服的方式，是將它放在服裝本身具有掩飾與遮蔽的意義，她們看待象徵「女性」身體的乳房是帶著羞的感知，多半認為藉由穿著內衣可以掩飾胸部，使之不成為眾人的焦點；然而，外省婦女卻認為，內衣是一件可以展示自己女性身體的重要服裝，從上海遷台來的婦女很早就接觸了西式內衣，她們認為穿著內衣彰顯具有性特徵意義的女性身體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更可以說這著衣的實踐過程是展現一個美的女性身體。這兩種歧異的詮釋，一直到光復後，手工內衣的出現，以及關於女性身體曲線美的論述盛行於媒體中，兩種不同省籍的台灣婦女對於內衣的看法才有了共識。也就是在台灣社會中，不斷創造與再現婦女們的身體是需要透過內衣與旗袍相互搭配，來呈現當時認為一個女性理想的身材樣貌。於是，在中央政府治理時期成長的婦女，居多擁有訂製連身內衣的經驗，同時，她們也認為穿著連身內衣是可以展示一個具有曲線的女性身體，並且這種款式的內衣與外衣（也就是旗袍與洋服）的搭配規則，對於台灣婦女們來說，是一種近乎人人皆知的穿衣常識與知識。

從婦女們開始注重穿著內衣這個實踐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外在衣服的加入，如新潮的洋服與海風的旗袍，強化了台灣婦女試圖藉由穿衣凸顯與修飾身體曲線，在這個著衣的過程中，使得她們對於身體的認知有了重大的突破。台灣的婦女不再受限於過去傳統社會內看待內衣與身體的方式，反而是走向西方（也就是歐美）看待女性身體的美感脈絡，接受了女

性是可以透過內衣展示「女性」的、「美」的身體。

而我認為這樣的轉變過程裡，不僅僅存在一個美感的女性身體概念，而是一套行為模式，夾帶著人們對於身體的認知與觀看身體的方式。也就是從時間的歷程裡，發掘台灣的女性身體是受之於哪些外在因素影響下，產生其特有的意義指標，這正是 Butler 看待身體是件物質討論的脈絡，尤其是一個女性的身體，更不能忽略了具有「性」象徵的意義，以及文化與權力建構起來一個對於身體的概念。也就是除了了解內衣對於當時的婦女而言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之外，我們必須檢視來自於論述權力與文化的力量，包裝出何種台灣婦女的女性身體意象。回到最初 Butler 將身體問題化之際，多了一件衣服裝飾的女性身體在台灣社會的脈絡中出現了何種意義正是我關切的核心所在。我發現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女性身體可以被質問的是：什麼樣的女性身體需要透過穿著內衣來展示具有性別意義的身體？換句話說，我把梳出屬於台灣社會脈絡中，一個具有女性性特徵的身體，是可以透過內衣以及與外衣的搭配展示出不同定義下的美感身體，台灣婦女穿著內衣呈現既是蘊含著遮蔽意義的羞恥身體、也是彰顯性特徵的時髦身體，更是符合社會期待的禮儀文化身體。

總之，從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受過不同政權治理下的台灣，婦女們多了一件衣服的身體，在不同時間內、對於不同的族群、不同年齡層的人，反映出多種層次的定義。換言之，一個女性身體美感的概念，在台灣社會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台灣婦女的身體透過穿著內衣的實踐行為，將身體置放在屬於文化、禮儀、衛生、以及時尚等多重意義的框架裡，並且在時間軌跡中相互交錯對人們產生作用。

第五章 結論

本文企圖在重新檢視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流變過程中，挖掘內衣本身具有的象徵意義，如何隨著其樣式的演變而有不同的意義，並且透過觀察女人在穿著內衣的實踐行為裡，她們的身體在不同時代背景與族群中產生何種意義的轉變。換言之，本文旨在尋找一個詮釋女性內衣和身體美感密不可分的可能性。我認為，在我們視女人穿著內衣為一種理所當然的習慣，卻甚少探問在此習慣中，被建構出什麼樣的符碼與意義、其演變的來龍去脈，以及藉由著衣過程改變了我們對於身體的認知，是否重新為身體美感給予更為多元的定義，這些正是我在文中亟欲探討的部分。

本文中先釐清國外相關問題意識的概念，企圖在耙梳的過程中，彙整西方探討服裝與身體的研究脈絡，尋找一個可以相互對照與應證的管道，以及切入探討台灣社會中內衣此物件與女性身體兩者關係的方式。參照 Daniel Roche 分析法國服裝史的研究，可以發現探討服裝在社會中所代表的意義不可避免禮儀、材質、權力、時尚、以及階級等議題。而我發現在台灣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女性內衣對於人們的意義不僅侷限在隸屬本身社會與歷史中原本存在的功能性意義，隨著時代的腳步，又多了文明社會中創造出禮儀符碼的這層意義。加上內衣材質的演變也為人們整合乾淨與衛生的概念。

然而，這些意義被加諸在女性內衣是需要透過時間的積累，並且有來自於論述權力的介入，才能使人們對於內衣的想像與認知有了轉變。於是，我挪用傅科 (Foucault) 探討管理身體的權力與知識概念，將 Daniel Roche 已經提出權力對於服裝與時尚的影響，卻未深入分析的部分加以補充。我試圖釐清傅科 (Foucault) 探討權力的運作以及規訓身體的方式，借用他詮釋權力概念，從中分析在台灣的社會中，有哪些涉及論述權力運作的因素，可能直接與間接地影響人們重新認識女性內衣這件物質，同時改變人們對於著衣行為的認知。而在分析論述權力改變了女性內衣樣式的轉變後，更進步從 Butler 探討身體作為物質的脈絡中，了解如何透過文化與權力的操作，改變人們看待身體的方式。也就是我企圖從 Butler 探討身體的概念，展開台灣女性身體美感在穿著內衣後產生了何種意義的轉變，人們對於女性身體的認知是在什麼框架中產生多重意義。

以現代的角度來看女性內衣，它是作為一件展示女性身體美感重要衣服，其中更包括了性意味的象徵；但是將時光倒回至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的台灣，女人們穿著內衣展示的身體就不是僅具有如此狹義的意義。

從本文研究發現，婦女在著內衣的行為中，夾雜著對於內衣本身與女性身體兩種不同物質的認知，而且人們認識這兩種物質的方式，是隨著時間的軌跡與社會文化的演進持續變動。這就如同 Entwisle 提到：

我提出作為情境身體實踐的衣著理念，作為理解身體、衣著和文化之間的複雜動力學關係的理論與方法論的框架。這種框架認識到，身體是社會地組建的，而且總是被設定於文化和指向身體的個體實踐的結果之中。換言之，衣著是「著衣」(dressing)或「穿衣」(getting dressed)的結果。(Entwisle 邵元寶等譯，2005：7)

從殖民政府治裡台灣的時期內可以發現，傳統的中式內衣逐漸被社會淘汰，但是卻將屬於內衣的女紅技術保存下來。我試圖從過去的史料文獻、以及耆老的回憶裡，尋找一個解讀肚兜何以被汰換成簡單西式內衣的過程。而我發現來自於國家的顯性與隱性權力管理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中不乏明文規定的法令頒佈與學校體制，以及相關女子縫紉技術的補習班機構，這三者都直接與間接地影響台灣婦女接受西式內衣與重新認識身體在著衣後所具有的意義。

我們可以得知政府頒佈改革婦女服裝的法令，意味著在權者想要藉由改變人們的服裝打扮強化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同時也成為促使台灣婦女接受西服的一個管道。而學校教育體制成為取代傳統家庭傳授女孩縫紉技術的機制，成為保留傳統社會裡女紅技能的主要機構。從殖民政府時期大量將女紅技能收編在整個教育體制的課程內，即可以發現，殖民政府也因為其社會文化的關係，特別重視教育台灣婦女熟習女紅技能。並且在學校教育的灌輸下，台灣婦女們逐漸地摒棄過去傳統的穿著打扮，進而認識與縫製不同於傳統社會中的衣物。同時，台灣婦女們也開始接觸到新式內衣的知識，以及被教化重新看待身體與內衣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一個乾淨與衛生的身體與內衣的轉變有著明顯的關連性。

屬於國家體制外的女紅技術補習班，也因應了政府強調女子技藝課程之重要的運作而蓬勃發展。從史料中顯而易見各式各樣的洋裁學院、及美容學校廣告，這也意味著，當婦女無法透過正規管道習得縫紉技術之時，還有這種類型的補習班可供選擇。而且還可以從教科書與雜誌內發現，在殖民政府時期管理下的台灣，就已經存在著許多關於西服的資訊，其中當然也包括西式內衣的縫紉技術與穿著搭配等知識。這股補習班風潮其實一直延續至中央政府來台後還相當盛行，只是不再由日本人主導局面，而是從一些私立學院中開始招攬學生，將女紅技術加以傳承與發揚。

從權力的面向來解釋中式肚兜內衣的式微與政府管理手法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外，我特別要指出的是，當在權者透過法令與學校教育著手，企圖改變人們的穿著服裝，可明顯看見權力在其間的運作與影響力甚鉅。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除了政府法令與學校體制導引之外，民間的技能補習班、洋裁店、雜誌與流行服飾，都以實踐的方式呼應此內衣論述之模式。從上述的三種面向可以看到的是，知識與權力相互運作的場域，透過政府的機制管理、體制外強化政府欲帶給人們的新的知識與概念，達到了企圖汰換中式服裝的目的，同時也大大影響台灣婦女對於內衣的認知，並且從中認識到不同於傳統社會底下對於女性身體美學的概念。循著傅科(Foucault)探討權力的脈絡，發現其實論述權力的影響力遠勝過於政權的權力施展。換言之，台灣婦女接觸穿著內衣的身體意象以及更懂得透過內衣展示「女性」的身體，不僅有來自於政權管理的涉入，更為重要且深具影響力的是盛行於當時關於女性內衣以及女性穿著打扮的論述。

另外，在本文探討的過程中，發現研究結果與自己最初的設問是有出入的。也就是在台灣社會脈絡中，並沒有因為不同政權的治理導致台灣婦女看待內衣與身體方式有截然不同的面貌。研究結果發現即便是不同的政權治理，無論是教育機制或是論述權力皆朝著將女性內衣與文明符碼作扣連，同時也陸續灌輸人民與學生穿著內衣與健康的身體有緊密的相關性。於是，換個角度說，殖民政府與中央政府治理下的台灣，婦女並未因為政權的不同而認識到不同意義的內衣；反之，在不同年代中，她們皆重新認識內衣對於一個乾淨、衛生身體的構成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除了論述權力作為影響台灣婦女摒棄舊式的內衣外，循著 Daniel Roche 認為服裝材質革新技術的產生，為服裝注入更多文明符碼的脈絡，我發現台灣婦女淘汰肚兜的穿著也有此有密切的關連。當棉布成為主要的服裝原料，伴隨乾淨與衛生的符碼，台灣婦女也因此更為快速的接受西式內衣的樣式，並且認識了一個具有禮貌與文明的身體。同時，隨著中央政府來台，許多外省族群、布料商人以及裁縫師大量移民遷移來台，他們為服裝時尚注入新的面貌，帶來上海流行的服飾與縫製技術。手工內衣就在這一波移民風潮裡逐漸嶄露頭角，為台灣婦女帶來觀看身體的另一種感官視覺震撼，也就是一個透過手工內衣與旗袍包裝後，展現豐胸塑腰的女子體態。也就是說，當時的流行穿著左右著台灣婦女看待穿著內衣與身體的認知。

我試圖從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流變過程裡，發掘一個女性的身體如何被建構與想像，以及回到 Butler 將身體視為一種問題與物質來思考的脈絡，勾勒出當時一個女性身體的樣貌與意義。研究中發現，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台灣婦女的身體透過內衣與外衣的包覆後，呈現了具有禮貌的

身體、乾淨的身體、以及具有歐美國家建構一套美學概念的曲線美身體。然而，這些身體在不同族群與年齡裡產生不同的意義，尤其是台灣婦女看待內衣所遮蔽的身體認知，是有著差異性的見解。

在我的受訪者中，就同一個年齡層的婦女們而言，也就是現齡超過七十歲的婦女來說，本省籍婦女在看待自己帶有禮貌意義的身體裡，還存在著傳統價值賦予內衣的意義，也就是僅在遮蔽與保護身體的範疇裡，內衣掩飾的是過於彰顯女性性特徵的乳房；但是就外省籍婦女來說，她們觀看穿著內衣的身體，卻早已受到洋服與西方美學價值觀的渲染，認為透過穿著西式內衣是可以展示女性性特徵的身體，甚至很習慣的穿著西式胸罩款式的內衣。兩種不同族群的婦女在觀看具有羞恥意義的女性身體有著迥然不同的想像與認知。

然而，對於五、六十歲的台灣婦女來說，本省籍與外省籍婦女皆認為手工連身內衣與西式內衣—胸罩成爲展示曲線美身體的重要服裝。加上盛行於當時的旗袍穿著論述充斥在媒介裡，展現的也是一個具有凹凸有緻的女子姣好身材，使得婦女們重新認識一個不同於傳統社會底下定義的女性身體。我們可以發現，內衣不僅僅是件遮蔽身體的物件，它也爲強化了女性身體蘊含著性意味的特徵，也就是透過他人與自己的目光裡，女性身體在透過內衣與外衣的包裝後，呈現一個符合當時社會期待的女性身體，一個含有禮儀與時尚的女性身體油然而生。

從本文研究可以發現，在台灣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婦女呈現身體美感的方式，是透過穿著不同樣式的內衣，與搭配著流行的外衣，展現多重樣貌的「女性」身體體態。屬於那個時代的女性身體，是透過兩種物質展現出一個美感的意象。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不同時間歷程裡的台灣社會，女性內衣此物件隱含著傳統中國文化裡的女紅文化、強調女子縫紉技術以及衛生等多重意義，而台灣婦女們因爲觀看內衣此物件的方式改變了，進而影響她們觀看穿著內衣後的身體認知。對於女性身體透過內衣包覆後的認知，從保護的身體轉向到一個遮蔽性特徵的身體，遮蔽的不是我們現代認為不雅的乳頭露點一事，而是來在自己與外在眼光皆認為女性突出的乳房是具有不好意思的意義，因此需要透過內衣掩飾。然而，隨著時尚的流行與外來族群加入台灣社會，穿著內衣呈現遮蔽的身體也逐漸被翻轉成爲彰顯乳房的身體，甚至婦女們經由穿著雕塑身體體態的手工內衣，展現出一個符合西方美學的女性身體樣貌。

因此，屬於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台灣社會裡一個女性身體美感的塑造，是來自於政府介入、流行時尚的影響、材質革新技術的發明以及

滲透於各層面的內衣論述。經由這些外在因素改變了內衣的樣式、賦予內衣更多層意義後，進而使婦女們改變看待穿著內衣的身體，將禮儀、文明、健康、時尚等符碼內含在一個具有內衣與外衣包覆的身體之下。於是，我發現屬於那個年代的女性身體美感，座落在多重性意義並且相互交叉產生作用。也就是內衣與身體作為物質的一部份，人們透過社會內的文化與論述權力賦予兩者多變的意義後，彼此相互影響著台灣婦女呈現多元的女性身體風貌。這也正是回到 Daniel Roche 認為，透過了解服裝在歷史上流變的過程裡，可以挖掘社會帶給人們何種文明符碼，以及藉由服裝發問的位置，重新認識人們在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層面中跟服裝產生何種關係。

最後，我必須指出在本研究裡有些不足之處，主要是來自於探討過去台灣女性內衣的資料與史料實在有限，無法全面性地掌握各種族群的台灣婦女對於內衣與身體觀感的認知。期許日後欲從事此相關研究者，能在此多加著墨，以填補本研究不足之處。如同 Daniel Roche 在其研究服裝文化史中提到，研究的侷限與不足之處乃在於：

其一為必須嘗試去連結在服裝中存在既是真實也是想像、是概念同時也是行為、實踐與影像這些具二元辯證關係的因素；其二，是衣服的特定期料來源，有來在原料的發現、畫報等提供的資訊，也有從家族、貿易上及社會歷史和語言學中去取得，但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局部資料。(Daniel Roche, 1996: 7)

另外，文中受訪者的社會地位區別仍屬中上階層居多，這樣的位階分佈其實也影響著研究的結果，所以研究結果並不足以反映每個位階展現出來的女性身體。雖然受訪者的居住地與成長背景有來自北、中、南的地緣差異以及都市與鄉下的差別，不過概括來說，我的受訪者中無論本省籍或者外省籍婦女，她們的生活水平隸屬中上階層之中，她們的生活位階與研究結果仍有某種呼應性存在，這也是研究侷限之處。期許日後從事相關的研究能夠留意訪談者她們位階上的差異，進而涉略更多不同族群與位階的訪談者，可以為此研究開啓更為豐富的面貌。

於是，在史料與文獻資料有限的情況下，我試圖為這一個鮮少被人以服裝出發切入研究的年代—台灣的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再現屬於當時女子「身體美感」的討論。希望藉由這樣的研究結果，能夠釐清哪些因素影響台灣婦女穿著內衣的流變過程，以及帶出更為有趣的身體美感議題探討。